

第一卷

目录

第一编

枣庄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6年7月—1937年7月)

第一章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枣庄社会环境的演变····· 3

第一节 历史悠久的煤

城····· 3

第二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枣庄经济社会状

况····· 5

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枣庄革命

斗····· 9

一、辛亥革命在枣

庄····· 9

二、山东建国自治军暨临城劫车

案····· 10

第四节 五四运动在枣

庄·····	12
一、五四运动中枣庄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12
二、新文化运动、马列主义对枣庄的影响·····	12
第二章 枣庄地区党组织的建立·····	15
第一节 共产党人在枣庄地区的早期革命活动·····	15
第二节 枣庄矿区党支部和地下工会的建立·····	17
第三节 枣庄矿区工人的反压迫斗争·····	19
第四节 组织成立南下工程营·····	21
第五节 枣庄矿区失业工会的建立·····	22
第三章 中共枣庄特委的建立及其革命斗争·····	26

第一节 中共枣庄特委的建 立·····	26
第二节 组织秘密工会与反抗剥削压迫的斗 争·····	28
第三节 七月大罢工失 败·····	29
第四章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建 立·····	34
第一节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建 立·····	34
一、中共徐州特委派郭子化来枣庄重建党组 织·····	34
二、领导争取“花红”斗 争·····	39
三、建立苏鲁边区临时特 委·····	41
第二节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开展抱犊崮山区和峰县农村 党的工作·····	43
第三节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开展的革命武装斗	

争… ..	48
第四节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建 立… ..	51
第五节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与中共西北特别支 部… ..	53
第五章 中共滕县、临城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领导的革命活 动… ..	60
第一节 马列主义在滕县的传播和国民书店的创 办… ..	60
第二节 中共滕县特支的建立与活 动… ..	62
一、滕县特支的建 立… ..	62
二、特支的秘密活动及开展的几项群众工 作… ..	63
三、国民书店被查封 滕县特支遭破 坏… ..	65
第三节 中共滕县五所楼懋榛小学支部的建立及其活 动… ..	66

一、支持组织“教育推进会”	67
二、进行政治形势教育 启发学生革命觉悟·····	68
三、积极发展党员 壮大党的队伍·····	69
第四节 北方局派人到临城开展革命活动·····	70
第二编	
枣庄党组织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六章 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和创建抗日武装·····	73
第一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枣庄地区的形势和任务·····	73
第二节 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76
一、鲁南中心县委的建立及其工作·····	77

二、其他党组织的建立恢复和发 展·····	78
第三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抗日救亡运 动·····	80
一、建立枣庄矿工抗日联合 会·····	84
二、建立枣庄各界抗敌后援 会·····	85
三、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枣庄区 队·····	85
四、建立枣庄抗日宣传 队·····	86
五、建立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 团·····	86
六、建立兰陵青年救国 团·····	87
第四节 人民抗日武装的创 建·····	88
一、建立沛县人民抗日义勇	

队·····	89
二、建立峯县人民抗日义勇大	
队·····	90
三、建立滕县人民抗日义勇	
队·····	91
四、建立鲁南民众抗敌自卫	
军·····	92
五、建立临郯费峯四县边联常备	
队·····	93
六、举行鲁南抗日武装起	
义·····	94
第七章 全力支援配合台儿庄战	
役·····	96
第一节 战前鲁南地区的军事局	
势·····	96
第二节 血战台儿	
庄·····	98
第三节 抗日武装积极配合作	
战·····	100

第 四 节	人 民 群 众 踊 跃 支 前	102
第 八 章	开 展 抗 日 武 装 斗 争 创 建 抱 犊 崮 山 区 根 据 地	104
第 一 节	中 共 鲁 南 特 委 的 建 立	104
第 二 节	山 外 抗 日 军 联 合 委 员 会 的 建 立	107
第 三 节	开 辟 滕 峰 边 区 根 据 地	111
第 四 节	反 击 地 方 顽 军 的 进 攻	113
第 五 节	抗 日 义 勇 总 队 撤 离 滕 峰 边 区	115
第 六 节	创 建 抱 犊 崮 山 区 抗 日 根 据 地	118
第 七 节	峰 滕 铜 邳 地 区 的 抗 日 斗 争	122
第 九 章	八 路 军 第 一 一 五 师 挺 进 抱 犊 崮 山 区	和 枣 庄

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126
第一节第一一五师挺进抱犊崮山	
区·····	126
第二节 成立中共鲁南区党	
委·····	129
第三节 建立抗日民主政	
权·····	132
第四节 统一整编地方抗日武	
装·····	134
一、组建苏鲁支	
队·····	134
二、组建鲁南铁道大	
队·····	139
三、组建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队和鲁南支	
队·····	147
四、组建运河支	
队·····	
150 五、组建峰县支	
队·····	154
六、组建临郯费峰四县边联支	

队·····	157
第五节 抱犊崮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	159
第六节 峰滕铜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60
第七节 微山湖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67
一、微山湖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初创·····	167
二、微山湖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170
第八节 滕峰边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发展·····	174
一、滕峰边地区党组织的恢复·····	174
二、滕峰边办事处的成立和斗争·····	176
三、抗日模范村黄山涧·····	177

第十章	战胜严重困难 扭转抗战局面	179
第一节	枣庄地区出现严重困难局面	179
第二节	枣庄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182
一、	反“扫荡”斗争	182
二、	反“蚕食”斗争	184
三、	反封锁斗争	187
第三节	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189
一、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	189
二、	配合反击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入鲁反共	192
第四节	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斗	

争·····	195
第五节 开展敌占区城市地下工 作·····	199
第六节 建立苏鲁边区秘密交通 线·····	205
第七节 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经济建 设·····	210
一、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开 展·····	210
二、进行货币斗争 加强财政经济管 理·····	212
第八节 加强根据地党政军民组织建 设·····	215
一、党组织建 设·····	215
二、政权建 设·····	217
三、实行精兵简 政·····	218

四、群众团体建设	
设	220
第九节 加强根据地宣传文化教育工作	
作	221
第十节 整风运动	
动	226
第十一章 开展攻势作战 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利	229
第一节 根据地的大发展	
展	229
一、根据地党政军建设	
设	229
二、查减运动	
动	231
三、大生产运动	
动	232
第二节 向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	
攻	234
一、运河南北地区反攻作	

战·····	235
二、滕峰边区反攻作	
战·····	237
三、微山湖区反顽战	
斗·····	238
四、滕县地区反攻作	
战·····	239
五、1945年初的攻势作	
战·····	240
六、1945年夏季攻	
势·····	244
第三节 发起全面大反攻 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	
利·····	246
一、抗战局势的新变	
化·····	246
二、鲁南第五路大军向徐州地区进	
军·····	247
三、首次解放峰县	
城·····	248

四、官地惨案·····	250
五、驻枣庄地区的日军缴械投降·····	250
第三编	
枣庄党组织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949年9月）	
第十二章 争取和平民主 保卫解放 区·····	255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枣庄地区的形 势·····	255
第二节 党政军领导机构和军事部署的调 整·····	257
一、调整组织机构和行政区 划·····	257
二、扩大地方武 装·····	259
三、抽调部队干部支援东 北·····	259

第三节 津浦铁路济（南）徐（州）段阻击战	
役·····	261
一、津浦路阻击战役的军事部	
署·····	261
二、界河伏击	
战·····	262
三、柏山战	
斗·····	264
四、官桥战	
斗·····	264
五、滕县战斗和王麓水牺	
牲·····	266
六、何志斌部起义与津浦路阻击战役结	
束·····	267
七、人民群众积极支援津浦路战	
役·····	270
第四节 军事调处工	
作·····	272
一、停	
战协定签订后枣庄地区的形势·····	

272 二、枣庄和	
谈·····	274 三、
铁路交通的军事调	
处·····	278
第五节 准备自卫战	
争·····	280 一、开
展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运动·····	
280 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经济恢复工	
作·····	285
三、加强部队建设 提高军队素质	
·····	288
四、行政区划和党政军机构的调	
整·····	290
五、发展文化教育事	
业·····	291
第六节 枣庄的解	
放·····	293
一、攻克枣	
庄·····	293

二、罗炳辉病	
逝·····	296
三、枣庄矿区党委的成立和煤矿生产恢	
复·····	297
四、准备撤离枣	
庄·····	298
第七节 分化瓦解国民党	
军·····	300
一、国军工	
作机构的成立·····	300
二、争取郝鹏举部起	
义·····	301
三、争取	
吴化文部·····	
301	
四、争取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	
军·····	302
五、争取驻临城、	
韩庄国民党军起义·····	303
第十三章 全面内战爆发 奋起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	
攻·····	305
第一节 广泛进行战前动	
员·····	305···
第二节 迎击进犯之	
敌·····	308

一、峰南阻击	
战·····	308
二、傅山口反击	
战·····	310
三、台枣线反击	
战·····	311
第三节 贯彻“五四”指示 进行土地改	
革·····	312
第四节 鲁南战	
役·····	315
一、战前形	
势·····	315
二、围歼国民党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	
队·····	316
三、峰县城攻坚	
战·····	317
四、枣庄战	
斗·····	318
五、广泛动员 支援前	

线·····	319
第五节 配合莱芜、孟良崮战役 阻击南线之	
敌·····	322
一、莱芜战役南线配合	
战·····	322
二、支援孟良崮战	
役·····	324
第六节 奋力突围 粉碎国民党军大合	
击·····	326
一、国民党“还乡团”疯狂摧残解放区人	
民·····	326
二、开展敌占区游击	
战·····	329
三、北撤渤	
海·····	332
四、向湖西、鲁中突	
围·····	334
五、“六九”突	
围·····	336

第十四章 坚守阵地以巩固扩大解放区·····	341
第一节 支援华野第一、四纵队转战鲁南·····	341
第二节 广泛开展游击战·····	346
第三节 进行土改复查和反倒算斗争·····	351
第四节 开展生产救灾和整党整军运动·····	354
一、开展生产救灾运动·····	354
二、开展整编精简工作·····	358
三、整党整军运动·····	359
第五节 国统区滕县的“倒褚”民主斗争·····	364
第六节 津浦铁路中段战役和清剿国民党残	

匪·····	366
一、津浦路中段战	
役·····	366
二、清剿国民党基层政权和残	
匪·····	367
第十五章 支援战略进攻 迎接全国解	
放·····	369
第一节 实行集中领导 健全组织机	
构·····	369
第二节 支援济南、淮海、渡江战	
役·····	370
一、支援济南战	
役·····	370
二、支援淮海战役 枣庄全境获得解	
放·····	371
三、支援渡江战	
役·····	376
第三节 巩固新生人民政	
权·····	378

一、抽调地方武装补充主力部	
队·····	378
二、抽调干部南下支援新	
区·····	380
三、开展剿匪反特斗争 巩固胜利果	
实·····	382
四、开展生产救灾 解决“麦田悬	
案”·····	384
五、整顿恢复基层党组	
织·····	390
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391
结束	
语·····	
·····	393
附录一 大事索	
引·····	396
附录二 人物略	
历·····	417

附录三 著名烈士名录	434
附录四 枣庄地区党组织沿革	440
后记	451
附 原《中国共产党枣庄地方史》（第一卷）后记	453
附图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活动范围图	
附图二……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理要图	
附图三……鲁南抗日根据地大发展时期形势图（1940年）	
附图四……鲁南抗日根据地形势图（1943年）	
附图五……抗日战争胜利鲁南解放区形势图	
附图六……鲁南战役经过图	

第一编

枣庄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在大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6年7月—1937年7月)

第一章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 枣庄社会环境的演变

枣庄地区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随着此地产业工人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枣庄地区的传播，为中共枣庄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一节 历史悠久的煤城

枣庄因煤而兴。据史料记载，1308年枣庄就有人掘井采煤；1908年成立了峄县中兴矿局（枣庄煤矿前身）。中兴矿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民族资本独立经营的大型煤矿。

1899年，张莲芬（又名张毓藻，浙江余杭人）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员德瑾琳协议成立了“商办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股

份有限公司”。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瑾琳任洋总办。为限制洋人权力，张莲芬规定公司的管理皆由华总办主持。1908年，他又以德国人“洋股”一直没能到位为由，经清政府批准，中兴公司注销“华德”字样，取消洋总办，改为纯华资经营的“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总理制，张莲芬被推举为总理。至此，中兴公司成为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民族矿业。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中兴煤矿先后修建了枣庄经台儿庄至苏北赵墩的自营铁路线，与津浦、陇海铁路连接，是完全由民族资本修建的山东最早的一条商办铁路，这在当时全国也是罕有的。中兴煤矿还相继修建了台儿庄、苏州、无锡、常州、上海和连云港的海运（河）港口码头，将煤炭运销大江南北及日本、东南亚、欧美诸国；购置海轮、拖轮、铁驳船等16艘大中型轮船，成立了中兴轮船公司（解放后被上海港务局接管），利用铁路、货船经营食盐；1913年及此后，又先后自办了发电厂、矿山机械制造厂、学校和医院。

随着实力的增加，中兴公司在枣庄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三个大型立井，新开了山家林、陶庄两个分矿，还在安徽、湖南、台湾等地开矿。高高的井架，现代化的罐笼提升器，长臂式采

煤法、割煤机，先进的通风、排水设备等相继上马，这些设备大部分沿用到 20 世纪 90 年代。

矿业兴则百业兴，中兴公司的发展带动了枣庄煤城的发展。由于矿工大量增加，餐饮业、商业、服务业、加工业发展迅猛，促进了枣庄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枣庄煤城建设的步伐。1918 年，中兴资本家看到商业利润可观，便投资兴建了大小“洋街”、南北马道、三合街、火车站等街市。到 1924 年，枣庄煤城居民已经发展到近 10 万人，其繁荣程度超过峰县城。1938 年日军侵占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被日本三井株式会社攫取。日本侵略者对枣庄煤炭进行了大规模掠夺性开采，煤炭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八年间有 4000 多名矿工死于日本侵略者“以人换炭”的法西斯血腥政策之下。1938 年至 1945 年，中兴煤矿产煤 1333.21 万

吨。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兴煤矿更名为枣庄煤矿，1956 年 2 月成立了枣庄矿务局，枣庄煤城的城市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1958 年，峰县县委、

“中兴煤矿公司”6 万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枣庄. 运往日本达 440 吨，

县政府机关迁驻枣庄，1960 年峰县改名为枣庄市，1961

年升为省辖市。枣庄煤城，几度兴衰，百年沧桑。仅从1908年建立中兴矿局算起，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催生了大批产业工人，形成浩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同时也是山东省较早产生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方。

第二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枣庄经济社会状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枣庄经济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封建的农业经济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显著的地位，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民族资本主义很难独立发展，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落后，而且很不平衡。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这些特点在辛亥革命中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20世纪初叶，枣庄的农业生产是极其落后的。农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除个别地主雇工经营（称为经营地主）外，一般是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租佃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称为佃农）耕种。自己拥有少量土地、自行耕种的农民只占少数，其中有一部分由于自有土地或承租土地较多，还雇用少量雇工（后来称为富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生产资料和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完全用旧式

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枣庄没有任何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农场，耕牛是农民唯一的帮手，因此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清末主要粮食作物亩产仅有 50~70 公斤。1936 年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为 62 公斤，是民国时期单产最高的一年。

辛亥革命后，军阀和官僚代替了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他们倚仗政治和军事力量，抢占或强买大量土地。由于地租剥削率很高，商人、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也纷纷大量购买土地。随着这些新兴地主的兴起，土地有更加集中的趋势。据抗日战争之前的调查：滕县共有 51.4 万人，土地 150 万亩，地富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8.52%，竟占有 72% 的土地。枣庄其他各县的土地占有情况也大抵如此，即占总人口 7% 左右的地主富农却占有 75% 左右的土地；占总人口 35% 左右的贫农和中农只占有土地的 30% 左右；占人口 56% 以上的佃农、雇农和游民则完全没有土地。这虽是抗日战争前的调查材料，但反映出军阀统治时期枣庄土地严重集中的基本状况。在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居住的地方，土地更是高度集中。如枣庄齐村崔家，周围村庄的农民没有一分土地，都是佃农或雇农。地主阶级凭借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对贫雇农进行封建的雇工、地租、放债等多种形式的剥削。雇工所创造的价值 70%

左右为雇主占有，地租额一般都占收获物的五成以上。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租等额外剥削，以及各种超经济剥削。封建剥削的又一种重要方式是高利放债，俗称高利贷。穷人每遇青黄不接、天灾人祸，便缺粮断炊，无以纳租，或者无力消灾弥难，只得向地主借债。或粮或款，利率往往高达 100%以上，而且到期不还，还要利上加利，俗称“驴打滚”。

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军阀政府苛捐杂税的搜刮，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使广大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景下也只能勉强进行简单生产，极少有能力进行扩大再生产。一遇水涝干旱和军阀内战等天灾人祸，便出现大批破产农民，他们有的携儿带女闯关东，有的流入城镇卖苦力，有的沿街乞讨成为无业游民，也有的结伙成帮为匪盗或卖身当兵充炮灰。官僚地主则趁机兼并土地，兼营工商业者则廉价雇佣劳动力，以致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早在明、清两朝，枣庄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并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明清时期，滕县、峄县、枣庄、台儿庄等城镇，人口居住集中，手工业已较兴盛。民国时期，由于津浦铁路通车，运河水上交通便利，枣庄地区手工业、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时商号、贸易货栈四起，商贾云

集，矿区工商贸易繁荣，手工制作、百货、烟酒、饮食、纺织业都已初具规模，成为苏鲁豫皖交界地区重要的物资贸易集散地。滕县、峄县等城镇手工业和商业均有相当的发展。皮毛、纺织、酿造、建筑、造船、食品、铜、铁、竹、木等手工业遍布枣庄各地。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枣庄的近代工业也有了一定发展。但是，美、英、德、法、日等国工商资本家也纷纷来到枣庄地区。他们修铁路，开煤矿，建工厂，办商行，掠夺资源，倾销商品。一时洋布（细纱织布）、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面（机器加工的精细面粉）等洋货充斥、垄断市场，工业资源遭到野蛮掠夺，当地手工业和初兴的近代民族工业遭到无情打击。枣庄土纺土织行业也受洋人洋货的挤压而趋于衰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几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互相争斗，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商品、资本输出和资源掠夺，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趁机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另外，津浦铁路以及临枣铁路支线的通车，客观上也为枣庄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据记载，从清末至1919年枣庄地区各县先后建立煤炭、食品、酿造、面粉、制蛋、榨

油、皮革、火柴、铁业等民族近代工业 20 余家。一些手工业作坊、小煤窑等，通过技术改造，发展成为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如，中国最大的民办煤矿—枣庄中兴煤矿，由 1911 年年产煤 25 万吨，到 1920 年就迅速增加到年产 69 万吨。同时，枣庄地区的传统手工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与工业相关的商业、金融业、运输业、邮电业、饮食服务业也都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而当地的资产阶级也应运而生。枣庄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样，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到封建主义的约束；一方面由于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没有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一点，无论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一再表现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加紧了对枣庄的资本入侵和资源掠夺。同时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的各路军阀，连年混战，横征暴敛，地方官府和豪强劣绅也趁火打劫，敲诈勒索，造成农业破产，工商业萧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在外国资本倾轧和军阀战乱双重摧残之下，枣庄许多民族工业出现危机，或停产歇业或被外国资本吞并、控制。这表明，中国民

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即使有偶然振兴的机会，最终还是不能得到发展。

就枣庄的整个经济情况来看，这时的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无论是与农业总产值相比，还是与手工业总产值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分布极不平衡，除铁路沿线重要城镇之外，枣庄其他地区没有任何近代产业。

无论是外国资本企业，还是民族资本企业，资本家对工人均像牛马一样役使。工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所得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生老病死一切自负，资本家视工人的生命如草芥。枣庄中兴煤矿在 1895 年一次因缺乏安全措施而造成的水患就淹死 300 多名矿工。据 1904 年 12 月 30 日《捷报》中记载：山东中兴公司“外工每班在井下劳动 24 小时，所得工资 0.48 元，被包工头盘剥后，拿到手里仅 0.43 元。另外，井下工作环境恶劣，工人生命安全毫无保障，瓦斯爆炸、塌方等恶性事故经常发生，矿工在井下因事故死亡，资本家仅给 200 吊抚恤金了事”。1912 年至 1914 年，该矿工人因各种事故致死 853 人，致伤工人竟达 26044 人次。许多矿工住在窑户铺，他们平时披着麻袋片，出门下井时去当铺临时租裤子。遇到冰天雪地，常有矿工冻饿而死。中兴矿局设立“路

矿巡警局”，有 600 多人的巡警队伍。资本家将煤矿工人置于巡警的严密监视下，对所谓越轨工人，或送官府惩治，或押解示众。煤矿简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穷工人真可怜，铺的烂麦秸，盖的麻袋片，冻得脸发青，浑身打寒颤”。这些苦大仇深的矿工主要来源于破产农民，被称为窑工（当时把煤矿称为窑）。窑工苦力逐渐发展成为枣庄的工人阶级，到 20 世纪 20 年代，煤矿工人达到 2 万余人，为枣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枣庄革命斗争

一、辛亥革命在枣庄

20 世纪初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于 1911 年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彻底结束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尽管这次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但它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枣庄的仁人志士，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封建统治、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斗争。1905 年，同盟会成立之际，峰县、滕县籍留日学生孔繁蔚、吴绍麟、崔遽安、李庆施、渠有润、李善、尤吉三等人，先后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宣传三民主义，发展同盟会会员，为唤起民众做

了大量的工作。尤民、赵德胜、颜兰亭、李天倪、吴廷勋、张文源等人也分别在北京、济南和烟台等地加入了同盟会。当时，枣庄地区的同盟会会员发展到 100 多人。1912 年 6 月，在吴绍麟的帮助下，枣庄地区成立了同盟会峰县分会部，公推张文源为分会长，王介修为秘书，梁步海、田毓岳负责供给，张树真负责通信。吴绍麟以举人的身份团结开明士绅，掌握了峰县咨议局，对峰县衙门的政务进行咨议监督。尤吉三、渠有润、李善、袁永平等先后在峰县、滕县、台儿庄、临城等地开办新式学校，在传播文化教育的同时，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吸收进步士绅和学生参加同盟会。

在辛亥革命中，枣庄、峰县、滕县籍的尤民、张文源、刘子虞、吴廷勋、李应凯等几十位革命党人先后英勇牺牲。尤民（1886--1916），字超凡，辛亥革命后返回家乡峰县，与山阴的同盟会会员武璋秘密召集、策划起义，组织起 1600 多人的武装队伍，赶跑了峰县知县王崇昌。尤民率领队伍南下浦口，与陈干领导的青岛义军、刘冠三领导的郯邳义军汇合，合编为第三十九混成旅。陈干任旅长，尤民任总教练，活动在凤阳、固镇、宿州地区。不久，尤民去南京向黄兴汇报，黄兴非常赞同他的革命主张，让他返回山东，以陆军第四十混成旅旅长的

名义扩充军队。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通电反袁，江苏、上海、安徽等各省市纷纷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尤民与李应凯、吴廷勋决定策动东昌起义，因内奸告密，起义失败，李、吴被杀害，尤民遂到两淮地区，拉起一支革命队伍。1914年，他与刘大同、邓天乙等人率军走海路在安东卫登岸，结果登岸失败。尤民在青岛被捕，经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多方营救获释。1916年4月，尤民在江阴策动起义成功，任起义军总司令。江阴起义直接威胁着南京，江苏总督冯国璋、安徽巡按使倪嗣冲率万余军队包围江阴，企图消灭起义军。尤民率起义部队血战20余日，终因寡不敌众转移至上海。

1916年5月，孙中山委任尤民为山东讨袁护国军总参谋长，后任山东第一师师长，协助总司令薄子明指挥山东革命军讨袁斗争，不久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病死。孙中山回国后发表《约法宣言》，主张息兵谈判，调尤民去上海。尤民离开山东路经浦口时，被张勋部逮捕押解到徐州，受尽了折磨但英勇不屈，张勋于8月17日将其杀害，尤民时年31岁。1936年国民政府追认尤民为陆军中将，遗体由家乡台儿庄迁至济南千佛山东麓公葬，碑文镌刻“追赠陆军中将尤民烈士超凡之墓”。

二、山东建国自治军暨临城劫车案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吹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号角，可在1923年，枣庄地区却发生了一起仍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历史事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1920年前后，被编为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军的孙美珠、孙美尧农民武装占据抱犊崮山区，成为北洋军阀的心腹大患。1922年夏，北洋军阀调兵遣将对抱犊崮山区进行围剿，孙美珠、孙美尧率部奋力抵抗。8月，在西集战斗中孙美珠阵亡，孙美尧继任司令。他率领农民军继续抵抗，在三山战斗中重创了北洋军的新六旅，虽然大部突围，仍有300余人被困在抱犊崮山顶上。为了解围，1923年5月6日凌晨，孙美尧与孙桂芝等人在临城车站以南武装劫持了一列国际列车，将车上的美、法、英、意、墨西哥等外国乘客39人和中国乘客30余人劫持到抱犊崮山上。一时间舆论大哗，临城劫车案成为轰动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各国列强纷纷照会抗议，抱犊崮山区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

为解决临城劫车案，北洋政府立即停止了军事进攻，派许多政界要人和洋人与孙部进行谈判，孙部提出了政府取消苛捐杂税，外国人交回胶济路权，镇压二七大罢工的刽子手吴佩孚

必须向工人赔礼道歉，曹锟、田中玉等军阀头子下台等十个条件。谈判过程一波三折，后由江湖上的头面人物张聘卿、安青帮盟主张锦湖出面调停，招抚改编了孙美尧的农民军队。可是，北洋军阀又于1923年12月19日，将孙美尧骗到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大楼逮捕杀害，并将其部队遣散。

以农民为主力的自发斗争，给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打击，但是当时的农民斗争既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又没有先进的组织和领导，仅以封建迷信、帮会为号召，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最终难逃失败的厄运。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从而也证明，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需要有新的革命理论的先进阶级和政党来领导和完成中国革命。枣庄地区是中国近代煤矿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工人阶级队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不断壮大。同时，一支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也在枣庄成长起来。这些都为枣庄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

第四节 五四运动在枣庄

一、五四运动中枣庄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1919年，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为导火索的五四反帝

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首先在北京爆发了。山东各地的青年学生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发起的“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爱国运动。在山东的反帝爱国运动中，青年学生成为先锋，他们推动运动由宣传、抗议过渡到组织群众直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山东工人阶级在运动中也登上了政治舞台。5月2日，济南3000余名搬运工人连续举行大会，号召国人为“收回青岛，收回山东主权”而斗争。

在枣庄、峄县、滕县、韩庄等城镇，一些中小学生和进步青年纷纷响应。韩庄的进步教师张捷三、青年学生朱道南、孙伯龙等，在五四运动爆发后，成立了峄县学生救国联合会，孙伯龙任会长。他们开展了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斗争。滕县进步学生孔繁蔚等也成立了滕县学生救国联合会。这些学生群众团体纷纷组织起来，走向街头，召开声援会议，抗议日本企图侵吞山东的罪行。

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枣庄各地爱国运动的开展，也促使枣庄一批进步青年觉醒，勇敢地离开家乡走向社会，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而接触、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新文化运动、马列主义对枣庄的影响

辛亥革命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蓬勃发展。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中号召青年向陈腐的封建文化开展斗争。李大钊也在《新青年》发表《青春》和《今》等文章，鼓励青年不断追求进步，不怕困难，顽强战斗，冲决历史上一切罗网，催促青春之中国的诞生；提倡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枣庄地区尽管是受封建文化礼教影响较重的地区之一，可是一些有识之士也勇于冲破封建枷锁的羁绊，走向社会寻求新知识、新思想，在当地办起了新学校。峄县的进步女青年张笑寒等为了寻求报国之路，在家人的支持下，离开家乡到济南求学，成为枣庄地区第一个到外地上学的女学生。枣庄、滕县的进步人士李庆施、黄香谷、王仲阳等人，1912年秋就在滕县办起了第一所女子小学。该校不仅向学生们传授文化知识，还向学生进行男女平等、提高女权的教育。一些进步女青年也勇敢地走向讲台向学生讲授新的科学知识。如1914年，滕县的进步女青年孔繁纯、颜道慈等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到滕县女

小任教，向学生们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有些进步知识分子一面教学，一面拿起文学创作的武器，向旧世界宣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 20 世纪，枣庄的一批先进的知识青年勇敢地走向社会宣传新思想，如在济南求学的滕县青年张世炎等人，成为枣庄地区较早接触马列主义的进步青年。1921 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励新》半月刊，张世炎积极参与，并多次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徐州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员陈亚峰、郭子化等人创办的《赤潮旬刊》也对枣庄知识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吸引和影响了一批枣庄、峄县、滕县的有志青年，如田厚起、朱道南、杨荫鸿、张观成、孙业璜、谢学勤、杨荣林等，他们进一步学习探索马列主义，在亲身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锻炼，思想发生了变化，成为枣庄地区早期信仰马列主义的革命分子。他们大都在 20 世纪 20 年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有不少人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

枣庄早期出现的学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活动，为以后枣庄的建党和开展革命活动，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章

枣庄地区党组织的建立

1926年春，纪子瑞到枣庄开展党的工作，7月建立了本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枣庄矿区支部，领导煤矿工人开展工人运动，其后运动遭镇压而失败，枣庄党组织遭到摧残。但是这次斗争在工人中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以后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节 共产党人在枣庄地区的早期革命活动

中共北方区委和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对徐州、临城一带陇海、津浦铁路的工人运动十分重视。1923年7月，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副主任罗章龙到徐州、滕县、临城一带视察工作。罗章龙对枣庄地区进行了社会考察，并很快写出了社会调查报告，发表在党的刊物《向导》第九、十期上。文章主要分析了枣庄地区的社会状况，反映了滕县南山等地的商贩和贫民如何反抗官府横征暴敛、拒绝交纳山果税等内容。

罗章龙在指导徐州陇海铁路工人开展斗争的同时，为了使津浦、陇海铁路的工人运动互相策应，于1923年在临城车站，指导建立了铁路党支部。该支部曾经发动铁路工人，积极声援京汉铁路、陇海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1924年春，陇海铁路的工人运动遭到破坏，临城支部也停止了活动。山东省委在1928年12月向党中央报告组织工作情况时曾经指出：“临城有车站支部，过去有几个人，但未与党发生关系。”

1926年初，中共山东地方执委会派来了一位姓李的同志来到枣庄，住在三合街大桥一位青年电工房洪春家里的小旅馆里。房洪春和齐村的张福林一起在煤矿井下干电工。房洪春对张福林说他家里来了一位姓李的，像是传教的，待人很诚恳和气，常和一些人谈话。张福林当时有些好奇，想去看看，就由房洪春带他见到了那位李同志。李同志问张福林矿上生产情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家庭生活能不能维持等等。以后他就给张福林、房洪春这些矿工讲：工人为什么穷？资本家为什么富？为什么工人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而资本家则住着洋房，吃的好，穿的好，洋钱花不完，养得胖胖的？这些都是资本家剥削了工人的血汗，吃了工人们的血肉造成的。工人为什么穷？一是没有认识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更重要

的是工人像一盘散沙，没有什么组织，不能跟资本家斗争，不斗争永远改变不了工人贫苦的地位。后来他又告诉张福林和房洪春，要通过交朋友、处伙计、拜把兄弟等办法把工人团结起来。当时李同志没有职业掩护，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只住了三个月就离开了枣庄。

李同志走后不到半个月，一位姓张（张鸿礼）的同志在四月份又来到了枣庄矿区。张同志直接找到三合街南小围子张福林家，他也只告诉张福林他姓张，不说名字，住了两三天，开始问张福林矿区工人的生活和生产状况如何，张福林一一告诉了他。张同志让张福林领他到井下看看工人们的生产情况。随后，他又问张福林愿不愿意学习。张福林说：工人祖祖辈辈没有钱上学，能有学习的机会，哪有不愿意的？可是，上哪里学习？学多久呀？张同志告诉张福林到济南学习，时间不长，十天八天就回来了。张福林表示同意，于是，张同志就给了张福林一元钱作盘缠，并告诉他到济南胶济铁路工人宿舍（经一路）找一位叫慕洪伦的人。他到了济南找到了慕的家时，刚好来了一位铁路工人。张福林就上前问他：“这里有一位叫慕洪伦的吗？”那位工人对张福林说：“他坏了，坏了！”说完就走开了。张福林琢磨慕洪伦一家可能出事了，不能再找他了。于是，

他决定返回枣庄。

回到枣庄后，那位姓张的同志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也不知道他的去向。过了几天，也就是1926年4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纪子瑞到枣庄中兴煤矿，开展中共枣庄党组织的创建和工运工作。

第二节 枣庄矿区党支部和地下工会的建立

纪子瑞，1895年出生在山东胶县岔河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尽管家境贫寒，还是坚持在本村读完了小学。为了生计，跟着哥哥纪子祯到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做木工。他为人正直，追求进步，在工人中间很有威信。1924年10月，纪子瑞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胶济铁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队长，胶济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后在组织发动工人罢工斗争中因身份暴露转移到外地继续坚持斗争。

1926年，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革命力量在南方迅速壮大，使北方的反动军阀惊恐万状。山东军阀张宗昌多次发布“防止赤化宣传，禁止工农运动”的禁令，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以“剿匪”为名，派大批军队进驻枣庄，并与土匪勾结，欺压百姓，导致枣庄社会秩序十分混乱，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纪子瑞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来到枣庄中兴煤矿，开始了

艰苦的建党工作。

纪子瑞到枣庄矿区伊始，便找到了木匠活。由于他平易近人，人们热情地称呼他“纪师傅”或“纪大哥”，很快就赢得了工人群众的爱戴和信任。他以聊天讲故事的形式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工人为什么穷，资本家为什么富，是矿工没白没黑地干，挖出的煤炭换了钱，装进了资本家的腰包，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纪子瑞号召工人们只有团结起来同资本家斗争，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论是在工人的窑户棚里，还是在井下昏暗的巷道里以及电务处、机务处的机器旁，都能看到纪子瑞与矿工们亲切交谈的身影。他的宣传教育犹如在黑暗中点燃的明灯，使矿工们看到了光明。

不久，纪子瑞便秘密地开展建党工作，青年矿工张福林、郭长清等成为第一批党员发展的对象。张福林是齐村人，郭长清是枣庄窑神庙人。他们家境贫寒，自幼就在矿上捡煤渣，1917年前后到中兴煤矿做工。1926年4月，纪子瑞先后介绍了张福林、郭长清、蒋福义、王文彬、杜宝财、芮庆红、房洪春、陶洪元、刘雁德、吴均山等10余名青年矿工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正式建立了枣庄矿区党支部，纪子瑞任书记。

1926年9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告上海市民书》，

号召上海市民团结起来，组织职业团体，实行区域联合，加入革命政党，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进行反抗斗争。纪子瑞看后，认为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好材料，对于发动工人、启发群众思想觉悟极为有利，就连夜用毛笔誊抄两份，贴到井口的绞车房上和工人的窑户区内。党支部号召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宣传这份告市民书的内容。这份宣传品的传播，成了枣庄矿区工人运动的新起点。

布告贴出后，立即轰动了整个矿区，在工人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矿工们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好像社会马上就会变革似的。资本家发觉后惊恐万状，立即出动警察，撕掉宣传品，驱散了围观的工人群众，并在工人群众中散布“枣庄不是上海，枣庄工人没有文化，水平低，愚昧落后，想做煤矿的主人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白日做梦，共产党在枣庄根本不存在”等等。为了反击资本家的反动宣传，纪子瑞、张福林、郭长清等人在工人中间大力宣传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了工人們的士气。

1926年12月底，枣庄矿区赤色地下工会（又称地下工会）成立。张福林任工会主席，陈亚伦为组织委员，郑文洪任宣传委员，程洪年任秘书。工会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工人

运动。此时枣庄中兴煤矿工人在资本家和封建包工把头的压迫和剥削下，过着挨打受骂出苦力、饥寒交迫、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劳资矛盾十分尖锐，工人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斗争积极性。

第三节 枣庄矿区工人的反压迫斗争

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力量迅速壮大。1927年四五月间，北伐军打到徐州，张宗昌部逃走，枣庄矿区的资本家失去了依靠，惶惶不可终日，大股东纷纷逃到天津，仅剩副经理胡西林留守，中兴公司风雨飘摇。在这种形势下，纪子瑞召集矿区党支部开会，决定趁国共分裂还没有波及到枣庄之际，欢迎北伐军进驻矿区，发动组织工人开展对资本家的斗争，以改善工人的生活、生产条件，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和社会地位。

当北伐军逼近枣庄时，纪子瑞与支部成员便开始组织动员工人，做欢迎北伐军的准备工作。程洪年、陈亚伦负责机电里工的组织发动工作，张福林、蒋福义等负责井下外工的组织工作，纪子瑞、梁棠连夜赶写标语。郭长清、蒋福义等买来许多彩纸，分送到矿区各家各户，让工人家属连夜赶制小彩旗，人们为欢迎北伐军彻夜不眠地忙碌着。大人小孩相互传唱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打倒军阀”的歌。枣庄的大街小巷、

矿区内外，到处贴满了“欢迎北伐军”“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打倒军阀”“工人弟兄团结起来，反对剥削压迫”等标语。

1927年6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贺耀祖部的队伍进入中兴煤矿公司。纪子瑞等组织了1000多人的欢迎队伍，冲破资本家走狗的阻挠，涌出枣庄矿区南门欢迎北伐军进矿，并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纪子瑞主持会议，号召矿工们团结起来，同资本家斗争。北伐军代表也在会上表示支持工友们的革命行动。矿工们更加坚定了团结起来同资本家斗争的决心，纷纷报名参加工会组织，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9000多人。世世代代当牛做马的“煤黑子”再也不堪忍受任人凌辱的悲惨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觉醒了，一场大规模的工运狂飙将要席卷这沉寂的矿区。

枣庄矿区党支部决定，首先展开对中兴煤矿巡警局长杨竞业的斗争。杨竞业是资本家的忠实走狗，他依仗主子的势力整天耀武扬威，随意抓捕、毒打工人，民愤极大。枣庄党组织发动100余名工人群众，包围了煤矿巡警局，巡警士兵纷纷逃走，杨竞业也想逃走，被郭长清一把抓住，揪到中兴公司办公大楼门前进行批斗。平时专横跋扈的杨竞业，此时威风扫地，不断

地向工人求饶。斗争初战告捷。

这时，中共枣庄矿区支部看到全矿大多数工人都发动起来了，认为把煤矿工人组织起来公开同资本家作斗争的条件已成熟，随即在南大井绞车房召开了有张福林、蒋福义等 30 多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纪子瑞主持会议，研究决定第二天召开全矿工人大会，控诉资本家的罪行，公开劳工会组织，并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提高工人地位的要求。6 月 28 日早上，成千上万名矿工，手拿小旗，浩浩荡荡地涌向会场。资本家看到这种场面非常害怕，让矿警们赶快关闭中兴公司大门。可是，滚滚的人流早已经把大门冲开，农村赶集来的人群也汇入队伍，更扩大了矿工队伍的阵容。上午 8 时许，资本家胡西林被押上台，会场不断响起“反对剥削压迫”“劳工神圣”“推翻剥削制度”的口号声。在会上，矿工代表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罪行。在铁的事实面前，胡西林只好低头认罪。随后，纪子瑞在大会上宣读了枣庄中兴煤矿劳工会向资本家提出的 16 条要求。主要内容是：1、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2、工资一律提高。3、每年须加薪一次，至少 4 元，不得无故开除工人。4、每年分派“花红”（奖金），工人与司员一律平等。5、公司须建造工人住房，电灯、自来水一切齐备，地点由工

人指定，限半年内完竣。大小工一律发煤一吨。6、工人退休时必须发退休金。7、凡工人生病，要双方指定医院调治，医药等费用均由公司负担，病人工资照给。因工受伤者要发给双份工资；因工死亡者要按其最近工资数目发给三年工资的抚恤金，以安家室等。上述要求代表了工人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显示出枣庄中兴煤矿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其思想觉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6月29日，劳工会十几个委员带领百余名工人积极分子，拿到工会16条文件，到公司办公大楼让胡西林签字。胡西林看到条款后，推三阻四不想签。代表们识破了他的伎俩，程洪年警告他如果不签，就通知水泵房停机，淹了矿井由他负责。迫于压力，胡西林勉强在文件上签了字，斗争取得了胜利。

这次枣庄工人运动初步显示了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劳苦大众利益的政党，是领导中国走向胜利的政党。枣庄工人运动的兴起，揭开了枣庄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第四节 组织成立南下工程营

正当中兴煤矿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北洋军阀直鲁联

军安国军第七军团长褚玉璞率领徐源泉的第六军和许琨的第七军分三路反扑鲁南、枣庄。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宁汉分裂，国内政治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复杂。

1927年7月，占据枣庄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南撤。资本家也趁机造谣：“直鲁联军打过来，对闹工潮的积极分子抓住统统杀掉。”一时间，矿区内外人心惶惶。矿区党支部决定组织工人成立南下工程营，通过与贺耀祖交涉同意，在保持工程营独立建制的情况下随军活动。矿区党支部命张福林、郭长清、巩继伦等负责。工程营队伍很快发展到500余人，下分三个分队、九个小队。撤离前工程营奉命破坏了枣庄至台儿庄之间的铁路，炸毁了王沟和峰县侯桥、南关等铁路大桥。

工程营随北伐军撤走后不久，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就重新占领了中兴煤矿。中兴资本家及其走狗们便投向他们的怀抱。资本家狐假虎威，派出走狗大肆恐吓、敲诈随军南下工人的家属。由于南下工人太多，资本家害怕逼迫急了众怒难犯，引起急变，不好收场，加之工人家中一贫如洗没有值钱的东西，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工程营一路南下，为北伐军架桥铺路，出力流汗。到了南京后，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因在宁汉分裂时站在蒋介石一边，

被提拔为国民党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兼南京卫戍司令。贺耀祖成了蒋介石的大红人，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企图收编工程营。纪子瑞、张福林、郭长清等发觉后，便果断地解散了工程营。纪子瑞由南京取道上海，乘船返回山东青岛。工程营一部分工人去了淮南，一部分去了贾汪，张福林、郭长清、蒋福义等百余名工人于1928年春返回枣庄。

北伐军撤走、枣庄中兴煤矿被奉系军阀占领后，原来资本家签字答复的16条也就化为了泡影。

第五节 枣庄矿区失业工会的建立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批判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党的八七会议成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点。

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再次占领鲁南，先后在峰县、枣庄建立了县、区政府和党部。蒋介石为了榨取中兴煤矿公司更多的油水，派特派员俞飞鹏进驻煤矿，成立了中兴煤矿整理

委员会，几次电令资本家派代表前去谈判未果，便采取高压手段，强行没收煤矿的经营权，查封了运河沿岸煤栈的所有存煤和物资。中兴煤矿的资本家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苦了煤矿工人。由于资本家长期不发工资，枣庄数千名煤矿工人生活十分贫苦。工人们多次去资本家那里交涉，要求发还拖欠工资，资本家根本不管不问。张福林、郭长清、蒋福义、王文彬等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借国民党政府打出的“劳工神圣”的招牌，向峰县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组织失业工会的书面报告。当时国民党当局也想借工人的力量向资本家施压，便同意了工人们的要求，很快成立了枣庄中兴煤矿失业工人工会办事处（亦称外工会）。张福林、郭长清、蒋福义、王文彬等人被选为工会负责人。外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广大的失业工人，团结互助，为失业工人谋利益，向资本家和国民党新军阀提出要求复工和救济、发还拖欠的工资等条件。外工会成立后，通过广泛地宣传和发动，会员很快发展到 1000 余人，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面对外工会力量的逐渐强大，资本家也唆使几个亲信马保才、韩培显、王东樵等人成立了中兴矿工同业工会筹备处（亦称里工会）。里工会秉承资本家的旨意，经常派人监视外工会的活动情况，在工人中间招摇撞骗，挑拨离间，企图破坏外工

会的威望。

6月初，资本家企图破坏工人的团结，在没有给外工会任何答复的情况下，让里工会先鼓动一部分人上班。张福林、郭长清、蒋福义等人立即向工人们宣传，不要上资本家的当，失业工人要复工应该同时都复工。工人们识破了资本家的阴谋后纷纷离开了矿井。马保才等里工会头头向资本家报告说：“开工之时，井下工人被张福林、郭长清等人鼓动不欲工作，大有罢工之势，数百名工人在大井口纷扰。查张福林、郭长清等任外工会要职，实为不良分子，应请钧处设法制止，以期防患未然。”面对里工会的破坏和捣乱，张福林、郭长清、蒋福义、王文彬等人极力在工人中间揭露里工会出卖工人利益的丑恶嘴脸，使原来一些不明真相加入里工会的工人群众看清了里工会的反动本质，纷纷退出。

7月11日，外工会在鞠仁广场召开了失业工人大会，公开成立了中兴煤矿失业工人工会，民主选举了张福林、郭长清、蒋福义、王文彬等9人为工会执行委员，张福林任工会主席。工会就如何继续发动工人同资本家斗争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要想给资本家更大的压力，必须把上班的工人发动起来，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上班工人与失业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希望上班工人积极参加斗争，支持失业工人的正义斗争。外工会负责人的宣传立即引起了上班工人的共鸣，他们纷纷要求资本家赶快发还工资，不然就举行罢工。

资本家见外工会负责人不好对付，便通过国民党驻矿代表请求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山东省政府给予帮助。蒋介石给山东省党部下令转峯县党部，要求解散外工会。外工会的成立是经过峯县党部同意的，强令解散外工会，峯县党部自觉理亏，执行不力。国民党整理中兴公司委员会主任俞飞鹏亲自到南京奔走求援。国民党中央党部便派周学昌以中兴煤矿“工会整理委员会”主任的身份来到枣庄。周学昌以钦差大臣的架势，几次在中兴办公大楼门前召集工人开会，故意摆出凌驾于里、外工会之上和局外人的样子对工人群众进行恐吓，企图采取里外工会同时撤销的办法，达到取消外工会的目的。周学昌的阴谋很快被外工会负责人识破。外工会负责人准备对资本家勾结国民党新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罪行予以揭露，开展更大的斗争。

8月17日中午，国民党驻矿当局策划了新的阴谋，派王东樵通知外工会负责人，“周学昌答复了外工会提出的全部条件，让派代表前去洽谈”。外工会立即派张福林、郭长清、蒋福义、王文彬等4人前往，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反动军警突然

袭击，全部被捕。矿警四处抓捕工人，枣庄矿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其他工会负责人和工人积极分子纷纷逃往外地。外工会发动和领导的这次工人运动还没有爆发，就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血腥地镇压了下去。

张福林、郭长清、蒋福义、王文彬等人被捕后，被关押在中兴大楼地下室里。不久，他们又被押往泰安和济南监狱。在狱中，他们一口咬定是为了生计，才被失业工友们推举为代表，向资本家提出要求复工和发还拖欠的工资，表现得都十分坚决勇敢。由于国民党当局拿不出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最后把他们分别定为“政治犯”，判处7年徒刑。入狱不久，他们与狱中的秘密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积极参加了狱中党组织的对敌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在斗争中，郭长清因病去逝。张福林、蒋福义、王文彬被抓回，受尽了百般折磨，始终没有暴露狱中党组织。1934年10月，他们相继出狱后，又找到党组织，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中。

纪子瑞到枣庄创建党组织，组织领导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揭开了枣庄革命斗争的新篇章，其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尽管这一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取得胜利。但是，它使枣庄人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在煤矿工人中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为党在以后的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首先是党组织在矿区活动时间短，根基还很不牢固。其次，斗争策略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北伐军的南撤，应该在矿区留下一批革命种子，而事实是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也随之撤走，党组织没有留下骨干力量，为以后工作带来了困难。正如中共山东党组织在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兴煤矿百余人之支部，随党军之撤退而全部瓦解。”后来，党组织曾多次派员到枣庄恢复开展工作，都因煤矿停产、白色恐怖严重，实在无法存身，以致中辍。也使张福林、郭长清等一批重返中兴煤矿的共产党员，在重新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没有及时得到党组织的领导而失败。

第三章

中共枣庄特委的建立及其革命斗争

1931年春，中共山东省委派田位东、郑乃序到枣庄矿区

开展党的工作，建立枣庄特委。特委组织领导矿工举行大罢工，由于工贼的出卖，田、郑先后被捕，惨遭敌人杀害，工人积极分子大批被捕或遭解雇，一般工人也失去了起码的人身自由。但是罢工中田位东、郑乃序等共产党员勇敢向前、不怕牺牲的英雄形象，极大地鼓舞了工人斗争的勇气，提高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为后来党领导枣庄工人运动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第一节中共枣庄特委的建立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军阀韩复榘确立了在山东的统治地位，尽管他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但在反共、反人民、镇压革命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在其统治下，中共山东省委屡次遭到破坏，大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有的被捕入狱，有的惨遭杀害，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在枣庄，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从1929年到1930年期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其主要原因：一是从1928年失业工会领导的工人运动被镇压、负责人被捕后，工人稍有活动反动当局就扣以共产党的“红帽子”予以镇压，一些工人群众对反动统治势力存有恐惧心理；二是国民党加强了对矿区的统治，韩复榘派重兵盘踞枣庄，国民党一些大员们为了经济利益经常出入枣庄中兴煤矿，一些便衣、特务活动频繁，横行

于枣庄大街小巷；三是由于受党内极“左”错误路线的影响，党组织盲目暴动，多次遭到破坏，力量不足，向枣庄派不出人来；四是枣庄煤矿因受战争破坏，元气大伤，厂矿停产，工人失业，外地人无法立足。

中共中央曾多次指示江苏、山东党组织派员恢复枣庄党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山东省委也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枣庄矿区党组织的恢复问题。1930年7月，山东省委就鲁南、鲁西工作问题给中央报告中指出：“恢复和创建鲁南党组织，为目前重要任务。若臣（张若臣、山东省委常委）同志在沪与江苏行委（行动工作委员会）面商的结果，除一面由鲁委派人赴鲁南工作外，一面由苏行委在徐海区调大批人赴鲁南，此种办法确为目前需要。”1931年3月12日，中共山东省委、江苏行委分别派员到徐州，通过共产党员、裁缝步雪樵的关系，邀枣庄的进步青年邱焕文到徐州，通过考察，由田位东、郑乃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召开会议。山东省委委员程季平在会上介绍了关于开展工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枣庄的形势，决定成立中共枣庄特区委员会（简称特委），隶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会议任命田位东为特委书记，郑乃序为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会议还研究了关于如何开展枣庄工作的方案，要求

利用关系深入矿区，接触工人，团结工人，发动罢工，建立革命武装，然后转移至抱犊崮山区成立红色游击队，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以牵制国民党军队对江西红军的“围剿”。

会后，田位东、郑乃序由邱焕文陪同到枣庄，最初特委机关设在齐村邱焕文家里。几天后，邱焕文就把他的朋友孙伯英、王子刚介绍给田位东、郑乃序，不久发展他二人入党，并派他二人回家乡棠阴一带工作。之后，田位东化名田秀川，郑乃序化名陈明道到中兴煤矿齐家包工柜下井挖煤。他们积极接触工人，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工友。为了解决矿工们的生活困难，特委成立了枣庄矿区互济会，由田位东、郑乃序分别任正副主任，邱焕文、孙伯英、王子刚、吴洪起（女）为委员。互济会在矿工和农民之间架起了团结互助的桥梁，农民们的粮食通过互济会合理的价格收购，减少了中间商人的盘剥。工人们直接从互济会那里买到了价格便宜的粮食，而农民的收入也相应地提高，互惠互利，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孙伯英、王子刚在资助矿工粮食等方面做出了成绩，并在家乡峰县棠阴一带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他们为了资助特委的工作，都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党的活动经费。枣庄特委根据工作的需要，于1931年4月成立了中共峰西工作委员会，孙

伯英任工委书记，王子刚任副书记。峰西工委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矿区特委开展工人运动，并在农村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组织，支援策应工人斗争，峰西农村党的工作也很快开展起来。

第二节 组织秘密工会与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

田位东、郑乃序通过下井与工人进行广泛接触，使党的工作逐渐开展起来。建立了互济会后，一些贫困的矿工家庭得到了一些救助，工人们很快团结在他们的周围。之后，他们就开始了在矿区建立工会组织和发展党员的工作。为了便于工作，田位东、郑乃序由齐村搬到枣庄矿区居住。他们在井下劳动中发现工人积极分子，便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先后介绍了20余名工人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而后成立秘密工会，由郑乃序负责，工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力量不断加强。

为锻炼工人的斗争精神，特委决定带领矿工们首先开展惩罚反动把头的斗争。一个姓陆的封建把头，经常打骂欺负工人，民愤很大，工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路倒”，特委决心先从惩罚他开始，通过斗争，不仅惩罚了“路倒”，其他一些反动把头吓得再也不敢打骂虐待工人了。其后又惩治了包工柜头子邓西惠，此人非常奸诈苛刻，剥削工人的诡计最多，每月要

扣除工人的工具费、租灯费、灯油费等等。工人因生病休息，按规定应该有一半的工资，可他却不给，每到发工资时他总是拖三阻四，迟迟不发。工人的工资也被他三扣两扣所剩无几。其他的一些包工柜也纷纷效仿。他的恶迹早已引起工人的强烈愤慨，多次提出抗议。邓西惠依仗着资本家为其撑腰，依然是置若罔闻，并对提出抗议的工人进行打击报复，威胁工人如果不听话就解雇。田位东、郑乃序决定打掉他的嚣张气焰，派出代表与其交涉，并提出三个条件：一、要按时交接班，不准延长工作时间；二、工人工作时间达到半班，应该发给半班工资，超过半班应该发给一班的工资；三、工资应该及时发放，不准拖欠。邓西惠躲而不见，代表们愤怒之下，砸毁了他的包工柜和部分工具，并限令他向工人代表赔礼道歉，答复条件，否则工人将举行罢工斗争。资本家害怕事态闹大不好收场，强令他尽快解决，否则，就取消他的包工资格。迫于压力他只好低头向工人赔礼道歉，答复了工人所提出的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克扣工人的工资。这场斗争获得了胜利。

特委有意识地通过这些斗争培养和锻炼工人们的团结战斗精神，为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七月大罢工失败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枣庄中兴煤矿的资本家害怕战争扩大，影响煤炭销路，就压缩生产，减少开支，大量裁减工人。他们企图用80个工人去承担140个工人的工作量，用增强劳动强度的办法来维持高额利润，因而激起了工人们的强烈愤慨。4月22日，中共枣庄特委发动4000余名矿工进行罢工。由于资本家的破坏，这次斗争仅坚持了4天就告结束。

春季开始分“花红”，资本家仅发给里工，外工则没有，广大外工强烈要求里外工待遇一律平等，而里工对取消煤炭津贴也怨声四起。枣庄特委召开会议，讨论研究了矿区形势，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矿工开展争取分“花红”的罢工斗争。会议号召每个积极分子都要团结三五个工人群众，向他们宣传争取分“花红”的意义。特委将秘密矿区工会分成17个分会，对全矿工人进行组织发动。工会连夜书写标语、传单。一夜之间，矿区办公大楼门前墙上、井口房、绞车房、井口大架子上都贴满了标语口号。矿工家属也组织了纠察队，全矿大多数外工都行动起来了。7月16日8时许，特委在峰县城北十里泉召开了工人罢工动员大会，六七千工人涌向会场，特委书记田位东登台讲话，他列举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工人的种种罪行

和煤矿的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提出了要资本家答复的三个条件：（一）减少工作时间，实行 8 小时工作制；（二）增加工资，里外工待遇平等，取消包工制；（三）把多年所欠的红利立即发还外工。不答复要求，决不下井。会议选出代表与资本家交涉，当工人代表走到西南门外时，被反动军警持枪拦住，代表队伍被冲散。

特委当即在石碑村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分析了资本家不接见工人代表，表明资本家对工人的行动有所察觉，可能有新的阴谋。会议要求广大外工要继续坚持斗争，并争取里工弟兄的同情和支持。会议还决定，为造成更大的罢工声势，于 22 日在窑神庙召开第二次罢工斗争动员大会，然后进行示威游行，并用两支短枪，对付中兴公司门岗，游行队伍冲进公司里，劫走德国矿师柯里克，撤到抱犊崮山区打游击。这是这次罢工的中心目的。会议还研究了如何派一批工人潜入公司里作内应的有关事宜。

7 月 22 日，数千名工人聚集在枣庄煤矿南部窑神庙广场上，田位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分析了罢工斗争夺取胜利的有利条件，号召里外工弟兄团结起来，共同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坚持到胜利。而后，工人代表一一上台发言。大会正在紧张进

行之际，突然被军警包围，会场一时大乱。反动军警冲进会场逢人就抓，田位东和部分工人代表当场被捕，郑乃序等在混乱中冲出包围。会场被砸，工人四散，枣庄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下午，特委在齐村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营救被捕人员的方案，会议认为只有坚持罢工，夺取胜利，才能救出被捕同志。为防止敌人继续破坏，会议决定让身份暴露的人即刻转移到外地，并决定让郑乃序也离开枣庄。郑乃序坚持说：“罢工如同打仗，打仗正在关键时刻，指挥员怎么能离开战场呢？我不能走！”他坚持和大家共同斗争。经再三劝说，他才答应转移，工作由朱同云接替，并通知各小组于24日下午6时在十一幢碑处交接工作。

24日下午6时许，当郑乃序往十一幢碑处走去时，突然看见工人佟振江和孟广银气势汹汹地走来，后面跟着矿警。郑乃序恍然大悟，怒骂了一声：“狗杂种，叛徒！”当即想跑开时，一个矿警冲上来刺伤了他的腿，郑乃序不幸被捕。幸好其他人尚未到达。郑乃序为了掩护其他人员，不住地高声叫骂。前来交接工作的人闻声知道情况有变，立即转移，才未遭毒手。在罢工斗争的关键时刻，由于工贼出卖，特委领导人相继被捕，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罢工失败了。

田位东、郑乃序被捕后，敌人将他们分别关押在中兴办公大楼的地下室里。资本家摆上宴席，请田位东赴宴。劝说田位东投降时，田位东一脚踢翻了桌子，大骂资本家无耻，勾结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工人运动。

国民党中兴煤矿当局对郑乃序进行审讯。在审讯室里，一个国民党审讯人员伪善地说：“年轻人，不要轻信赤化宣传，中国不是俄国，不适合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适用，你们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只要幡然悔悟，政府一定会器重你的。”郑乃序当即反驳：“共产主义不是谁要谁不要的问题，她的传播不分国界、地域，就好像冬天要过去，春天要到来一样，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我们工人为了生存，争取‘花红’，何罪之有？工人用血汗钱养肥了资本家，难道争取分‘花红’还不应该吗？你的良心哪里去了？”郑乃序的慷慨陈词驳得此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几天后，田位东、郑乃序被押解到峰县国民党监狱。峰县反动当局几次审问，企图收买软化他们，都遭到了严词拒绝。敌人又用酷刑对他们进行摧残，结果除了遭到怒骂外，一无所获。敌人软硬兼施花招耍尽，均遭到失败，无奈之下只得将他们押往济南。

田位东、郑乃序离开峰县城的那一天，大街小巷挤满了围观的群众。他们一边行走，一边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屈膝投降，致使东北沦陷；对内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许多围观群众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到济南后，敌人多次审问他们，田位东怒斥道：“我们犯的什么罪？资本家榨取工人的血汗钱，我们工人提出条件，向资本家讨回应该得到的‘花红’，他们不仅不给，反而镇压工人，犯罪的是资本家，你们应该审判他们。”一位审讯者假惺惺地说：“工人提出的条件可以答复，但是，你们犯的是煽动工人闹事，颠覆政府罪，只要供出同党和领导人，保证你们平安出狱，否则你们知道韩主席的厉害。”田位东听了放声大笑，回答道：“我们罢工是为了工人的生存，代表了群众的利益。至于你们的政府，镇压工农，与人民群众对立，将来一定会垮台，无须我们颠覆。你问的同党，枣庄煤矿数万工人都是我的同党，我们为他们谋利益而死，感到无尚的光荣。”

国民党山东省反动当局于1932年8月7日，在济南千佛山下将田位东、郑乃序杀害。就义前，两位烈士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在省政府门前向围观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痛斥了国民党政府反共、反

人民，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东北沦陷，对内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他们高唱《国际歌》，表现出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8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田位东、郑乃序两位烈士牺牲和枣庄中兴煤矿罢工失败的情况。报告中写道：“枣庄特委的两位负责同志已经于上礼拜牺牲，他们临死时表现得非常坚决，在省政府门前向群众讲演半个小时之久。”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都对两位革命烈士的事迹作了充分肯定。

田位东、郑乃序的牺牲无疑是中共党组织的重大损失。枣庄的这次工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敌人的屠杀政策吓不倒共产党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更大的革命斗争将会再次掀起。

第四章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建立

田位东、郑乃序牺牲后，中共徐州特委派郭子化来枣庄，

他以枣庄矿区为基地，以行医作掩护，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恢复和重建了枣庄及其周边 20 多个县的党组织，建立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至抗战前夕，共发展党员 300 多名，被刘少奇誉为“白区斗争的一面旗帜”。

第一节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建立

一、中共徐州特委派郭子化来枣庄重建党组织

1932 年 7 月，枣庄特委组织领导煤矿工人举行争取“花红”大罢工失败后，领导这次罢工斗争的枣庄特委书记田位东、副书记郑乃序，由于工贼出卖先后被捕，惨遭敌人杀害。党和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相继被捕，大批积极分子被解雇。这时，资本家更是肆无忌惮地指使叛徒、工贼严密侦察监视工人的行动，强化对工人的统治和剥削。盘踞在山东的军阀韩复榘也将一个团的兵力派驻枣庄，与枣庄的反动军警督察队、捕共队和矿警队一起，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肆制造白色恐怖，不仅禁止群众集会，就连三两个人交谈也被当作嫌疑分子跟踪监视。对旅馆、客栈来往的行人检查更严，凡没有保人者，住店不得超过三日，整个枣庄被搞得人心惶惶，惊恐不安，环境更加恶劣，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为了恢复枣庄党组织的工作，中共山东省委、江苏行委

曾多次派人到枣庄开展工作，但都因枣庄环境恶劣、又无职业作掩护，无法存身被迫离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徐州特委决定派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郭子化，到枣庄矿区恢复发展党的工作和开展工人运动。

郭子化，原名郭邦清，字子化，江苏省邳县郭宋庄人。1896年10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由于家贫，断断续续读了几年书。1918年，考取了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在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些进步同学创办了《赤潮社》，出版发行《赤潮旬刊》。郭子化先后当选为徐州第七师范学生会会长、徐州市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徐属八县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他先后多次组织和领导了徐州爱国青年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游行示威，并参加了驱除第七师范学校反动校长陆裕南的罢课斗争。

1923年秋，郭子化从徐州第七师范毕业回到家乡后，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在家乡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兴办“峰黄植树公司”，植树造林绿化荒山。但却遭到了当地封建地主势力的强烈反对和破坏，郭子化和其他几名进步青年的家被放火烧坏。经过半年的斗争，郭子化等人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

打赢了这场官司，但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认识到靠兴教育、办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投身革命，彻底变革社会制度，才是成功之举。从此，他离开家乡到北京朝阳大学，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6年，郭子化满怀报国之志，毅然决定弃学从戎南下武汉参加北伐军。10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他离开了武汉，先后转移到安徽泗县、灵璧、江苏沛县和河南永城等地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1932年10月，郭子化化名庞沛霖，以行医作掩护，同七叔郭春湖一起肩挑药箱，从徐州步行来到枣庄，投宿到枣庄洋街南门外西小巷宋家店。宋家店是专供打拳卖艺、测字算命和卖野药之人居住的旅店。店主宋二上通官府、下联江湖、内通警察，在枣庄街上小有名气。郭子化到来这天，正逢宋二的夫人有病。郭子化当即提出要给宋二的夫人看病，诊断之言皆与病情相符，颇得宋二赏识，欣然留郭子化住下。当晚反动军警查店，对郭子化进行刁难盘查时，宋二主动与军警周旋，使郭子化不但顺利通过了盘查关，而且无形中得到了宋二的保护。自此，郭子化在宋家店暂时住了下来，每天早出晚归，走遍矿区，一边行医治病，借此机会联系矿工，一边了解情况，考虑

如何在枣庄立足。18天后，郭子化在枣庄老街西门外鸡市口租了两间用秫秸作墙四面透风的草屋，开设了一间中药铺——“同春堂”药店。

复杂的社会环境，严重的白色恐怖，给初到枣庄的郭子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时他既无上级党组织拨给的活动经费，又无亲戚朋友的接济，仅靠看病卖药挣几个钱糊口，生活十分窘困。幸好住处附近有个卖煎饼的张百贯老人，忠厚善良，乐于助人。郭子化在没有吃的情况下，就到他那里赊煎饼。这年冬天，已是滴水成冰，他既没有棉衣过冬，也没有钱交房租和还煎饼账。无奈，他只好将自己唯一值钱的怀表卖掉，还了账后，剩下的作路费到沛县小屯，找到了中共党员丛衍瑞、丛林、丛慎为、冯德为等人。

郭子化这次去沛县，对外说是专为找老朋友话旧和解决冬衣问题，实际上是去了解考察沛县党组织的活动情况。早在1930年，他就受中共徐州党组织派遣到沛县的望湖小学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发展了沛县小屯的丛衍瑞、丛林、李朝选、刘桂友、姜友祥等人加入中共党组织，建立了两个支部，丛衍瑞、丛林分别任支部书记。郭子化在丛衍瑞的牛屋住下后，与丛衍瑞、丛林等人一起开会交流情况，商议如何

恢复沛县党的工作。郭子化给他们讲全国革命形势，总结过去泗县、永城等地搞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提出开展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并说只要我们善于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革命就一定能够成功。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就是党组织一有点力量就搞武装暴动，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党组织和群众都遭受很大损失。革命光凭一股热情，盲目搞武装暴动是不行的，必然要失败。这些话使丛衍瑞、丛林、冯德为等人倍受鼓舞，更加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学到了不少开展工作的具体策略和方法。郭子化在沛县小屯住了七八天，返回枣庄时，丛衍瑞、丛林、冯德为等人送给他两件棉衣和几块钱。郭子化走后，中共沛县大北区委恢复成立，丛衍瑞、丛林先后任区委书记。

1933年1月下旬，郭子化为了工作的需要，写信调丛林到枣庄开展工作，并让丛林转交给他的老朋友二郎庙开明士绅杨德斋一封信。丛林将郭子化的信转交给杨德斋后，带着杨德斋的复函以及十块银元，到枣庄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1933年春节后，郭子化就以这十块银元作本钱，在枣庄老街鸡市口将简陋的“同春堂”扩建成了条件稍好的药店，购置了简单的医疗用具。为了掩护党的工作开展，郭子化还将他

的夫人曹氏从邳县老家搬来枣庄，加上丛林、郭志远、肖平等这些年轻人当司药，真像一家生意红火的药店。郭子化在工作中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回民王宝增、王宝学兄弟二人都是矿工，思想进步，郭子化先后介绍他们加入了党组织。受其进步思想的影响，王宝增的儿子王寿山也到“同春堂”药店当司药，而且聪明能干，思想进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子化在枣庄矿区开展工作的同时，还注意在医药界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距“同春堂”药店北约30米有家广仁医院，门联上写着“热心济民，冷眼看财”，引起了郭子化的注意。经过了解，这家医院的医生褚雅青，系微山张阿人，为人性格豪爽、追求真理，早年到南方

参加了北伐军。1927年返回家乡到徐州基督医院学医两年，后到枣庄大洼街开办了广仁医院。郭子化很快发展褚雅青为中共党员。褚的夫人袁化坤追求进步，后来也加入了中共党组织。褚雅青开设的广仁医院成了枣庄党组织的秘密接待站。接着，郭子化又与南马道德顺兴药店的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扩大了枣庄党组织的力量。

郭子化在工作中总结了过去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认识到

“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因此，他在枣庄开展工作之初，就十分重视隐蔽斗争的特点和方法，慎重发展党员，将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强调要采取“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为了能在工人中间扎下根，郭子化以“同春堂”药店医生的身份作掩护，经常深入到工人居住的工棚，广泛接触工人群众，与矿工交朋友，了解其疾苦，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遇到生活十分困难的工人和群众看病，就少收钱或不收钱，他坚持“穷人吃药，富人拿钱”的行医原则，因此很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在组织建设上，他先后发展了矿工李长庚、陈二友、梁允才、傅宝兴、王明增、王宝学等人加入了党组织，于1933年2月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支部。1933年3月，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工委，郭子化任书记，褚雅青、陈二友、梁允才、王明增任委员。郭子化又从徐州、邳县调郭日高、郭致远等来枣庄工作，党的力量在枣庄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郭子化在枣庄党组织发展的界别上，由原来仅限于产业工人，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在医药界、商业界、教育界、军政界和农村先后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就连韩复榘在枣庄的驻军中，也发展了李占奎、张文才等七八人为中共党员，建

立了特别支部。为了能及时掌握国民党枣庄警察局的情况，郭子化通过关系让共产党员李殿臣打入警察局内部，广交朋友，发展党员。他们在向党组织传送情报、帮助掩护革命同志、保证交通安全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工作中郭子化还注意发展少数民族群众入党。回族青年李微冬、张鸿仪、李汝佩等在郭子化的帮助和教育下也先后加入了党组织。从此，郭子化在枣庄站住了脚，“同春堂”药店也成为枣庄党组织的活动中心。

二、领导争取“花红”斗争

郭子化到枣庄后，看到和听到煤矿工人议论最多的还是分“花红”不均的问题。1932年7月，大罢工被镇压下去，劳资矛盾更加尖锐，斗争的焦点仍然是在“花红”分配不均上。煤矿工人对资本家实行的不合理的分“花红”制度深恶痛绝，对里工、外工不平等待遇，反应极为强烈。当时在枣庄煤矿中，外工人数占全矿工人80%以上，而且都是从事井下体力劳动，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生产作业条件最差，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们待遇却最低，拼死拼活干一天，只能挣四角三分钱，别说养家糊口，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而公司的经理和矿师每月收入3000多元，还有“花红”。因此，外工对资

本家这种不公平的规定一直不满，强烈要求享有分“花红”的权力。郭子化和矿区工委认真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外工的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应该予以支持。为了提高工人觉悟，锻炼工人的斗争精神，矿区工委决定充分利用这一矛盾，再次发动和领导工人开展争“花红”斗争。

为了确保这次斗争的胜利，郭子化和矿区工委周密谋划，总结了1932年7月罢工失败的教训，决定改变过去罢工斗争的盲目性，强调采取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开展这次斗争。首先从宣传教育入手，利用工人骨干和积极分子，到外工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和斗争信心。在矿区广泛宣传外工在煤矿生产上的重要作用。通过宣传发动，争取广大里工和矿警士兵对外工的同情和支持。其次，在斗争策略上，利用黄色工会（资本家组织的工会，工人们称“黄色工会”）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支持外工的斗争。在斗争方法上，郭子化要求在这次斗争中，党组织的负责人尽量隐蔽，公开的活动让有威望的工人代表出面与资本家交涉。同时，矿区工委进行了明确分工：王明增、傅宝兴、梁允才、周宗勤、李殿臣、王宝亮等负责向里工的宣传教育；郭日高、李殿臣等负责对矿警的宣传；邱焕文、褚雅

青负责社会宣传，争取各界人士对工人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1933年5月1日，矿区工委在陈郝村召开了工人罢工动员大会，提出了“外工也要分得花红”的口号和条件，并选派53名代表与中兴公司交涉。下午，当工人代表来到中兴公司大楼后，资本家假惺惺地请他们到西楼上谈判，企图以酒宴、金钱收买工人代表。工人代表们看透了资本家的伎俩，当场严词拒绝，愤怒而去，弄得资本家非常难堪。资本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勾结国民党枣庄驻军，以商谈条件为由，将工人代表诱骗到俱乐部逮捕并准备押送济南。

代表们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中兴公司内外，工人群众愤怒至极，纷纷表示要坚决斗争，营救代表。郭子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工人包围了火车站。此时，工人们越聚越多，群情激愤，表示不释放工人代表就决不罢休。道轨上堆满了许多障碍物，挤满了人群。工人们愤怒高呼：“放回工人代表，要求分得‘花红’无罪。”资本家和反动当局害怕事态扩大，不得不释放工人代表，并且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每个外工发半吨煤作为“花红”。这是枣庄工运史上第一次取得争“花红”斗争的胜利。

这次争“花红”斗争的胜利，不仅使数万名外工直接得到

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打破了近一年来枣庄工人运动的沉闷局面，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鼓舞和振奋了工人的斗志和情绪。同时，也锻炼了刚刚恢复和重新建立起来的枣庄党组织的战斗能力，积累了在严重白色恐怖条件下正确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这对于枣庄党组织的进一步恢复和革命活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次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是：一、在政治上依靠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使工人认识到阶级剥削是人民群众受苦的根源，只有跟共产党走，团结战斗，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二、在斗争策略上机动灵活，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这次罢工斗争，不仅外工参加，里工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同时，也争取了矿警队士兵的支持。三、在斗争方式方法和斗争艺术上接受了过去罢工失败的教训，采取了公开活动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党组织负责人注意隐蔽，工人代表公开活动。四、在组织建设上，严格掌握党员的发展质量，保证了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党员在罢工斗争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保证了罢工斗争的顺利进行。

争“花红”斗争胜利后，随着党组织影响的扩大，党员的数量迅速增加，党的组织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密切和加强。1933年6月，中共枣庄矿区工委改建为枣庄矿区党委，郭子化兼任书记，委员有梁允才、王明增、傅宝兴、陶洪瀛、褚雅青等。同月，中共峰县县委在枣庄建立，郭子化任书记，丛林任宣传委员，陈二友任组织委员，并着手在峰县农村开展工作。

三、建立苏鲁边区临时特委

1933年4月，中共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到枣庄矿区巡视工作，听取了郭子化的工作情况汇报后，与他一起分析形势，研究了今后的工作。冷启英指示郭子化一旦徐州特委遭破坏，即要以枣庄矿区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发展，负责重建徐州及苏鲁边区等地党的工作；在组织恢复问题上，必须根据当地的情况，严防敌人破坏。为了安全，冷启英指示枣庄党组织仍与他保持单线联系。

冷启英回徐州不久，由于徐州团委书记练育才和特委巡视员朱大同被捕叛变，徐州党、团组织负责人冷启英、孙叔平、周斌、孔子寿等先后被捕，徐州所属各县党组织相继被破坏。尽管枣庄党组织未遭到敌人破坏，成为徐州特委及其所属党组

织唯一保存下来的一个党组织，但却使郭子化和枣庄党组织同上级失掉联系，斗争的环境变得更加困难，不得不独立地开展工作。

1934年秋，枣庄党组织先后与萧县、永城等县不少党员接上组织关系。此年秋冬之际，郭子化派丛林去沛县了解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丛林到沛县后，见到刚从外地回来的原沛县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大北区区委书记丛衍瑞。在敌人大逮捕和国民党搞自首运动时，丛衍瑞先后到连云港、海州、江西等地隐蔽并寻找党组织，但因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只好又潜回沛县，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丛林回枣庄向郭子化汇报了丛衍瑞的情况，郭子化决定让丛衍瑞留在沛县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丛衍瑞又找到刚从外地躲避回来不久的张光中，并和他一起来到枣庄，向郭子化汇报了沛县党组织的恢复情况，一起研究了以后党组织如何继续活动等问题。经过分析和研究，认为应以枣庄矿区为党的活动基地，逐步恢复发展周围各县党的工作。

随着各地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原有的矿区党组织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1935年2月，郭子化召集有张光中、丛衍瑞、王明增、

陶洪瀛、李韶九、丛林、郭致远、褚雅青等参加的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统一领导这个地区党的活动。会议选举郭子化为临时特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和与边区各县党组织的联系，进行恢复发展党的工作；丛衍瑞为组织委员，负责以台儿庄为中心，开展微山湖以东地区党的工作；张光中为宣传委员，负责以沛县为重点的湖西地区工作的开展；丛林为特委秘书，肖平为武装队长，并把“同春堂”药店作为临时特委机关。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成立，标志着边区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成立后，认真总结了以往地下斗争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工作方针。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长期隐蔽、积蓄力量、恢复发展和重建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工作方针。强调在发展党员时要注重质量，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在开展工作时，公开工作与党的组织发展要分开，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要结合起来，党员要坚持社会职业化，反对无职业作掩护“四不象”的工作方式，反对盲目乱干。为了掩护地下工作的开展，由党组织开设的药店，除了“同春堂”药店外，还有邱焕文开设的同顺兴药店，褚雅青开设的广仁医院，李韶九开设的中美商社。根据工作需要，枣庄党组织将同

顺兴药店和中美商社合并，成立了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李微冬任董事长，邱焕文任经理。

1935年3月，郭子化授意李韶九等人联合枣庄70余家医院、药店，成立了枣庄医药工会，推举中共党员李韶九为会长，邱焕文、李微冬、褚雅青等为理事，使整个鲁南医药界，成为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掩护网。

第二节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开展抱犊崮山区和峰县农村党的工作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不仅在枣庄矿区开展党的工作，而且很重视山区党的工作的开展。特委书记郭子化强调，哪里有劳苦大众，党的工作就应该开展到哪里。

1935年3月，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提出开展抱犊崮山区党的工作。当时之所以提出要开展山区工作，一是作为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机关所在地的枣庄，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强，白色恐怖严重，特务经常出没，党组织随时有被破坏的危险，一旦暴露，要有个退路。二是边区各地党组织连遭敌人破坏，一些隐蔽下来的党员在当地无法存身，需要有个藏身之地，以便保存革命力量。三是考虑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组织需要建立和发展地下秘密武装，而抱犊崮山区不论地理位置和自

然环境，都有利于隐蔽和开展活动。

抱犊崮山区横跨枣庄、临沂两地，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交通不便。特别是临郯费峰滕等县毗连山区，长期为土匪所盘踞，封建地主各霸一方，成为统治一方的山大王。他们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当地群众民不聊生，甚至家破人亡。老百姓为了生计，不断地开展斗争。山区人民不仅勤劳勇敢，而且富有斗争精神和武装斗争经验，再加上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有利于党组织的活动。因此，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决定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开展山区党的工作，建立革命根据地。

1935年4月，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派郭致远、李韶九以行医身份，进入抱犊崮山区。临行前郭子化交给郭致远38个药方，指示他们以行医卖药为掩护，了解山区情况，选择党在山区的工作基地。李韶九是费县信行人，农民协会的骨干分子，曾任临沂第十一区农协会的主任委员，组织过苍山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农民协会被解散，他又在费县办小学，并担任校长，后因领导群众开展斗争，被费县反动政府撤职和通缉，到枣庄隐蔽。李韶九在魏立久、马伯华和万国华的帮助下，在枣庄开办了一处药房（中美商社）。1934年，经李微冬介绍认识了郭子化，接上了组织关系。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又让

李微冬找到当时在峯县任督学的朱道南，通过朱道南的疏通，使李韶九躲过了通缉，在枣庄站住了脚。郭致远、李韶九这次进山第一个落脚点就是临沂县大炉（现属兰陵县）。大炉的万春圃是抱犊崮山区一位有影响的进步士绅，家有200多亩土地，40多支枪，是个比较有势力的地方首领，性情豪爽，讲义气，人称“万三爷”。做好万春圃的思想工作，对于党组织在山区的工作开展至关重要。万春圃的几个子女，思想都很进步。大儿子万国华与李韶九是结义兄弟，后加入党组织。李韶九、郭致远向万春圃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对内镇压革命、屠杀人民，对外奴颜婢膝、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等罪行，使万春圃耳目一新，受到了很大教育，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5年5月初，郭致远回到枣庄后，向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汇报了进山的情况。提出大北庄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社会条件都适合党的工作开展。大北庄位于枣庄东北约35华里，是抱犊崮西侧的一个大村庄。1923年临城劫车案的首领孙美珠、孙美尧曾把大本营设在大北庄。全村80户人家的房屋几乎被烧光、抢光，青壮年所剩无几，除庄长杨四是地主外，其余都是苦大仇深的百姓，对国民党、军阀、土豪劣绅恨之入

骨。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决定派郭致远、高志成以开药店行医治病作掩护到大北庄，5月12日，郭致远、高志成到了大北庄，开始住在客栈里，后因经费困难，高志成返回枣庄，郭致远到村南头老道士杨九龄的土庙里借住。郭致远给穷苦的百姓看病尽量不收钱，或少收钱，团结争取苦大仇深的群众，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不久，郭致远经杨九龄介绍，租了两间靠街的房子，就此开办了“天德堂”药店，在抱犊崮山区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工作点。郭致远白天行医看病，晚上向青年们宣传革命道理，使他们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纷纷表示愿意跟共产党干革命。1935年6月，郭致远介绍陈继全、姚洪义等人加入了党组织。中共大北庄支部也随之诞生，陈继全任支部书记，姚洪义任组织委员，郭致远任宣传委员。陈继全、姚洪义等人入党后积极开展工作，每月主动交纳一个铜板作为党费。当地大多数青年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不赌博，不打架，积极参加劳动，学习文化知识，深得当地群众的好评。

1935年秋，为了加强对抱犊崮山区工作的领导，张光中化名张明礼来到大北庄，住在观音庙的火神殿里，以卷纸烟为掩护开展工作。先后发展了陈继胜、秦继才等人入党，有力地促进了大北庄党的工作开展。1935年冬，张光中离开大北庄

到临城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大北庄党支部成立后，群众的斗争情绪愈来愈高，党支部领导群众开展了几次斗争，均取得了胜利。

1936年初，大北庄反动乡长梁继聪为了扩充实力，欺压百姓，与党支部作对，准备成立自卫团。如果这一阴谋得逞，必然影响到党在大北庄的活动。大北庄党支部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一是利用地方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反对自卫团成立；二是发动群众，动员观音庙的施主起来反对；三是动员老道士杨九龄起来反对。郭致远又通过关系做周围村庄上层人士的工作。梁继聪迫于压力，自卫团没有办成。

反对办自卫团斗争刚刚平息，反动会道门圣贤道也挤进了大北庄。道首张德全在大北庄秘密集会发展道徒，进行反动宣传。不到一个月，就有十几人入了道。圣贤道一旦蔓延，将对大北庄党的工作开展带来极大的威胁。党支部决定采取对策斗垮圣贤道。首先在群众中广泛揭露圣贤道诈骗财物、胡作非为的反动行径，教育群众自觉抵制，派人给信道的家庭做思想工作；其次，派党员陈继全打入会道门内部，查明情况后进行内部瓦解。张德全是个非常狡猾的人，大北庄党支部曾几次派人埋伏堵截，都因他来去路线不定，没有成功。但他闻知后再也

不敢进大北庄，加上群众的反对，内部的瓦解，使这个反动组织迅速垮了台。通过斗争，不仅锻炼了大北庄党组织，同时也提高了群众斗争的勇气。

麦收季节，大北庄地主杨四以每天一角五分钱的工钱雇工收割麦子。党支部认为杨四给的工钱太低，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不增加一倍的工钱不给他干，决定发动群众罢工。成熟的麦子不等人，两天的罢工就使杨四受不了了，只好提高雇工的待遇，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了开展兵运工作，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于 1936 年夏决定派党员郭怀远（李士亨）和大北庄党员陈继胜，以卖兵（富人用钱雇用穷人顶替自己服兵役）的方式打入费县梁邱附近的关阳司乡农学校，进行兵运工作，掌握武装。他们卖兵所得 120 块银元，除留五块零花外，其余的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他们进入乡农学校后，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但入校不到三个月，就引起了校方的怀疑，敌人企图逮捕他们。特委闻讯后，连夜派人通知他们转移。拂晓，反动自卫团包围了乡农学校，结果扑了空。反动自卫团害怕学校留下革命种子，随即把学校解散了。

在开展大北庄党的地下工作基础上，临时特委派李韶九回

临沂、费县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先后发展了刘清如、万国华、葛成俊、李焕成、沈廷信、沈学仁、沈宝岭、王福田等人入党，并恢复了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又先后在许多村庄建立了党的组织：信行庄党支部，沈学仁任书记；侯家庄党支部，李焕成任书记；大炉党支部，万国华任书记；沙家店党支部，周荣太任书记；王家庄党支部，杨进美任书记；埠阳党支部，刘清如任书记；齐家峪党支部，霍玉成任书记；南庄党支部，李明法任书记；兴明庄党支部，王福田任书记；滕县徐庄党支部，陈永元任书记；南泉党支部，刘炳文任书记。1936年6月建立了高桥镇党支部，葛成俊、秦继友先后任书记；9月建立了中共高桥区委，沈廷信任书记，葛成俊、秦继友等任委员；1937年2月，成立高桥党总支，葛成俊任书记。1936年夏，特委决定建立中共临沂中心县委，负责开展临、滕、费、峰山区党的工作，任命李韶九为书记。临时特委继“同春堂”药店后，又相继在大北庄建立了“天德堂”药店，高桥建立了“广德堂”药店，徐庄建立了“元德堂”药店，北辛建立了“乾德堂”药店。这些药店既是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地下组织开展革命工作的基地，又是边区地下党员往来联络的落脚点，在掩护党员开展活动、扩大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斗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

抱犊崮山区党的工作的开展，既为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也为后来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36年夏，郭子化被捕脱险后，临时特委机关立即转移到抱犊崮山区费县高桥镇，在“广德堂”药店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实践证明，郭子化和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决定开展抱犊崮山区党的工作，是一项很有政治远见的重要决策，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指导思想。

峰县西部是邱焕文、孙伯英和峰西工委活动的地区。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成立后，派邱焕文到峰南新闻子、黄邱套、郝家湖、石头楼、阴平、曹马、棠阴等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建立恢复党组织；派张光中、丛林、陶洪瀛到峰县西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先后在大小吕巷、武穴、香城建立了党支部，分别由陶洪瀛、杨培芝任支部书记；派褚雅青到滕县南部的张阿、郗山、沙沟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发展了褚思沛、褚庆云等人入党，建立了沙沟党支部，继之，张阿、郗山、香城等地也建立了党支部。

第三节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开展的革命武装斗争

在开展党的工作和对敌斗争中，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逐渐认

识到建立和发展秘密武装的重要性。只有建立和发展秘密武装，才能保证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才能取得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各项工作的胜利。因此，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决定建立和发展党的秘密武装组织，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早在 1932 年秋，沛县县委委员丛衍瑞通过社会关系，搞到了一支七子钢手枪，这是沛县地下武装的第一支手枪，交给了肖平使用。后来刘昭仁、张善恭、丛继谦、王学然等又搞到了三四支长枪，加上从渔民手中搜集到的一些土枪、鸭枪，共有十几支，组建了沛县工农红军第一大队湖上游击队，肖平任队长，丛衍瑞兼任政治指导员。为了支援这支武装，丛林的父亲丛继禹卖了五亩地，将钱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供买枪之用。西区区委书记燕克岭也买了一支枪交给了党组织。张光中暗中支持沛县县委向其岳父要钱 1300 元，用来购买武器。不久游击队就拥有十五六支长短枪。此后，这支武装在特委和县委的领导下，活动在微山湖内外及运河两岸，昼伏夜出，时聚时散，神出鬼没，打击敌人，成为一支惩处叛徒特务和恶霸地主、保护中共党组织、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武装。著名的斗争有以下几项。

（一）枪毙恶霸。沛北魏营村恶霸地主魏以礼与反动官府

勾结，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群众对其恨之入骨，沛县县委决定除掉他。1935年7月的一个下午，县委军事委员李公俭带领武装队员张训福、张友亭二人，化装成缉拿大烟的军警闯入魏家，在魏以礼吸大烟时将其抓获并击毙，同时缴获匣子枪1支，子弹20多发。当国民党沛县警察局闻讯派骑兵赶到时，李公俭等人早已安全转移。枪毙了恶霸地主魏以礼，不仅为人民群众除了一大害，而且沉重打击了周围反动地主的嚣张气焰。

（二）截获税款。1935年秋，沛县敬安镇牙税局有一笔款项要送往徐州。中共沛县县委获取这个情报后，经过研究和周密安排，派肖平、王宽云等人埋伏在途中，将牙税局送往徐州的2000多块银元全部截获。县委拿出其中一部分买了粮食、布匹，救济了贫苦农民和生活无着落的党员，另一部分上交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购买了枪支弹药，装备了特委武装。

（三）扒粮斗争。1935年夏秋之交，黄河在山东鄄城县决口，水势汹涌，直入微山湖，沿湖周围一片汪洋，许多村庄墙倒屋塌，庄稼淹没。受灾农民走投无路，纷纷外出逃荒要饭，卖儿卖女。而此时一些土豪劣绅与不法商贩相互勾结，趁机大

量屯积粮食运往外地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十分关心沿湖一带农民的生活，派特委委员丛衍瑞到沛县巡视工作，了解灾情。沿湖一带党员纷纷反映缺粮农民生活困难，灾情严重。丛衍瑞向郭子化汇报了情况，郭子化当即决定派丛衍瑞回沛县领导群众开展扒粮斗争，并指示中共沛县县委坚决支持群众的扒粮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群众在大灾之年饿死。沛县县委根据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指示，先后两次领导群众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扒粮斗争。第一次在水圩子抢粮斗争中，数百名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突然闯进地主的仓库，将囤积在那里的几万斤粮食全部扒走，分给缺粮群众。第二次大屯扒粮斗争规模更大。奸商正准备把装满十几只大船的粮食运往湖东高价出售时，沛县县委立即组织了由数千名群众参加的扒粮队伍，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将粮食全部扒走。驻在大屯的警备队闻讯后前往镇压，预伏在大坝上的武装队立即开枪予以阻击，掩护扒粮群众安全转移，使沿湖群众渡过了大灾之年。

（四）镇压叛徒。姜友吉是张光中在夏镇发展的中共党员。1935年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成立时，姜友吉是湖东、湖西两地区中共党组织的联络员，他对两地党组织情况比较了解，

而夏镇又是湖西地区党组织派人去枣庄与特委联络的必经之地。1936年春，徐州国民党特务机关派叛徒朱大同到沛县进行反共活动，在夏镇发现了姜友吉。在朱大同威逼下，姜友吉叛变革命，当了特务。这给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和湖东、湖西党组织及交通线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临时特委经过研究，决定除掉叛徒，以保证党组织的安全。当时姜友吉住在夏镇三孔桥，其附近驻有国民党的警备中队和一个水警队，不好直接下手。特委和沛县县委经过研究和部署，派肖平、王学然、张友亭、赵广福等人，在6月7日（农历四月十八）趁夏镇逢奶奶庙会之机，将其击毙。枪声一响，庙会顿时大乱，队员们趁混乱安全返回枣庄。

（五）越狱暴动。叛徒姜友吉被击毙后，敌人震动很大，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国民党徐州特务头子庄世荣和傅谦之特地赶到沛县，指挥侦破姜友吉被杀案件。1936年6月11日夜，国民党徐州保安部队和沛县警备队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同时包围了沛南的魏宅子、沛北的宋庄和沛县中学，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0多人。除将沛县县委委员王润生和党员郭影秋、苗宗藩、苗宗屏、赵广福等人押往徐州监狱外，其余的人被关押在沛县监狱。为了营救这些同志，特委决定里应外合，实行

砸监越狱。党组织派党员李士享利用送饭机会，将越狱计划及一支七子钢手枪送进狱中。7月的一天下午，乘警备队出巡未回、犯人放风之机，党员张训福首先开枪打死了狱卒，与狱中80多人一起逃出。这时反动分子正在开会，闻听监狱暴动，十分震惊，立即派骑兵追击。由于狱中的同志长期受刑，身体虚弱，行走十分困难，又值大雨之后，道路泥泞。只有张训福率领18人逃出，分别转入湖东，其余大部分人不幸又落入敌手，有的惨遭杀害。

这一时期，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除了成立了以肖平为队长的武工队外，郭致远在大北庄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建立了武装。特委委员、峰县县委书记陶洪瀛利用亲朋好友的关系，联络了杨福林、刘启玉等20余人，在峰县组建了武装队，陶洪瀛任队长。峰县武装队曾在邹坞火车站设伏，将公开散布亡国言论、欺压百姓、民愤极大的特务徐志江活捉后枪毙，为民除了一害。这些武装在保护党组织和配合群众革命斗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后来的抗日武装起义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四节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建立

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立足枣庄，不断向周边地区发展扩大。在湖西地区，沛县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较快，党的基础较

好，是临时特委领导人联系较多的地区之一。1935年5月，郭子化到沛县巡视工作，在宋庄重建了中共沛县县委，张光中兼任县委书记、组织委员，王润生任县委副书记，李公俭任军事委员。县委建立后，以宋庄为中心，先后恢复建立了西区、大北区、中心区、东南区四个区委。特委指定沛县县委负责丰县、萧县、铜山等县的党组织恢复和整顿工作。至1936年6月，沛县已发展近200名党员，并领导群众开展了武装斗争。1935年秋，丰县的党员赵万庆出狱后，与史为功、路光前一起，奔走丰县三、四区，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同年，萧、铜一带恢复了路套区的党组织，建立了区委，路继先任书记。孙叔平出狱后，到丰县中学任教，与校长李贞乾在进步学生中建立了读书会，开展革命工作的宣传。郭子化派丛林去河南永城与党员刘屏江、李兰轩取得了联系，恢复了党组织。派郭致远去邳县、安徽灵璧开展工作，与泗县的党员许宝庭等取得了联系，让其恢复当地党组织。到1936年，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活动范围已由枣庄矿区，扩展到了苏鲁豫皖边区的沛、峰、费、泗、丰、萧、邳、灵璧、永城、临沂、铜北等十几个县。各地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枣庄矿区到1935年发展五个支部，有党员50多名；沛县恢复了沛县县委及四个区委，

并领导着萧铜边一个区委、三个支部和丰县一个支部，共有党员 300 余人；费县在 1935 年秋建立了一个区委、三个支部，有党员 30 余人；峯县县委在 1936 年除领导矿区区委外，还领导一个市民支部、一个学生支部和五个农民支部（其中包括滕县、临沂各一个支部），共有党员 150 多人。此外，在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领导的其他地区虽没建立党组织，如永城、邳县、泗县等，也与一些失散的党员取得了联系。随着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1936 年年底，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称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除原有的委员外，增补陶洪瀛为特委委员。

第五节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与中共西北特别支部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斗争是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面对困难，凭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和对党的忠诚，郭子化认真总结过去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完善斗争策略，调整斗争思路，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郭子化先后派人到上海、北京等地寻找党组织，但都未能接上关系。1934 年冬，郭子化与他的同乡好友、邳县早期共产党员、在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地下工作的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取得联系，派

共产党员郭日高去西安向宋绮云汇报了枣庄党组织的情况。宋绮云与郭子化相交甚深，得知郭子化在枣庄处境艰难，非常关心和同情。宋绮云等党员原来受中央军委驻沪办事处领导，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当时党中央又在长征途中，他们也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只能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无法帮助郭子化找到上级党组织。

宋绮云与郭子化取得联系后，经常寄钱物接济枣庄党组织。1934年冬天，宋绮云寄来五件皮袄，当时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郭子化虽没有棉衣，但他考虑到党组织活动经费困难，便将皮袄全部变卖掉作为活动经费。宋绮云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枣庄党组织大力支持，在政治上也给予关心，除了给郭子化寄《申报》《西北文化日报》等进步报刊之外，还经常通过书信介绍国内外的革命形势。此时，枣庄党组织虽然没有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却能了解到国内外的革命情况。

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前，宋绮云向徐彬如多次反映郭子化在枣庄一带进行秘密革命活动及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并请他向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汇报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活动情况，建议办事处速派人与郭子化联系。不久办事处即派人到徐州，但因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此人没有与郭子化联

系上。以后由于军委驻沪办事处忙于其他工作，就把这个事情放了下来。

1935年秋，杨虎城将军接受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欢迎有志之士到他军队工作。经组织研究，中央军委驻沪办事处派谢华、徐彬如到西安。10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在西安成立，谢华任书记，徐彬如、宋绮云为成员。11月，宋绮云向徐彬如、谢华汇报了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情况。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指示谢华、徐彬如通知郭子化，临时特委组织关系暂由西北特支代管，待中央到达陕北，再将其组织关系转交中央，最后决定郭子化到西安汇报工作。1936年1月，郭子化到西安后，在西北特支召开的会议上，详细汇报了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成立经过、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及经费困难、缺少武器等问题，请西北特支予以帮助解决。自此，郭子化与西北特支接上了组织关系，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暂由西北特支领导。在西安，郭子化还从谢华、徐彬如、宋绮云那里了解到红军已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及中央发出的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亲眼看到西安学生、西北军和东北军抗日救亡爱国运动高涨的情景，

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增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

1936年初，李微冬接到在北平辅仁大学的好友金鹏举的来信，介绍了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并谈及建立抗日民族先锋队问题，邀请李微冬前往参加会议。李微冬当即向郭子化作了汇报，郭子化表示同意，并指示李微冬不仅要了解“民先”（抗日民族先锋队的简称）的情况，还要积极寻找上级党的组织。李微冬抵达北平，与“民先”负责人高锦明、黄敬等进行了会晤，并作为枣庄“民先”的代表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全国抗日民族先锋队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微冬返回枣庄后，成立了枣庄抗日民族先锋队，李微冬为负责人。枣庄地区的“民先”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的爱国青年迅速投入到这一爱国运动的洪流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引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注意。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镇压群众运动，把注意力集中在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上。1936年春，徐州的国民党派出大批便衣特务，到处侦察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尤其对枣庄、临城、滕县、夏镇一带特别注意，并在抱犊崮山区的要道峨山口、半湖等地布置便衣特务，监视来往的行人。1936年6月17日，叛徒朱大同带着

几个特务在“同春堂”药店发现郭子化。郭子化与朱大同虽然是同学，一起参加过永城暴动，但朱大同对郭子化在永城暴动失败后的情况并不了解。郭子化在无法脱身的情况下，镇静自若地表明自从永城暴动失败后，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到枣庄行医谋生。朱大同半信半疑，仍将郭子化带往徐州关押起来。临时特委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营救措施，决定派李韶九以枣庄医药公会会长的身份赶往徐州为郭子化作保。同时派人到济南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徐州特务扰乱枣庄医药界正常营业，给徐州的国民党施加压力。第二天，郭子化被保释返回枣庄，随即在广仁医院秘密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决定临时特委机关立即转移到抱犊崮山区费县高桥镇。为了防备敌人跟踪追捕，派陶洪瀛、杨培芝、肖平等组成武装“打狗队”，专门负责侦察和阻击可能跟踪的国民党特务。郭子化作完工作安排后，与丛林一起到济南张夏车站东八里的周家庵村周宗勤家中隐蔽。

临时特委机关撤出枣庄后，特委立即对枣庄矿区党委进行了调整充实，由特委组织委员丛衍瑞兼任矿区党委书记，王明增、梁允才、褚雅青、邱焕文、李微冬任委员。为加强对沙沟、张阿、邾山一带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在沙沟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沙沟区委，褚思沛为区委书记，刘茂坦为委员。为更好地

开展枣庄驻地工作，成立了枣庄老街党支部，李微冬任书记，张鸿仪、金宝蕴为委员。

郭子化在周宗勤家隐蔽期间，再次派丛林去西安，向西北特支汇报“枣庄事件”和特委转移及工作部署情况。宋绮云传达了西北特支要郭子化去西安的通知，并交给丛林100块银元，作为特委的活动经费。

按照西北特支的通知，郭子化于9月初再次去西安，向西北特支汇报了被捕前后经过和特委的全面活动情况，了解了国内的革命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月底，郭子化返回周家庵村后，即去抱犊崮山区费县高桥镇，在“广德堂”药店立即召集丛衍瑞、张光中、郭致远、李韶九、邱焕文等人开会，传达了西北特支工作指示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新的形势，布置了几项工作：（一）加强枣庄矿区和农村党的建设，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组织，在现有的基础上，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职员、青年学生、各界进步人士中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壮大党的力量；（二）积极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形式，如职工联合会、学生会、读书会、医药公会、联庄会、民众自卫团、抗日自卫团等人民团体，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团

结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当亡国奴；（三）对社会上层的开明士绅、爱国进步人士，广泛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多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在鲁南山区重点做好万春圃的工作，应多与他联系，多做工作，通过万春圃的社会关系，开展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会后郭子化亲自拜访万春圃，向他宣传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介绍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政策。万春圃在郭子化和地方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积极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打开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西北特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决定撤销中共西北特支，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原西北特支成员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组织关系也交给陕西省委。

1937年1月，郭子化接到陕西省委要他去西安的通知。此时，陕西省委通过林伯渠（当时林伯渠任西安办事处主任）联系，将特委的组织关系转交给党中央。2月初，郭子化从西安又到延安，中共中央组织委员王观澜、齐华接待了郭子化。

即将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朱理治听取了郭子化的工作汇报后，代表中央对郭子化和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特委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中央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是有成绩的。并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划归即将成立的中共河南省委领导。至此，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长达五年之久后，正式称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郭子化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当时，中央交给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党员组织关系共 460 人，其中就有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 300 余人，约占河南省委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这足以说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在白区的工作成绩是极其突出的。

郭子化在延安期间，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在苏区党代会上，听取了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讲话，听取了刘少奇作的《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报告，和朱德作的《红军在新阶段中的任务》专题报告。这次会议，肯定了中央自 1935 年以来的政治路线，

通过了决议，为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郭子化又听取了刘少奇、洛甫的报告，以及徐冰、彭真的讲话。会议总结了过去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和发展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克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倾向。会议强调，必须正确地树立和解决党和群众的关系，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争取和团结工人、农民的大多数，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争取一切武装部队，走上坚决抗日的道路。在职工运动中，充分注意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组织和黄色工会，把争取改善工人、农民生活的斗争与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要一味搞政治运动。中共中央两个重要会议精神，使郭子化进一步提高了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明确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1937年6月，中共中央两个会议结束后，郭子化又与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一起研究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工作。7月初离开延安，途经西安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中共苏鲁豫皖

边区特委的工作，在中共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下旬，郭子化返回鲁南抱犊崮山区。

在李立三、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殆尽，苏区力量损失严重，苏鲁豫皖各省党的组织迭遭破坏，枣庄、徐州的党组织也受到严重损失。郭子化来到枣庄后，与丛衍瑞、张光中和丛林、郭致远等人经过艰苦的工作，先后恢复建立了中共枣庄矿区党支部、枣庄矿区党委、峄县县委、沛县县委、费县县委等，主动担负起苏鲁豫皖边区 20 多个县党组织的建立和恢复工作，建立秘密革命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成为华东地区白区斗争的一面旗帜。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巨大的成绩，是因为十分注意从边区的实际出发，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较好地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正确地贯彻了党在白区工作的路线。首先，在政治上，特委根据当时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的特点和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检查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定了“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因而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在斗争策略上，批判了排斥革命知识分子的倾向，注意利用敌人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去反对主要敌

人；在斗争方式上，根据白区工作的特点，执行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即党的活动一定要秘密，而群众斗争则尽可能争取公开合法，强调党员要社会职业化，要积小胜为大胜，隐蔽自己，杀伤敌人，反对盲目冒险。斗争口号的提出也注意适合群众的觉悟水平，不提一些不切实际的过“左”的口号，因而能够领导群众不断前进。其次，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特委吸取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视由党直接领导革命武装。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消灭反动派、打击叛徒和支持群众斗争，起了很大作用，并为日后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再次，在组织上，注意了党员的成分和质量，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纪律，从而保持了无产阶级队伍的纯洁性，为此后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做了干部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第五章

中共滕县、临城党组织的建立 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

在中共枣庄特委开展活动的同时，中共山东省委也先后派共产党员到滕县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10月建立了中共滕县特别支部，领导人民开展了反抗官府镶修湖堰和抗关税斗争。特支遭到破坏后，失散党员陆续返回，自发建立了五所楼懋榛党支部，并领导群众继续开展革命斗争。与此前后，北方局也派人到临城开展革命活动。

第一节 马列主义在滕县的传播和国民书店的创办

1929年，在北平平民大学、朝阳大学、曲阜二师和兖州甲种农业学校就读而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王临之、李淑铭、李景黄、刘炳文等进步青年回到家乡滕县。为了探索革命真理，寻求革命道路，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他们与王子祯（1947年牺牲）、王柏林（1940年叛变）、马奉莪（1941年牺牲）等合伙集资，于1930年春在滕县南门里路东创办了一处书店。股东们在酝酿书店名称时就动了不少脑筋，有的说叫“红光书店”，有的说叫“大众书店”。鉴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忌讳“红”与“众”等字眼，为日后便于立足并开展活动，大家商定书店名称还是以灰色的面目出现为好，于是便取名为“国民书店”。国民书店经理先后由王公衡、李景黄、刘炳文担任，

店员雷新修。书店开业之后，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出售红色书籍和社会科学方面进步书籍的指示精神，在经营中秘密销售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唯物辩证法》《太平洋风云》《苏俄秘史》《社会主义科学概论》和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还有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郭沫若、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国外的有《少年维特之烦恼》《丽莎的哀怨》等。同时，书店还为城乡各学校购置课本和有关书籍，与各学校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学校和社会的进步青年时常来书店阅读和购买书籍。一时，国民书店在滕县社会影响迅速扩大。当时，在县城里流传着这样一首称赞国民书店的打油诗：

重阳时节风飒飒，

街上商货乱如麻。

学校用具何处有？

“国民书店”第一家。

国民书店不仅经营图书业务，而且还常常把失业的进步知识青年介绍到各乡担任小学教员。书店实际上成了宣传马列主义先进思想的阵地和吸引进步青年读书学习的场所。当时，在

书店大门上贴了这样一幅对联：“寻求科学真谛，走上广阔道路”，充分显示出它有别于其他以“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为宗旨的商号店铺。国民书店的创办及其经营活动，在滕县广泛传播了马列主义思想，启蒙了民智，不仅为学生和青年提供了阅读进步书籍的场所，而且为中共滕县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作了组织准备。

第二节 中共滕县特支的建立与活动

一、滕县特支的建立

滕县国民书店在经营活动中，广泛传播了马列主义等先进思想，有力地吸引和广泛地联络了进步的知识青年，为中共滕县地方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此时，作为书店主要股东之一的王临之，受聘到山东省第七中学（当时设在济宁，习称济宁七中）任图书管理员后，有机会受到该校训育主任、早期共产党员王溥泉（又名刘顺元，曾任中顾委委员）的教育和培养，并于1931年夏由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省立七中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负责人王溥泉被捕入狱。王临之接替王溥泉负责地下党的工作。同年夏秋之交，根据山东省委“到工农中去，到城乡中去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精神，王临之利用节假日回到家乡滕县开展党的活动。经过一

段时间的培养和考察，先后发展了李景黄、李淑铭等人入党。10月，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示，由王临之主持在滕县城徐家花园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滕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中共滕县特支），并推选王临之为特支书记，李景黄和李淑铭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委员。会议确定特支的办事机关设在国民书店内，联络点设在李景黄家中（现已拆迁，原址在滕县中心人民医院院内）。根据省委指示精神，特支的工作方针是“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做好宣传工作，开展群众运动。”

特支成立后，即通过亲戚、朋友、同学等多种渠道培养发展了刘炳文、王子祯、韩洪叶（又名张天民）入党，加上在外地求学回滕的党员渠玉柏、马秀三、李雪斋等，此时党员已达到9人。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特支决定划分为三个党小组：第一组，王临之任组长，成员有马秀三、渠玉柏；第二组，李淑铭任组长，成员有韩洪叶、李雪斋；第三组，李景黄任组长，成员有刘炳文、王子祯。

二、特支的秘密活动及开展的几项群众工作

特支成立后，经常与济南、济宁等地的党员和进步教师、学生来往。国民书店的进步书籍也开始增多，省委创办的《红旗》期刊也出现在书店内。1932年夏，为了有组织地培养、

教育进步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觉悟，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特支以国民书店的名义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读书会的主要成员有：董开夫（即董一博）、王右池、生碧泉、黄化民、彭协典、刘守环、马仲川、李湘远、刘干卿、李季民、李文甫等人。这些读书会成员先后大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滕县党组织的中坚力量，有的还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滕县特支除了成立读书会、培养新生力量、壮大党的组织外，还派韩洪叶、李雪斋去大坞小学，李淑铭去五所楼小学，李景黄去南关吕祖庙小学，黄化民去凉水泉小学，王右池去西辛安小学任教，王临之去教育馆任讲演员。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职业作掩护，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不断扩大党的影响。

特支的日常工作或简单议事在国民书店内进行，而许多会议或学习重要文件，大都在李景黄家南屋里进行。一些重要文件也都放在他家里。特支向省委请示或报告，都是专人、单线、定时进行，非常保密。凡是文字的东西，都是用化学药液写成。有的需用火烤，有的需要用药水洗，字迹才能显现出来。一封信在正面写一些不相关的话，把要说的话用药水写在背面，正面信上的签名是显信的记号。如信上写“王杰”收，“杰”字

从“木”从“火”，意思是用火烤；如果写“刘清泉”收，“清泉”示意以水，则用药水洗。

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特支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在实践中丰富自身斗争经验，扩大了党组织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是组织发动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痛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特支派李景黄等人积极组织发动和支持校长李季民在滕县短期师范师生中举行示威活动，并很快发展到城内各小学，组成了近千人的游行队伍。他们利用贴标语、发传单以及街头演讲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这一铁的事实，强烈呼吁国民党政府举兵抗日。这是滕县第一次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得到了广大师生的拥护和支持。

事后，李季民被学校反动当局赶出校门。随后，特支又将李淑铭派入滕县短期师范，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二是组织“抗捐”请愿斗争。1932年初，滕西大坞、峰庄一带反动地方武装的头目、自卫团团团长张广濂、龙振标等人逼迫农民拿捐（人称“团捐”，每亩三分钱）。特支决定由刘炳文负责，组织80多名农民代表到国民党滕县政府进行“抗捐”请愿斗争，国民党县长赵长江动用警察妄图将请愿代表驱

散。但是，在特支的领导和支持下，前来请愿人员拧成一股绳，坚持斗争，最终迫使当局答应条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三是领导了反对镶修湖堰斗争。1932年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沈鸿烈下令镶修微山湖湖东大堰。滕县段从岗头到夏镇长达30多公里，费用全由沿湖百姓负担，湖东每亩地需分摊2-3块银元。这项工程不仅所需费用太大，而且直接给湖东农民造成极大危害：滕县地势东高西低，东水西流，湖堰加高以后，东水就不能西流入湖，必将造成洪水泛滥。故此，引起沿湖30多个乡广大农民群众和地主士绅的坚决反对。特支经过研究后，责成王临之、刘炳文等去沿湖乡村因势利导，发动组织沿湖一带农民开展反对镶修湖堰的斗争。通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活动，刘炳文（公开身份既是教师，又是乡长）率领100余名士绅和农民代表，去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请愿。为了取得请愿的胜利，事前已经与李天倪（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参议员）、杨士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秘书）进行了联系。

去省政府请愿那天，传达处长电告请愿代表说：“韩主席（韩复榘）正在开会。”会后当韩复榘的专车行驶到门口时，传达处长上前联系。韩复榘下车后，问：“你们有什么事？”刘等回答：“我们是从滕县来的。镶修湖堰费用太大，对湖东

有害无益。”边说边递上呈文。韩复榘似乎早有准备，即回答说：“你们回去吧，我叫建设厅停修就是了。”事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果然停止了镶修湖堰工程。

这是特支运用灵活的方式，依靠群众力量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使湖东人民免受巨大的经济剥削和部分土地的丧失。同时，通过这次活动也有效地团结了一部分士绅，并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的表扬。

三、国民书店被查封 滕县特支遭破坏

滕县特支（在国民书店办公）不断团结和吸收进步青年入党，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的活动，逐渐引起了书店同行的不安和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县城东门里路南有家私人书店—华新书店，经理周某某。由于国民书店生意兴隆，使华新书店的经理心生嫉妒，当他对国民书店经常出入的人员产生怀疑后，一面扬言国民书店被赤化，一面向国民党滕县驻军李汉章部告密说：“国民书店里有共产党。”1932年10月13日夜，国民党驻滕第七十四师一个杨姓副官来到书店，说是买书，实际进行侦察。那个副官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大同世界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以此为借口，扬言书店被赤化了。随即调来20余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将书店围住，

搜出《大同世界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和党的刊物《红旗》以及一部分党的文件，逮捕了共产党员渠玉柏和店员雷新修。遂将书店查封，门口贴了布告，并发出对王临之、李景黄等人的通缉令，全城实行戒严，主要街道路口派军警设岗，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妄图将特支成员一网打尽。

特支成员和其他党员通过内线得知国民书店被查封的消息后，连夜采取了应急措施：王右池回山里老家隐蔽；李淑铭去了天津、东北找党组织；王临之、李景黄、刘炳文、李雪斋、韩洪叶等人先后到了南阳镇。经商议确定：韩洪叶路经济南向省委报告特支已被破坏的情况，而后去北平；其余四人经徐州去上海找李乐平（李为地下党员，时任中共华捕委员会书记，华捕即租界里的华人巡捕）。经李乐平请示上级党组织同意，四人被安排在江苏省委举办的特别训练班接受训练，训练班结束后，李景黄被派往汉中做兵运工作。后因情况有变，李景黄于次年2月返回滕县。王临之、李雪斋赴温州在刘珍年部做兵运工作，因刘部哗变，他们又被迫返回上海。刘炳文在上海闸北做兵运工作。1933年4月6日，李乐平在上海被捕，党组织联系再次中断，王临之、刘炳文于10月被迫返回滕县。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李淑铭、李景黄和王右池等人，以教学为掩

护，继续坚持党的工作，为国民书店的启封和恢复滕县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第三节 中共滕县五所楼懋榛小学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滕县国民书店被查封，滕县特支遭到破坏，党组织活动被迫停止。1933年，星散在外地的滕县特支成员和大部分党员陆续回到滕县，利用教师等不同的身份作掩护，继续开展党的活动。

1934年9月，泰安籍共产党员张学周经国民党省党部秘书朱勇宝介绍来滕县城头（现属枣庄市山亭区）小学任教。张学周是1931年由朱玉干介绍入党的，1933年山东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时隐蔽下来。此次来滕有两个目的：一是寻找党的关系，二是寻机开展党的活动。恰好王右池亦在城头小学任教，通过较长时间接触，彼此有所了解，原来双方都是党组织遭到破坏后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从此，他们时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政治，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但时间不长，张、王二人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和不满，校长华殿选经常监视他们的行动。1934年冬，张学周被校方辞退，在家赋闲；王右池也只好前往县城东关春秋阁初级小学，后转至羊庄小学任教。

为了重新开展党的活动，1935年9月，王右池通过在五所楼懋榛私立小学任教的李淑铭将张学周介绍到该小学任教。这个学校校长李文甫思想开明、主持正义、同情革命，环境相对比较宽松，所以地下党员在那里不仅能够存身，而且还能较为活跃地开展工作。张学周来到五所楼懋榛小学后，很快结识了与党失去联系的李淑铭。在此之前，张学周和在羊庄任教的王右池沟通了思想，至此，重建滕县党组织的时机也日趋成熟。1936年春，张学周、李淑铭、王右池三人自发成立了中共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张学周任书记，李淑铭任宣传委员，王右池任组织委员。同年秋，地下党员燕遇明经张学周、王右池介绍由泰安来滕县羊庄小学任教，并参与了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的活动。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成立之前，这些地下党员就已开展了秘密革命活动，支部成立后，其活动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此期间，他们根据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三省这个中心，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支持组织“教育推进会”

1934年春，在李淑铭、李景黄、王右池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由进步人士、滕县五所楼懋榛私立小学校长李季民出面，组织了“教育推进会”。同年年底，“教育推进会”举行了一

次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的签名运动。参加者有李淑铭、李景黄、王右池、黄化民等城乡教师 100 余人。1935 年 12 月，“教育推进会”为响应北京学生反对“何梅协定”，发动了城乡教师和城内学生，贴标语、散传单、举行游行示威。当时的口号是：“反对‘何梅协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烈要求政府积极抗日”。通过这次活动，扩大了党组织的影响力，提高了广大城乡人民特别是进步师生的觉悟。七七事变后，“教育推进会”的活动才告一段落。

二、进行政治形势教育 启发学生革命觉悟

张学周、李淑铭、王右池充分利用学校这个场所，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他们认为要启发学生的觉悟，在讲课和日常生活中，必须对学生进行政治形势教育。他们购买收音机，订阅进步刊物和书籍，如《世界知识》《中流》《大公报》和《华北新闻》；党支部还通过日常教学，向学生讲授农民起义、五四运动、民主革命等内容，李淑铭公开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阴谋，讲述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很多学生听后痛哭流涕。张学周、李淑铭还经常找先进学生个别谈话，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进步。有的

学生受教育后，满腔热血，当他们问张老师如何找红军打敌人时，张学周就启发他们说：“革命要有种子，你们就在当地做种子吧”。张学周还形象地打比方说：“鬼子来了你手里有镢头，去把公路刨坏，这就是抗日；你手里有镰刀，去把电线割断，这就是打日本”。

党支部还利用活教材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五所楼是滕县南部较大的村庄，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村里有个名叫李大猷的地主，外号称“李老奸”，为人吝啬、苛刻，对农民更是残酷无情。张学周就编歌谣，揭露李大猷的罪行：

老奸、老奸、实在混蛋，
拿着穷人不当人看。
自己吃的是肉山酒海，
干活的饭食生霉发烂。
老奸、老奸，是个坏蛋，
住着厅房，吸着鸦片；
囤里全是粮，柜内盛满钱，
哪里得来？穷人血汗！
老奸、老奸，是个孬蛋，
东西再多，从来不嫌。

春天找人帮盖屋，
冬天派人护家园，
全是抓官差，从来不管饭，
生日、满月还要鸡蛋。

为了更好地教育学生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张学周、李淑铭、燕遇明于1936年10月创办了《图存报》。发刊词为燕遇明所写，基本内容是：宣传抗日救亡；动员民众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奋起抗日；介绍东北人民的悲惨生活等。此报为不定期油印小报，每期数百份。散发范围东到山亭、羊庄，西至微山湖畔，南到沙沟，北至皇殿岗一带，《图存报》直到七七事变后才停刊。

三、积极发展党员 壮大党的队伍

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通过广泛的宣传和深入的阶级教育，激发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学习热情。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日益增强，中坚分子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一批优秀青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由张学周、李淑铭介绍发展了杨广立、杨际元为中共党员，而后再发展了李运田（后脱党）。在羊庄小学，1935年初，地下党员张开文来校任教，

先为教员，后任校长。历时年余，影响颇深。在职期间，他支持进步青年与封建势力开展斗争，同燕遇明、王右池一起在羊庄小学指引一批优秀学生走向革命道路，并从中发展了朱广泉、孟昭煜、李瑞、侯以谋等人为中共党员，扩大了党的队伍，充实了新生力量。

第四节 北方局派人到临城开展革命活动

陕北瓦窑堡会议后，1935年12月29日，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北方局工作。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以党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先后派员到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帮助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宋子成奉北方局的指示，到枣庄临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6年10月，宋子成（化名孙毓仙）来到临城，他的公开职业是西医外科大夫。其主要任务是：在苏鲁豫皖边界地区搞军运工作；割断日特、国特与该地区会道门的关系，组织抗日武装。指导方针是：发动群众，组织暴动，反蒋抗日。宋子成在临城火车站下的古井村住下后，利用其哥哥的朋友王元奎在临城开设“延寿堂”药铺的便利条件，以行医作掩护开展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以各界抗日救国会成员的身份进行抗日宣传，打着冯玉祥的旗号，揭露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不抵

抗和镇压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反动政策，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并发展了任子仪等几名青年为民先队员。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内战，实现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也由“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原计划以徐州为中心的暴动计划也随之取消。

1937年夏初，在华北地区做人民武装工作的赖若愚到临城检查工作。他听取了宋子成的工作汇报，肯定了宋子成的工作成绩，鉴于宋子成与北方局失去联系，遂决定将宋子成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

第二编

枣庄党组织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第六章

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和创建抗日武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的方针政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举行鲁南抗日武装起义，英勇抗战，积极配合了正面战场，阻击了日军的进攻。

第一节抗日战争爆发后枣庄地区的形势和任务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派援军，扩大侵略战争，并扬言3个月内灭亡中国。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实行全民族抗战”。八一三事变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来，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八路军、新四军编成后，陆续开赴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之形成。国共合作抗日，为枣庄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因此在正面战场上没

能有效地阻止日军的进攻，日军于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又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和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其中沿津浦铁路南进的日军，于10月初侵入山东，占领德县、恩县、平原等地。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部分兵力在鲁北地区稍事抵抗，旋即命令部队及地方官员撤往黄河以南，并命令炸毁大桥，与敌隔河相持。12月23日，日军分兵两路渡过黄河，再度大举进犯山东。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于12月27日占领济南，31日侵占泰安。

1938年3月，日军侵占枣庄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惨案。3月18日滕县城沦陷，从3月16日至18日短短的三日三夜，日军在滕县城就杀害平民百姓720余名，烧毁房屋4700多间。原本飞檐斗拱的古建筑滕城四门，在日军炮火中只剩下断壁残垣，满目疮痍。3月18日，近100名日军闯进枣庄西部的西邹坞，杀死村民83人，焚烧了村里的大部分房屋。3月19日，日军出动战机轰炸老和尚寺，炸死炸伤逃难到这里的1000多名村民。郭里集及附近几个村庄的居民，先后被日军杀害500余人。3月23日，纪官庄一天内有30人惨遭杀害，200余间房屋被烧，全村只有3间房子因离村较远而幸免。村内各种衣

物、粮食、农具全部化为灰烬，牛、驴、猪、羊无一生存。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3月至5月，日军在枣庄地区杀害无辜百姓近万人，烧毁房屋两万余间，造成数万群众流离失所，本地区的文物古迹亦被破坏殆尽。

侵略者的刺刀不仅没有吓倒枣庄人民，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无比仇恨。“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将侵略者赶出家门！”这就是枣庄人民发出的怒吼。枣庄地方党组织毅然担负起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奋起抵抗外敌、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坚持敌后抗战，直至夺取胜利。

9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召开有山东省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部署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等工作，并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精神，决定尽快恢复、发展山东各地党组织，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还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十大纲领。

抗战爆发时，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尚未能与中共山东省委取得直接联系，而是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

1937年7月下旬，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从延安返回鲁南费县高桥镇，立即召开特委委员和负责各基点工作的领导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及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特委在新形势下的抗日救亡工作，并形成三条决议：（一）积极进行城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城市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具有爱国思想的上层人物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教育，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区以大炉为中心，利用爱国士绅万春圃的关系，对临（沂）郯（城）费（县）峯（县）滕（县）士绅名流进行统战工作。（二）积极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打好建立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使上层统战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以推动抗日工作的顺利开展。（三）利用一切合法形式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发动和组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8月，特委派丛林向即将成立的中共河南省委汇报工作，并递交特委决议等文件。丛林在陕西省三原县找到河南省委负责人朱理治。朱理治听取汇报后，决定以省委名义派刘文（余子彬）和何一萍（何冰如）随丛林到枣庄，检查特委及其领导的各地党组织工作。9月，河南省委决定刘文、何一萍留在枣

庄，并参加特委领导工作。10月，张光中去河南开封向省委汇报工作，朱理治又派纪华来枣庄开展工作。11月，特委根据党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和河南省委的意见对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调整，郭子化仍任书记，刘文以河南省委代表身份参加特委领导，张光中、何一萍、陶洪瀛、丛衍瑞为特委委员。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委于11月中旬由鲁南费县高桥镇迁入徐州市。特委的公开办公地点设在徐州统一街牙税局，秘密机关设在坝子街民众教育馆。同月，特委在萧县黄口镇孙庙村耿蕴斋家里召开扩大会议，郭子化、张光中、刘文和特委所属各县党组织的负责人郭影秋、路继先、尹夷僧、戴蕴山（戴晓东）、刘屏江、于化琪、陈筹等20余人参加会议。郭子化传达了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分析了苏鲁豫皖边区的斗争形势，决定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进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会议还决定，将特委所辖的地区，以津浦、陇海铁路十字交叉线为界，划分四个区域，并分工领导。张光中、丛衍瑞负责徐西北区湖西各县的抗日工作；何一萍负责徐东北区鲁南各县及枣庄矿区的抗日工作；郭子化负责全面工作和统战工作，

兼管徐东南区和徐西南区的抗日工作；刘文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第二节 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抗日战争初期，枣庄地区的中共地方组织分属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和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的党组织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的广大地区。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之后，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党的工作由秘密状态逐步转向公开，为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此情况下，苏鲁豫皖边区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1938年1月成立中共徐东南区委，邵幼和任书记。该区委领导铜山县工委、泗县工委、睢宁支部、邳县特支及宿迁县部分党组织。4月，徐东南区委改为苏皖工委。1938年3月成立中共徐西北区委，王文彬任书记。该区委领导沛县县委、丰县县委、萧铜工委及砀山特支。在徐西南地区，萧县、永城、宿县等地党组织也很快恢复。1937年冬成立宿县特支，1938年2月成立永城工委。徐东北区以枣庄地区为中心，又称鲁南区。在这一地区先后建有鲁南中心县委、峄县县委、枣庄矿区党委、滕县特支、滕峰边县委和临邳县委等组织。

一、鲁南中心县委的建立及其工作

1937年10月，鲁南中心县委在枣庄建立，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委员何一萍任中心县委书记(1938年5月宋子成任书记)，丛衍瑞任组织委员，宋子成任宣传委员，李微冬、纪华、李韶九、陶洪瀛、朱道南、梁度世、张鸿仪等先后任委员。鲁南中心县委下辖临沂县委、峄县县委、枣庄矿区党委、枣庄矿区区委、费县高桥区委、临城区委、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县委、滕县特支、峄滕边县委和临郯县委等党组织。1938年，鲁南中心县委共有党员800多名。鲁南中心县委成立后，采用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工作。何一萍、纪华、宋子成侧重负责党的发展等秘密工作；公开发动群众的工作，则主要由李微冬、张鸿仪、李汝佩等人负责。枣庄是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诞生地，党的基础较好。鲁南中心县委一方面在矿区工人、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大力发展党员，另一方面积极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恢复组织关系，并大胆使用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1938年3月18日，枣庄失陷。就在日军侵占枣庄的前一天，鲁南中心县委机关和枣庄部分抗日武装，掩护着一部分枣庄逃难群众向鲁南山区转移。中心县委领导人何一萍、宋子成、朱道南、纪华、梁度世、李韶九、刘景镇等在阎庄召开会议，

分析撤离枣庄后的形势，研究确定下一步工作任务：（一）中心县委机关由宋子成、梁度世等人率领继续向高桥转移，协同李韶九做山区基层党组织恢复发展和组建抗日武装工作；（二）何一萍去徐州向特委汇报并请示工作；（三）朱道南、纪华、刘景镇率邹坞暴动武装、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武装向大北庄转移，与郭致远武装会合，集结于滕峰边区，坚持敌后斗争。

4月初，鲁南中心县委到达高桥、大炉一带，受到万春圃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月底，何一萍来到高桥，向宋子成传达了特委指示：准备组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调何一萍去义勇总队任政治委员，鲁南中心县委书记由宋子成接任，梁度世任中心县委组织委员，其他委员不变（不久，梁度世也调义勇总队任政治部主任）。后来，鉴于义勇总队需要大批干部，中心县委除留少数人在高桥工作外，绝大多数人都到义勇总队工作。

鲁南中心县委机关抵达高桥后，首先对山区基层党组织进行充实、调整和加强，使山区党组织重新成为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建抗日武装的战斗堡垒。李韶九利用山区地熟人熟的便利条件，做了大量工作，埠阳的刘清如，杨庄的杨茂斌、白

山的宋宜安，以及肖云卿、肖云义等人的组织关系都是通过他与中心县委接上的。后来，这些村庄先后建立党支部，形成了山区工作网。另外，从高桥到大炉、北庄、徐庄一带，特委还开辟了中心县委与义勇总队保持联系的交通线。后来这条交通线成为中共山东分局与华中交通线的一部分。1938年8月，特委书记郭子化调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1938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改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任统战部长，鲁南中心县委书记宋子成调边区省委组织部任组织科长。鲁南中心县委奉命撤销。中心县委其他人员转移到大炉、车辋一带，继续从事抱犊崮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二、其他党组织的建立恢复和发展

1937年8月，抗战前的共产党员渠玉柏、李乐平先后从济南、苏州获释出狱，返回故乡滕县，与滕县地下党员李景黄、刘炳文、王右池等取得联系，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0月27日，李乐平、王右池等在庄里村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滕县农民抗日协会”，李子成为会长。11月，滕县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派张学周去泰安，通过燕遇明找到共产党员夏辅仁、张北华，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取得联系。12月9日，王见新（化名孙俊才）以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的

身份到滕县，了解滕县党组织的情况和传达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及省委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旋即返回泰安。24日，王见新再次抵达滕县，并根据省委的指示留滕工作，遂与滕县党组织负责人一起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举办农民抗日训练班，创建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4月，王见新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驻地徐州，与郭子化取得联系。郭子化即随王见新到滕县善垌检阅了滕县抗日武装，并帮助建立了中共滕县特支，王见新任书记，李乐平、王右池分别任组织和宣传委员。从此滕县党组织隶属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

1938年7月，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批准，中共滕峰边县委在滕东徐庄成立，李乐平任书记，周南任组织部长，杨继元任宣传部长。同年9月，李乐平调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任政治委员，该县委撤销。

早在1937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便派丁梦孙、郑行云夫妇和李华舫等到临沂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丁到临沂后又到徐州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取得联系，郭子化任命他为临沂县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指导员，并取得了建立第五战区临邳青年救国团组织的合法名义。同年12月，山东

省委巡视员李仲林到临沂检查党的组织工作，与丁梦孙、韩去非等取得联系，主持成立了中共临沂特支，韩去非任书记。1938年5月，临沂特支扩建为中共临（沂）郯（城）县委，仍由韩去非任书记兼组织部长，王以仁（后叛变）任宣传部长，山东省委派红军干部石世良担任县委军事部长，丁梦孙任青年部长兼统战部长。临沂特支和临郯县委在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主要从事组建临郯青年救国团和抗日义勇队的工作。

1938年4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派王永福到临（沂）郯（城）费（县）峯（县）边区，以车辋为中心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大炉、城后等支部。6月，建立临郯费峯四县边联县委，王永福任书记，万国华、宋宜安、刘清如、杜季伟等为委员。县委机关设在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内，辖区有新庄、高桥、尚岩、新兴、税郭和仲村等。同年10月，王永福调临郯县委任书记，于化琪接任边联县委书记。

1938年8月，遵照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指示，边区特委决定重建峯县县委（亦称峯南县委），于化琪任书记，邵循政、岳俊卿、王子刚、刘亦夫等人任委员。月底，峯县县委在兰陵横山召开第一次会议。会后，于化琪调到边联县委工作，纪华接任峯县县委书记。到1939年初，峯县党组织有了较大

发展，先后建立了第一、二、五、六区委和棠阴、阴平两个特支，党员已达数百人，并秘密掌握了部分武装。1939年初，棠阴、阴平称东区区委，沙沟、张阿一带称西区区委，同年秋合并为峰县四区区委，县委任命朱奇民为区委书记。

1938年12月，为开辟沛滕边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决定，建立中共沛（县）滕（县）边县委，主传珍任书记，周牧九（周鼎勋）任组织部长，沈惠民任宣传部长，郑安良任社会部长，张用沛任民运部长，张新华任军事部长。该县委隶属丰（县）沛（县）鱼（台）中心县委领导。

第三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抗日救亡运动

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大力开展以徐州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及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前提条件。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中共中央即派彭雪枫赴徐州做李的工作。李宗仁当时对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同情和支持的一面。在共产党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李宗仁到徐州后发布了《约法七章》，主要内容是：坚持抗战，肃清汉奸，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允许民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11月底，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

会（以下简称总动委会），李宗仁任主任，聘请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和苏鲁皖三省知名人士担任委员，特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以社会名流身份参加总动委会，担任委员，铜山工委书记郭影秋担任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总动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战勤部，各部部长由李宗仁委派。

从1937年11月特委机关迁入徐州，至1938年5月徐州沦陷，特委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发动群众全面抗战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推进抗日救亡工作。

首先是加强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当时特委书记郭子化虽以社会名流身份被聘为总动员委员会委员，但在徐州地区的上层人物中，他又是众所周知的“老共产党员”。因其原是徐州第七师范学校的学生，徐州地区和各县许多头面人物是他的同学、熟人。他充分利用这些关系，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其中的大多数人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如总动委会秘书长刘汉川，组织部长夏次叔，青年训练班的班主任雷宾南，徐州专员、总动委会战勤部长李明扬，临沂专员张里元，国民党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铜山县县长曹寅甫等。经过郭子化的

宣传动员，他们大都拥护共产党合作抗战的主张，支持总动委会的工作。郭子化、郭影秋还通过刘汉川、李明扬等，多次直接与李宗仁交谈，介绍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促其与共产党合作抗战。

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鲁南地区的主要统战对象是国民党山东第三区（临沂）专员张里元。张里元系国民党CC派。1937年之后，CC派在山东被复兴社排挤，仅剩下一二个专员。山东CC派头目王少陵，请郭子化在第五战区帮张里元说话，并提出：“只要保住张里元这个专员的位子，我王某让张里元听你的。”郭子化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张里元掌权比反动的复兴社分子掌权更加有利，便答应了王少陵的请求。张里元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感激，便派车专程去徐州，邀请郭子化到临沂商谈国共合作问题。郭子化以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委员、共产党员的身份到达临沂后，受到张里元的盛情款待。宴会上，张里元和郭子化分别讲了话。郭子化在讲话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救国方针政策，使张里元及其所属军政官员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郭子化与张里元进行了几天的交谈，张里元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从而促进了苏鲁豫皖

边区特委与张里元部在鲁南地区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

其次是利用各级动员委员会，努力发展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成立后，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动委会。为了使动委会真正成为动员群众抗日的群众性组织，特委一方面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促使他们聘用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参加各级动委会工作；另一方面，利用郭影秋担任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这一有利条件，先后向各县动委会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有的还担任了动委会的领导职务。当时第五战区四省结合部 20 多个县的动委会指导员，绝大部分由共产党员或倾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担任，由他们具体负责动委会的实际工作。因此各级动委会实际上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半政权性质的抗日群众团体。

特委利用总动委会这一组织公布了各级动委会的组织条例，这个条例是由郭影秋、刘文起草，总动委会通过的。按照这个条例，各级动委会是动员民众抗日的领导机构，应动员民众抗日，组织民众抗日团体，武装工人、农民，肃清汉奸。1937 年 12 月，“第五战区职工抗日联合会”成立，共产党员徐致雨当选为主任。不久，津浦、陇海铁路徐州段及枣庄、贾汪、烈山三个煤矿的职工抗日联合会也相继成立。1938 年 2 月，

总动委会组织部召开青年代表会，建立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以下简称青救团），共产党员刘剑当选为常务委员，共产党员唐秉光、周南、狄庆楼、李锐分别任组织部长、秘书长、宣传部长、训练部长。之后，第五战区各界相继建立了青救团，万余名青年踊跃参加。这些青救团员后来多数成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此后，全区性的“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儿童救国团”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遍及四省边区各县。据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组织部的统计，当时各种民众救亡团体总计 1518 个，约 36 万会员。

另外，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还以总动委会的名义在徐州举办第五战区抗敌青年训练班。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大批沦陷区青年学生流亡到徐州，他们纷纷要求加入抗日行列。郭子化等人积极向李宗仁建议，招募这批青年学生举办抗敌训练班，李宗仁采纳了郭子化的建议。于是，第一期第五战区抗敌青年训练班在徐州中山礼堂举行开学典礼，爱国人士雷宾南出任教育长，郭子化选派共产党员郭影秋、陈筹、匡亚明等任政治教官。这期训练班参训青年 300 余人。经过两个月的短期集训，训练班成员进一步提高了抗日觉悟，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结业后，由总动委会组织部把这批进步青

年编成十几个工作团，派往各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全国沦陷地区不断增加，到徐州的流亡学生亦越来越多，第二期抗敌青年训练班学员已达 5000 余人。这时，训练班更名为抗敌青年军团，划分为政治、军事、女子和艺术四个大队。匡亚明、张百川、臧克家等知名人士出任政治教官。该团培训了大批的抗日青年骨干，同时也为共产党造就了大批人才，使许多爱国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骨干。

按照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部署，枣庄矿区、沛县、滕县等地都以总动委会名义举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参加人员不仅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人员，也有国民党地方游击队人员。政治和军事教官多系特委派出的共产党员。他们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方针政策作为必修课，使数千名参训青年受到了抗日爱国教育，推动了各地抗日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在枣庄地区迅速形成，主要是这一地区党的基础较好，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另外各地来徐州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艺术团体和著名抗日爱国人士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北平移动剧团、上海歌咏队、上海话

剧演出二队、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等团体，都曾相继来到第五战区活动。不少团体中有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电影演员张瑞芳、金山、王莹，音乐家冼星海，共产党员荣高棠、杨易辰、张震寰、武衡等。另外还有一些社会名流，如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张金铎、梁漱溟等也先后来徐州。这些团体和名流来徐后都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及其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里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取得了联系，积极开展演出、讲演活动，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枣庄地区的抗日救亡团体有百余个，规模较大者有枣庄矿工抗日联合会、枣庄各界抗敌后援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枣庄区队、枣庄抗日宣传队、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兰陵青年救国团等。枣庄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

一、建立枣庄矿工抗日联合会

为了推动枣庄中兴煤矿抗日运动的开展，1937年底，鲁南中心县委决定成立枣庄矿工抗日联合会，张福林当选为联合会主任，梁度世、蒋福义为副主任。抗日联合会的宗旨是进一步发动广大煤矿工人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为了救济生活困难的

矿工，联合会向资本家交涉，使资本家同意发给每个矿工 50 斤粮食的救济，从而调动了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全矿数千名矿工大都参加了联合会。12 月 27 日，日军侵占济南。28 日，枣庄矿工抗日联合会召开了反侵略大会。张福林、董明春、韩文一、杨辛在会上控诉了日军的侵略罪行。1938 年春，抗日联合会的大部分成员踊跃参加了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骨干力量。

二、建立枣庄各界抗敌后援会

1937 年 10 月，为了组织各阶层人士抗日，中共鲁南中心县委指示，由李微冬出面联系，成立枣庄各界抗敌后援委员会，广泛吸收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上层人士参加。后援会在党的领导下以合法名义创办了《抗敌日报》，受到矿工、农民的热烈欢迎。许多工人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土地被日军侵占的消息以后，愤怒地表示：“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在矿工高涨的抗日情绪影响下，许多职员也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为抗战捐款捐物、印小报宣传抗日。抗敌后援会在枣庄发展很快，不久便发展 200 多名矿工、400 多名群众参加。

三、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枣庄区队

1936 年 12 月 20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

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在北平成立。之后，这一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迅速遍及全国。枣庄地区的“民先”组织也比较活跃。1937年9月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部先后在枣庄周边地区的邹县、费县、临沂等地组建了“民先”组织。10月，中共鲁南中心县委派县委委员李微冬在枣庄矿区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枣庄区队，李微冬任负责人，骨干分子有白新才、马际礼、李春和、李振哲、刘金庭、刘金民、李守敬、沈春光、李作森等。同年12月，由李作森任“民先”枣庄区队队长，队员有20余人。“民先”内部还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为纪华，委员有李又远（李荣萱）和李作森。后发展的队员主要有许在廉、李克俭、黄岱牲等。枣庄的“民先”组织在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建立枣庄抗日宣传队

1937年，枣庄各界抗敌后援会负责人李微冬以中兴职业中学进步学生梁克忠、梁克懿、沈春光、李克恭、李克俭、李作森、许在廉、李荣萱、李继祥、汪国璋为骨干，成立了枣庄抗日宣传队，由张鸿仪任宣传队长。宣传队利用暑假，先后到各小学、集市、附近农村进行宣传活动，教唱抗日歌曲，宣讲

抗日战争的意义，揭露日军侵略罪行，报道战争局势。在宣传活动中，进步青年学生和矿工中的张福林、沈春台、王世荣（张凯）、李汝佩、金刚（金冠淑）等也常参加讲演。在中兴煤矿专用铁路（枣庄至台儿庄）枣庄站站长高利民（曾用名高济时）的大力协助下，宣传队还常到峰县城、台儿庄等地宣传。随后，学校编印出版了《抗敌报》，广为散发。这一时期的宣传活动，团结了不少工人、农民和学生。暑假后，学校因战事而停课，多数宣传队员响应党组织“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踊跃参加抗日武装，其中李作森、许在廉、沈春光、李克俭、李荣萱等，于1937年11月在纪华率领下参加了共产党员朱道南领导的邹坞暴动武装。

五、建立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

1938年初，抗日战场推进至兖州、泗水以南，第五战区第二十二集团军配属的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在负责人易野元、田拓夫的率领下，随军进驻枣庄地区。服务团辖宣传队和医疗队两个分队，宣传队驻枣庄，医疗队驻滕县城。服务团副团长、共产党员李浩然在徐州时便接受了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的嘱托，领导这一组织在枣庄地区开展抗日活动。中共鲁南中心县委派汪国璋与李浩然接上关系后，决定动员在这一带

活动的枣庄抗日宣传队全体人员及部分进步工人、学生、职员加入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以“战地服务团宣传队”名义扩大抗日宣传队伍。新参加的有张福林、李汝佩、王世荣、金刚、戴培（伟）珍、杜继贤、白秀蓉（白超）、沈春城及杨瑞武（杨辛）等。1938年3月，宣传队召开抗日群众集会，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曾任国民党县长的韩文一在集会上发表了激昂的即席演说，并于会后加入服务团。

特委还以服务团的名义，举办了两期游击战术训练班，委派共产党员于公等人任教员，训练的对象是农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3月初，服务团宣传队到滕县，为伤员慰问演出。中旬，津浦前线的日本侵略军再次发动攻击，医疗队收容了大批伤员撤到枣庄。服务团募集一批医药和慰问品，多次组织慰问活动。3月17日，日军侵略到枣庄西郊齐村一带，战地服务团撤出枣庄。当晚转移到郭里集，入夜后又撤至大阎村与朱道南的队伍会合。服务团在这里召开会议，在副团长李浩然的提议和坚持下，团长田拓夫同意自己转移到大后方，将服务团留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此后服务团宣传队又在阎庄、大炉、车辋一带农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5月，宣传队转移到枣庄西北的墓山、南塘一带，加入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走上敌

后抗日战场。

六、建立兰陵青年救国团

1937年冬，兰陵一带爱国青年陈德吾、杨景田、孙哲南、魏玉华、王升杰（王川）、王伯华、靳耀南、秦泽甫、黄应聘等人，联络了一些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亲朋好友，准备成立青救团，并推举魏玉华、孙景亮去涌泉一带找到临郯青救团县团部。县团部负责人丁梦孙、刘剑等热情接见了他们，确定兰陵青救团为临郯青救团第十七分团。

1938年2月，边区特委以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的名义组建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总团，共产党员刘剑任总团长（后唐秉光接任）。不久，各县、乡的青救团自上而下普遍建立起来。是年四五月份，第五战区临郯青救团第十七分团正式成立，由陈德吾任常务委员，下设组织、宣传委员。青救团主要成员有杨景田、陈德吾、孙哲南、秦泽甫、魏玉华、王川、靳耀南、黄应聘、王锦堂、王伯华10人。青救团成立后，便发动群众，建立了一些基层组织。第十七分团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油印散发各种抗日宣传品和发展团员、扩大组织等。青救团团员王子孚还画了许多生动的抗日漫画，广为张贴。青救团的活动已由兰陵镇转到兰陵周围。但青救团还处在秘密状态，

开会没有固定地点，而且每次开会都要化装，在临时约定地点集合。

1938年冬，青救团利用日伪军之间的矛盾策动兰陵伪军张汝德部与日军火并，并逮捕了两个日军，因青救团没有武装，张汝德只好将逮捕的日军交给国民党收编的土匪王学礼部。这一事件发生后，第十七分团总结了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认为宣传动员人民、组织抗日团体，只是工作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武装，搞武装斗争。因此决定以团员现有的武器武装起来，同时提出了“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口号，号召人民群众捐献武器，并议定由魏玉华、秦泽甫、黄应聘、王伯华4人出面组织武装。他们经过努力，很快组织起一支二三十人的抗日武装，并不断发展壮大。

第四节 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建

在日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侵、国民党韩复榘部溃逃、鲁南面临危急的情况下，枣庄各地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武装民众全面抗战”的号召，分别按照中共山东省委、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部署，发动领导了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日的烽火立即在微山湖畔、鲁南山区、运河两岸熊熊燃烧起来。富有革

命传统、不愿做亡国奴的鲁南儿女，抱着向往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心情，怀着对日军的血海深仇，踊跃投入抗日的洪流，揭开了枣庄地区人民武装抗击日军的历史新篇章。枣庄地区抗日武装组建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各地党组织直接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游击队；二是派共产党员打入已有的地方武装中，做争取改造工作，使其接受党的领导或改编；三是从上海、济南等大城市国民党监狱释放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回到家乡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活动；四是外地流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从国民党主力部队撤出的共产党员，以及从红军中抽出来的军政干部，到枣庄地区开展抗日活动，组建抗日武装。枣庄地区的抗日武装，由于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组建的，所以一般都有一个合法名义，如“人民抗日义勇队”等。枣庄地区抗日武装的组建，标志着枣庄地方党组织开始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一、建立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

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黄口扩大会议组建人民抗日武装的决定，特委委员兼沛县县委书记张光中以县委早在1935年就建立的一支地下游击队为基础，吸收部分青年学生、农民参

加，于1937年11月组织起一支五六十人的抗日武装。这时，边区特委从徐州派来青年救国团团员，协助沛县县委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同年11月，夏镇（原属沛县七区、滕县八区）的共产党员郑安良（又名郑一鸣）、张运海（又名张新华）利用国民党区长白赤霞组织夏镇保家自卫团的机会，打入其内部，使自卫团成为共产党掌握的抗日武装。同时，共产党员王志成变卖家产、渔船，购买枪支，在夏镇南庄一带组织渔民抗日自卫团。1938年3月，日军炮击夏镇，形势危急，张运海、郑安良和王志成分别带领夏镇和南庄的武装，转移到湖西沛县宋庄，与张光中领导的沛县武装汇合，共100余人。

3月初，郭子化、张光中通过统一战线关系，从国民党徐州专员兼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处获得“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李明扬委任张光中为队长。边区特委利用这一名义，公开在沛县、滕县、峄县等地发展人民抗日武装。

3月中旬，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沛县宋庄正式成立之后，为配合台儿庄战役，张光中率部跨湖东渡，三次袭击津浦铁路沿线的日军。人民群众深受鼓舞，义勇队迅速发展壮大。5月17日，在沛县沦陷前一天，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除留下少部

分队员坚持当地游击战外，其余由张光中、谢文秀率领乘船过微山湖，到滕县沙沟镇（今属薛城区）北面的黎墟村，同褚思沛、褚耀斌、褚子方组织的 30 余人的抗日武装汇合，然后北进，到达滕峰边的南塘一带，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调集的峯县、滕县等地的抗日武装会师。

二、建立峯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

峯县抗日武装由三部分组成：朱道南、刘景镇等领导的鲁南抗日自卫团，郭致远、褚雅青等领导的大北庄抗日武装，以及李浩然等领导的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宣传队武装。

1937 年 9 月，朱道南、刘景镇、朱玉相（后叛变）等利用联庄会组织发动数百名群众，在峯县第二区举行邹坞乡农学校暴动，将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反动校长王效卿击毙，缴获步枪几十支，随即建立了鲁南抗日自卫团。全团有 100 余人、60 多支枪。10 月间，朱道南与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取得联系，从此，这支武装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吸纳进步青年，逐渐发展壮大。11 月，为了解决自卫团的供给困难，经边区特委同意，暂编入由滕文中学校长杨士元（曾任国民党阎锡山部师长）建立的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序列，仍保持原有独立编制，受边区特委领导。

1938年3月16日，日军进犯滕县，自卫团在邹县城前村配合国民党守军作战。尔后，根据鲁南中心县委的指示，朱道南、刘景镇率自卫团与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宣传队一起向鲁南山区转移，3月底到达峰县墓山一带。

1938年3月18日，枣庄和峰县城相继被日军占领，峰县北部山区大北庄一带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共产党员郭致远受边区特委派遣以峰县联庄会军政教官的身份做梁继箴部的统战工作，又以武装群众、保卫山区的名义向国民党第四十军军械处要来57支步枪和3万发子弹，武装了部分党员、群众和由枣庄进入山区的工人、学生。他与共产党员褚雅青、邱焕文、丛衍瑞一起，拉起了一支五六十人的队伍，被称作大北庄抗日武装。

鲁南抗日自卫团、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宣传队及大北庄抗日武装于3月底在墓山会合后，遵照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指示，在鲁南中心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合编为峰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朱玉相任大队长，纪华任教导员，刘景镇、李浩然、郭致远任副大队长，张鸿仪任副教导员。全队共200余人，编为四个中队。

三、建立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

1938年1月，王见新、王右池、李乐平等在滕县善垵创办了农民抗日训练班。训练班每期7至10天，学员40至100余人不等，所用经费和粮食多靠募捐。政治教育课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文件；军事课以学习游击战术为主。军事训练所用的武器多是利用关系暂借的。农民抗日训练班办完第三期，日军已逼近邹（县）滕（县）交界的两下店。2月，王见新到徐州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接上关系，特委派八路军随营学校军事教官于公和党的干部于化琪赴滕县，任训练班军事和政治教员。滕县农民抗日训练班办完第五期时，滕县城被日军侵占。王见新等人以训练班骨干为基础拉起四五十人的武装，命名为“农民抗日救国军”，推举于公为指挥，王见新为政治指导员。4月，特委书记郭子化到善垵巡视时，将该部易名为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于公任队长，渠玉柏任指导员。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与日军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受到当地群众拥护和爱戴。5月下旬，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已发展到120余人。

四、建立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

七七事变后，滕县沙沟曙光小学校长董一博和其胞兄董尧卿（曾任国民党东北军炮兵旅长，后闲居在家）主动与阎锡山

部原师长、滕文中学校长杨士元及曾任过福建镇守使的孔昭同联络，共商筹建抗日武装的大事。1937年10月，杨士元、孔昭同、董尧卿等人到济南，从韩复榘那里领了番号并经第五战区批准，成立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委任杨士元为司令，孔昭同、谭松艇为副司令，谭兼任参谋长。司令部下设政训处、参谋处、军需处和招编处。孔昭同变卖了所有土地和家产组军抗战，还身披“抗日保国”彩带遍游城乡，搞募捐，招兵员，很快便在滕县城建立了百余人的武装。在枣庄，杨士元、朱景韩带领滕文中学200余名学生参加了自卫军，又招募部分工人、农民和市民。11月，朱道南等领导的鲁南抗日自卫团编入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经扩军，该部编为三个旅、一个特务营，董尧卿被委任为第二旅旅长。在枣庄扩军之时，董一博、董尧卿找到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汇报了组建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的情况，并分别提出恢复党籍和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何一萍报请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批准，介绍董尧卿入党，并恢复了董一博的党组织关系。12月，鲁南中心县委根据边区特委的指示，派纪华、梁度世、李作森、许在廉、李又远等党员和进步青年20多人去自卫军政训处工作，纪华被任命为政训处副主任。

1938年3月，日军兵临滕县，形势危急，杨士元与国民党军庞炳勋部第四十军联系，欲将鲁南抗敌自卫军编入第四十军序列。特委闻讯后立即命令朱道南、纪华等去滕县，将鲁南抗日自卫团及政训处人员调回枣庄。滕县沦陷后，杨士元率原滕文中学学生为主体的部分武装撤往徐州，后又逃往大后方。日军进攻滕县时，孔昭同的儿子孔宪尧、孔宪纲遭飞机轰炸而遇难。孔昭同老年丧子，更激起了国恨家仇。他重整自卫军，率部转移到邹（县）滕（县）边地区，发展武装，进行抗日。董一博、董尧卿也率少数武装，仍以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名义在家乡临城、沙沟一带开展扩军抗日活动，部队很快发展到300余人，活动于峰西、滕南一带。

五、建立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常备队

1937年8月，国民党临沂地区专员张里元为扩充实力，邀请临沂县大炉的爱国士绅万春圃到临沂城商议建立联庄会问题。边区特委认为，这是建立合法抗日武装的极好机会，便派郭致远陪同万春圃去临沂，与张里元共同商定建立联庄会及其武装问题。随后，特委派李微冬、李韶九、郭致远、刘清如、万国华等人，协助万春圃进行筹建工作。11月10日，临（沂）郯（城）费（县）峰（县）四县边区联庄会在临沂县尚岩沟西

村开明士绅陈玉山家举行第一次会议，张里元亲自出席，会议决定万春圃任会长兼临沂分会会长、李以锦任费县分会会长，田瑶峰任峰县分会会长。联庄会下设办事处，由国民党第三专署秘书李同伟任主任，地方上层人物宋鲁泉任副主任，办公地点设在陈玉山家。办事处设有一支 50 余人的武装常备队，由万国华、刘清如分别任正副队长。费县高桥、临沂大炉、峰县大吕巷及郯城也先后建立联庄会常备队，每队约有四五十人，加上办事处常备队共计 200 余人。在各县联庄会和常备队中，均有边区特委委派的党员干部参加，使联庄会武装直接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为解决联庄会常备队的武器装备、给养等问题，万春圃捐献出自家的枪支、粮食和猪羊，陈玉山献出 5 万斤小麦。台儿庄战役期间，万春圃亲自带领常备队打扫战场，收集到 1 门迫击炮、4 挺机枪、50 多支捷克式步枪、100 余箱子弹和手榴弹，装备了常备队。

1938 年 4 月，四县边联常备队已发展到 300 余人，武器弹药配备充足，在万国华、刘清如率领下，活动于抱犊崮山区的车辋一带。5 月，兰陵爱国人士孙立臣、鲁城的王汉农、万村的李伯方等，各率一部分武装投奔边联办事处。为统一领导，边区特委和鲁南中心县委将办事处常备队整理扩编为一个教

导大队，共产党员、办事处政治部主任郑华光任大队长，岳杰任副大队长。教导大队下辖四个中队、一个大炮队、一个警卫连。不久，又将边联办事处所辖的各地常备队编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以办事处直属常备队为基础组建，万国华任大队长；第二大队由共产党员宋宜安、杜季伟、王墨山等人及长新桥开明地主宋云石的武装组建而成，宋云石任大队长；第三大队由刘清如率领的原教导大队第三中队扩编而成，刘清如任大队长。

六、举行鲁南抗日武装起义

1938年2月，河南省委派彭雪枫来徐州，向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他指出，徐州即将被日军占领，特委要早作向敌后转移的打算。郭子化到枣庄向特委委员、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通报了河南省委的指示，传达了关于特委要向鲁南山区转移的计划。然后，他们到沛县，与在那里发动群众组建武装的张光中、丛衍瑞交流了情况。张光中、丛衍瑞对此表示赞同，并开始将沛县武装向滕峰边区集中。5月，郭子化在徐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王文彬、郭影秋、张如、陈筹等人到湖西地区进行抗日发动工作，邵幼和、张芳久等人到徐州东南开展工作。特委机关

由郭子化率领转移到鲁南抱犊崮山区。会议还决定调集沛县、滕县和峄县的人民抗日武装，组建一支由特委直接领导的基干队伍。并决定特委领导的另一支队伍——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暂不合编，仍沿用原番号，由董尧卿、董一博率领，单独活动于滕峰边山区。

5月中旬，特委机关及特委调集的沛县、临城、滕县、峄县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滕峰边集结，分驻墓山、凤凰庄、南塘和善垆一带。

5月21日，特委在老古泉村（今属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召开扩大会议，特委书记郭子化、特委委员张光中、丛衍瑞、何一萍、陶洪瀛及各县县委、抗日武装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治委员，王见新任政治部主任，韩文一任参谋长。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连。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及褚思沛等人的武装编为第一大队，谢文秀、宋学敏（后叛变）分别任大队长、教导员；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编为第二大队，于公、渠玉柏分别任大队长、教导员；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编为第三大队，朱玉相、纪华分别任大队长、教导员，刘景镇、李浩然、郭致远任副大队长，张鸿仪任副教导员；总队警卫连由李

荆山任连长，李季如任指导员。总队机关设四个处，李微冬任秘书处长，褚子方任副官处长，李景黄任军需处长，褚雅青任军医处长。全队 800 余人。总队部暂驻南塘，三个大队分别驻沙冯、善垵和凤凰庄。

鉴于当时统战工作任务繁重，特委书记郭子化、峰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的主要组建者朱道南、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主要组建者李乐平，以及由上级派来的红军军事干部童陆生等都未在总队任职。但是，在总队创建初期，他们都在总队部一起参与领导部队的抗日活动。

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初建时的番号没有冠以“苏鲁”或“鲁南”两字，也没有“第一”的称谓。同年 6 月 11 日，中共徐西北区委在丰县渠楼创建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此后不久，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才改称“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因两总队皆处于苏鲁边区，最初又都是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领导部署发起的，故又分别称“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因两总队的活动区域一在鲁南，一在湖西，故又分别称“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和“湖西人民抗日义勇总队”。

第七章

全力支援配合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战役期间，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不仅命令自己掌握的武装主动袭击日军的增援和补给部队，还动员、组织两万余名群众支援前线。他们破袭铁路、桥梁，为参战军队运干粮、作向导、救治伤员，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节 战前鲁南地区的军事局势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于1937年12月相继攻陷南京、济南、泰安，次年1月占领兖州、曲阜、邹县、济宁。日军占领南京、济南后，将其作战重心转移至津浦铁路，企图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以实现其连贯南北战场，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南京失陷，也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八路军主要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出席。蒋介石下令逮捕并处决了擅自撤退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国民政府统帅部对战区和战略部署作了调

整，主要是以华中重镇武汉为核心，开展津浦路作战，力保晋南、豫北，阻敌南下，并保卫广东、福建沿海。从双方的军事态势可知，中日在徐州一战已不可避免。而临沂、滕县、台儿庄三座城市，则成为保卫徐州的重要门户。尤其是处于京杭大运河畔的台儿庄，直接扼守着徐州的北大门，若台儿庄失陷，徐州便无险可守。由此可见，能否守住台儿庄，是保卫徐州的关键所在。

1938年2月，中共驻武汉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当面向奉命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的白崇禧建议：在津浦路南段，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法，运动于淮河流域，使南方日军不敢贸然北上；在徐州以北，则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同时，又主动表示，新四军将在津浦线南段开展游击战，配合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牵制华中日军，以便北线军队放手歼敌。白崇禧对此建议甚为赞赏，到徐州后向李宗仁作了传达。

几天后，周恩来又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张爱萍赴徐州拜会李宗仁，转达周恩来的建议，并力促李宗仁痛下决心，早日歼敌。他说：“周恩来先生主张把阵地战和运动战结

合起来，围点打援，以优势兵力将孤出冒进之敌聚歼于鲁南地区。这一带地形比较复杂，可作伏兵之地，长官在此周密部署，胜利可期。八路军在华北可作战略配合，新四军在津浦南段配合李、廖两集团军牵制南线日军，战区可以将主要兵力集中于鲁南作战。歼敌寇，扬国威，振民心，留青史。此其时也。良机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望长官早作英断，万勿轻失这一先机。”李宗仁连声赞好，并请张爱萍回复周恩来、叶剑英“静候捷音”。

从军事思想来说，在这次战役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对国民党的抗战思想和战略战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宗仁和国民党部分高级将领在政府军接连失利，特别是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失败之后，也开始认识到抗战以来正面战场那种单纯的“阵地消耗战”“被动挨打的作战方式”是造成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对共产党人的建议深以为然，基本上加以采纳。在组织指挥台儿庄战役时，李宗仁以擅长固守著称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坚守台儿庄城寨，以顽强的阵地战紧紧地咬住日军矶谷师团濑谷支队（旅团）；以在中国军队中装备比较精良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拊敌侧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另以孙桐萱第三集团军等部组成游击兵团在津浦线中段开展游击战，

迟滞日军后续部队的增援。

第二节 血战台儿庄

整个台儿庄战役共分三个阶段：临沂阻击战、滕县城保卫战和台儿庄大战。战役从1938年3月14日起，至4月7日结束。

1938年2月初，按照日军大本营的决定，“当前的战略措施，是调整在华军事态势，延伸阵地”，不举行徐州作战。日军第五、第十师团对大本营的战略意图持有异议，极力主张向前推进，一鼓而下徐州，直取武汉。该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一向骄矜自负。矶谷廉介、板垣征四郎两个师团长，曾多次向其大本营请战，均被制止。3月上旬，矶谷、板垣通过方面军再次请战，终于获得批准，但要求两师团作战不要超过滕县—峰县—临沂之线。矶谷、板垣接到命令后，分别派出濑谷、坂本两支队（两个旅团）各约8000人，决计大胆深入。濑谷于3月14日出动，目标滕县；在此之前，坂本已开始攻击临沂。

日军发起进攻，津浦前线形势急转直下。李宗仁向蒋介石求兵，蒋介石同意将张自忠部派往临沂方面，汤恩伯军团支援滕县。3月15日，日军濑谷支队向滕县发起攻击。

国民党守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的两个师迎敌。第

一二四师布防城关，第一二二师守城。经一日激战，城关守军死伤愈半，阵地被突破。16日，日军开始攻城。城内守军闭城死守，等待援军。援军汤恩伯军团（辖两个军四个师，5万余人）的第八十一军（军长王仲廉）于16日进至距滕县15公里的官桥，即停止前进，徘徊24小时。第一二二师苦战至17日黄昏，全部战死，滕县城陷落，师长王铭章为国殉难。第一二二师以5000余名官兵的热血和生命，为台儿庄战役的部署赢得了宝贵的三天时间。18日，日军转攻官桥，第八十一军退往津浦路东侧峰县地区的地。接着，日军又在沙沟击败汤军团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19日，日军向峰县攻击，汤军团退往峰县东北的抱犊崮山区。这样，濼谷支队便廓清了前进方向的障碍。20日，日军在峰县至韩庄一线集结兵力，准备强渡大运河，进攻徐州。

这时，国民党鲁南前线已面临严重危机。汤恩伯军团以5万精锐之师，四日内（16至19日）内连败三阵：官桥按兵不动，沙沟阻敌不力，峰县不战而走，致使日军轻易地逼近运河。而此时，台儿庄运河渡口尚无一兵一卒。所幸的是，日军没有连续发动进攻，而于现地滞留四天（20至23日）。这一作战间歇的出现，给国民党军的布防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使孙连仲

第二集团军（辖两个军三个师 2.5 万余人）能乘隙于 19 日赶到台儿庄，填补了战役主要方向上的空隙。

此时，临沂方面国民党守军也得到了加强，总兵力五个师（张自忠部两个师、缪澂流部两个师、庞炳勋部一个师），日军的进攻已被击退。

这时，鲁南前线国民党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 9 个军 17 个师增加到 14 个军 26 个师，并在台儿庄、临沂巩固了阵地，使形势趋于好转。

23 日，濛谷支队不待临沂方面坂本支队的呼应，便向台儿庄发起攻击。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台儿庄防御工事，每天落入台儿庄阵地的炮弹六七千发。激战至 4 月 3 日，台儿庄守军伤亡已达十分之七，但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仍率领将士拼死抵抗，并组成敢死队，与日军开展肉搏战。孙连仲部在台儿庄与日军抗争 15 天，以 1.7 万人的重大伤亡，挡住了日军的进攻。4 月 6 日黄昏，日军开始总退却。这时，汤恩伯军团赶到台儿庄，以 5 万之众的生力军，截杀损兵愈半、人困马乏、士气沮丧的数千日军，追得濛谷支队抛掉全部辎重和车辆，率少数步兵窜进峯县城及附近地区，凭借有利地形死守，等待援军。

至此（4 月 7 日），台儿庄战役胜利结束。整个战役消灭

日军 1 万余人，击毁坦克 30 余辆，缴获大炮 50 余门、步兵炮 77 门、战车 40 辆、轻重机枪 931 挺、步枪万余支。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第三节 抗日武装积极配合作战

台儿庄大捷，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团结抗战的结果。早在 1938 年 2 月，徐州形势紧张，蒋介石赴武汉部署徐州会战时召见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询问：“八路军是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时派部队袭击津浦线，声援徐州会战？”彭德怀慨然回答：“本军为配合徐州会战，不待青纱帐起，即当派队前往。”李宗仁在去徐州前也曾会见彭德怀，希望八路军配合他在津浦线和鲁南战场的作战。为此，朱德、彭德怀于 2 月 5 日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指出：日军集中主力由津浦线南北夹攻徐州，为策应第五战区作战，我军主力除在晋积极作战外，应派出得力支队出平汉线以东，向津浦线袭扰。第一二九师立即准备一个团或两个营的兵力，由宋任穷率领，配足干部与通讯器材，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东出沧（州）石（家庄）路以南至邢台之间活动，声援徐州友军作战，并为在该地建立抗日根据地作准备。3 月 9 日，

朱德、彭德怀致电聂荣臻、刘伯承等：津浦南北段的国民党军队仍在苦战中，日军已遭到沉重打击，你们以前派出之东进部队，应令其向沧（州）德（州）线积极动作，配合津浦北段。与此同时，周恩来、叶剑英也指示活动在长江流域的新四军张云逸部配合李品仙、廖磊等集团军积极作战，钳制南线日军。3月13日，朱德转告蒋介石说，已“派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该师所属一个旅东出津浦线，配合鲁南主要战线作战。现该部已逾南宫，东进津浦线行动”。徐向前部与先前抵冀南的孙继先所率东进支队、陈再道所率东进纵队、宋任穷所率骑兵团等并肩作战，连克安国、高阳、献县、南宫、巨鹿等地，迟滞了津浦线北段南侵的日军。第一二〇师收复平社、高村、原平等地，破坏铁路50余里、桥梁19座。第一二九师专门组建了津浦支队，夜袭黄河崖车站和津浦铁路桥，对津浦路北段之日军构成直接威胁。

据统计，1938年2月至4月，八路军、新四军主动出击，先后作战400余次，毙伤俘及击溃日军2万余人，击毁汽车500余辆，缴获机枪100余挺、步枪300余支，牵制10万多日军，有力地配合了鲁南正面战场作战。

在八路军、新四军为配合台儿庄战役，在铁路沿线主动袭

击日军的同时，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抗日武装和群众团体不断破袭铁路，频繁袭击日军增援部队和辎重部队。在济南、鲁西北、山东西区等地向日军发起攻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并迟滞了日军行动。

在台儿庄战役的中心战场枣庄地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团体更是积极地给予配合。张光中领导的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三次袭击津浦铁路临城的日军：第一次缴获迫击炮一门，第二次焚毁了临城火车站，第三次袭击了日军巡逻队。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于公、王见新领导下，在津浦铁路官桥、井亭一带多次伏击日军汽车队，并炸毁了津浦铁路滕县城南北的两座铁路大桥，击毙日军修桥工兵 10 余人。峯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在朱道南、刘景镇领导下，在临枣铁路、公路上多次设伏，袭击日军增援部队，毙伤日军 10 余人，缴获战马 3 匹。津浦铁路鲁南段、陇海铁路徐州段的铁路工人及枣庄煤矿的工人，在边区特委及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 3000 多人的破袭队、爆破队。枣庄矿工抗日联合会负责人张福林动员数百名煤矿职工，将临（城）枣（庄）赵（墩）铁路支线大部分路段的铁轨扒掉。他们炸桥梁、扒铁路，切断了日军的交通联络和补给线。日军设在枣庄的汽油库和在泥沟的弹药库等都是被他们

炸毁的。

第四节 人民群众踊跃支前

台儿庄战役期间，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指示所属各县区党组织，要发动群众，踊跃支前。特委书记郭子化明确提出“一切为了抗战，一切适应抗战的需要”，并号召工人、农民“不为敌人开车，不为敌人修路，破坏敌人运输”。邳县青年救国团组成拥有 1000 副担架的担架队，在敌机不断轰炸的情况下，活动在运河两岸抢救伤员。青救团在各交通要道设立战地服务团、民众驻军联合办事处，接待过往的中国军队，并主动为军队作向导。在沿陇海铁路的运河、赵墩等车站上设有儿童服务队，给过往军队送茶送水。在靠近前线的车辐山车站设战地安慰所，为军队传送信件，提供临时休息场所。邳县青救团还组织了 2000 多辆小推车，乘夜深入敌后，用驴驮、担挑、车推等办法，抢运粮食，支援前线和救济难民。运粮队伍在敌机轮番轰炸扫射的情况下，日夜抢渡运河。队长佟永春、杨学忠等在日军一次轰炸中衣服被炸烂，人被埋在土里。他们从土里爬出来，继续带领群众运送物资。运粮的群众有的被炸伤，有的献出宝贵生命。他们连续坚持十余昼夜，计运送粮食数十万斤。

沛县县委组织了 500 多人为军队侦察敌情，传送情报。该

县游击队还组织上千名群众沿微山湖破坏铁路。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宣传队、卫生队分赴枣庄、滕县为军队宣传慰问，收治伤员。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总干事郭影秋亲率宣传队到战场慰问，演出革命戏剧《放下你的鞭子》。

除了党组织和人民团体有组织地支援前线部队之外，当地群众还自发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支前活动。如在滕县城保卫战中，有三位老人组织铁匠用铁轨连夜打造了 20 多把大刀，送给守城将士；滕县武术拳师郭宽率领弟子 30 多人要求配合军队守城参战。第一二二师少校副官鲁福庆在战斗中被俘，日军残酷地把他当作靶子射击，群众在掩埋尸体时，发觉他尚有一丝气息，就将他抬到村里隐藏起来，细心调养。待他伤愈后又送其归队。在郭里集，一位卖菜的农民机警地打死一名下乡侦察的日军。在峰东的战斗阵地上，机枪手全部牺牲，重机枪也被日军夺走。一位农民向导见此情形，奋不顾身冲过去，硬是把那挺机枪又夺了回来。上述动人的事迹，屡屡出现在台儿庄战役的各个战场上。战后，李宗仁就民众问题与黄炎培晤谈时说，他在第五战区通令各地动员委员会，赶紧着手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结果像其他战区老百姓那种“仓皇失措，忙于逃命”的现象，不复见于第五战区。第五战区老百姓，“一个个挺起

胸膛，提起标枪，赴疆场杀敌。”在谈到民众的支援时，他又说：“淮南、鲁南各地民众的力量，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抢救伤员的是民众，当反间谍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运输炮弹、粮食的，也是民众。这些民众完全是赤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地担任起救亡的责任来了。”

总之，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抗日群众团体，以及枣庄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在支援、配合台儿庄战役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为徐州沦陷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八章

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创建抱犊崮山区根据地

徐州失守，枣庄地区沦为敌后。中国共产党枣庄地方组织毅然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救

亡团体和群众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根据地。

第一节中共鲁南特委的建立

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将进攻重点逐步转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先进攻平原，后进攻山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全面封锁。在维持会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县区乡三级伪政权。这时国民党的政策也发生重大变化，由“容共”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枣庄的抗日形势也非常严峻，刚开辟的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处于日伪顽的夹击之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仅能在抱犊崮山区的大炉、高桥、徐庄、北庄、车辋一带活动。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8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撤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分别建立苏皖、苏鲁豫、鲁南3个特委。郭子化调边区任省委统战部长。在鲁南特委正式建立之前，鲁南各县直属边区省委领导。1939年1月，中共鲁南特委在矿坑村（今属兰陵县）正式成立，宋子成任特委书记兼社会部长，组织部长为刘剑、宣传部长为许言、统战部长为杨士法、职工部长为张福林、青年部长为蓝铭述、妇女部长为李汝佩、政府工作部长为于化琪、军事部长为钱钧，委员

还有张光中、李乐平、张岗，方奕生、肖芳洲先后任秘书长。特委下辖峯县县委（县委书记为纪华）、滕县县委（县委书记为王丹墀）、临郯县委（县委书记为王永福）、边联县委（县委书记为孙振华）、临费县委（县委书记为商向前）、费县县委（县委书记为刘次恭）六个县委。临郯中心县委随之撤销。鲁南特委机关对外称八路军第三工作团。鲁南特委的成立，使鲁南地区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标志着鲁南地区党的组织建设走向了统一发展的道路。

鲁南特委成立后即转移至南坡村。不久，被日军发现。日军出动骑兵中队攻袭南坡，宋子成率特委机关人员向南坡以西的卢山转移。与敌周旋一天，4名机关人员牺牲。入夜，日军撤退，特委机关转移到大炉，与直辖第四团会合。

1月10日，就在日军突袭鲁南特委的同时，驻临沂的日军200余人进犯费县东流村一带。东流村民众在吴宝贵、吴恩庆等人的带领下，用土枪、土炮、铡刀及少量步枪，依托圩寨，顽强地抗击日军。战斗从清晨持续到傍晚，共打死日军75人（内有两名指挥官）、伪军21人，仅吴恩庆就杀死日军17人。最后，日军冲进圩子，全村遭到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73名村民壮烈牺牲。事后，鲁南特委以八路军第三工作团的名义派

出慰问团，对东流村的受害群众进行了慰问。在拔除车辎日军据点之后，鲁南特委、边联县委和直辖第四团抽调干部百余人，分成 20 多个工作组，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广大农村建立了农民救国会，选举宋宜安为会长。同时将一万多名青壮年按班、排、连、营组织起来，并在“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的号召下，将相当数量的民间枪支从地主手里转移到农民抗日自卫武装手中。鲁南特委十分注意武装斗争工作的开展，要求各个县委除尽快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外，还要尽快组建起各区委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以武装斗争作先导，开辟扩大根据地。特委直接掌握的有三支武装，一支是用统战工作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对外称八路军第十二支队。党组织派张岗、钱钧、董少白、郭华、訾源等人，加紧对这支武装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使之真正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另一支是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当时用张里元部队的番号）。再一支就是原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利用四县边区联庄会的名义组建的四县边联常备大队（当时改称张里元的直辖第二营）。上述三支武装，多次击溃了日伪顽军对根据地的进攻和“蚕食”，保卫了抗日根据地。

中共鲁南特委在省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特委向各县委发出了在保

证质量的前提下，大量发展党员，建立完善各级党组织的指示。特委成员分工负责各县委的监督检查工作。书记宋子成负责全盘工作，刘剑负责临郟县委，于化琪负责边联县委，蓝铭述负责峰县县委。峰县县委先后发展了张月如、赵静波、戴子愚、马瑞祥、王磊等党员，建立了涧头区委、沙沟区委、棠阴区委等；滕县东部地区由原来一个支部发展到七个支部、两个小组，党员人数也由原来的十几个人发展到 60 多人。滕西地区也先后建立了皇殿岗、生庄、苗庄、柴里、西岗、大坞等党支部。郟城区委先后建立了庄坞、长城、兰陵、道桥等区委和两个特支。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工作，特委领导的六个县大都建立起支部、区委、县委三级组织机构。党员队伍发展到 1000 余人，党员人数最少的县也有六七十人，人数最多的县有二三百人。

（二）发动群众，建立救亡团体及群众组织。党的组织普遍建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进一步发动群众，组建各种抗日团体，把工作引向深入。特委成立了民运工作团，特委书记宋子成任团长，分赴各县发动群众。边联县委在原农会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救会，成立了农民抗敌自卫团，宋宜安任总指挥。该县建立了八个工作区，各区均有抗日武装。临郟地区在临郟县委的领导下，分别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工作队和三个

剧团，并在芦汪子一带建立了 300 多人的农抗团。有的区县还建立了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一些村庄形成了村口有岗哨，村内有歌声的抗战局面。

（三）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做好统战工作。鲁南地区封建土顽割据，山头林立，“司令”遍地，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因此，遵照党的统战政策，团结和争取一切抗日力量，打击和孤立极少数顽固派，就成了鲁南特委的一项重要任务。鲁南特委根据分局的指示，首先依靠大炉的爱国人士万春圃，使特委在大炉、车辋扎下了根。另外，加强了对张里元的统战工作。郭子化与张里元协商建立了四县边联办事处。办事处是一个以统战关系为主体的半政权机构，边联县委就在其掩护下行使职权。1938 年秋，义勇总队改称张里元部直辖第四团后，特委便派干部到张部帮助工作。1939 年 1 月，中共山东分局又派童陆生到张部任副司令，张克辛、曹光彬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科副科长。鲁南特委根据分局的指示，继续加强同张里元的统战关系，使党在抱犊崮山区的抗日根据地得以不断巩固和扩大。

第二节 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的建立

1938 年 5 月 19 日徐州失守，驻守苏北、鲁南的国民党第

五战区数十万大军全线溃退，枣庄地区沦为敌后。日军在这一地区的交通线、重要城镇均部署重兵把守，并网罗大批汉奸败类组成伪军和维持会，以加强占领区的统治。这时，枣庄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大都土崩瓦解，土匪、流氓和地主武装蜂拥而起，只有山区仍为国民党政权、地主民团和“山大王”所控制。

峰县城大地主王哲书、王广澜，商人孙鲁星、卜竹亭，枣庄商人刘晓峰，台儿庄的郑典三、袁镜湖，韩庄的张传浦，贾汪的寇子良、逯子云，汴塘的杜玉藻等无耻之徒纷纷投靠日本人，在日军的卵翼之下组织维持会和县、区、乡各级伪政权。日伪军不时出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使原本就灾难深重的枣庄地区人民群众更加民不聊生。

与此同时，由于台儿庄战役后战场上丢弃了大量武器弹药，民众处于无政府状态，谁捡到就属于谁，无人过问。加之这里地处苏鲁两省交界处，在广大鲁南山区，旧政权统治历来比较薄弱，土匪、民团盛行，民间枪支极多，因而为各方人士组织武装创造了条件。在此情况下，一些未及逃亡的国民党地方官员纠集地主、土匪、特务、流氓等，纷纷打着抗日的招牌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拉起武装。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合法

政权”和军队头衔滥发委任状，网络各种势力，割据一方，称王称霸。枣庄地区山头林立，“司令”多如牛毛。其中较大的有以下几部分：（一）活动在枣庄以北的北庄一带的国民党第五区游击第三支队梁继璐部，他就任司令后便任命峰县各区联庄会的会长为他的团长、营长；（二）活动在峰县第五战区马兰屯一带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五〇支队黄僖堂部。黄原系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就任该部司令后又把各区联庄会会长封为其梯队司令；（三）活动在台儿庄以北的南洛、北洛一带的国民党山东省第三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游击司令张里元所属之孙业洪支队；（四）活动在贾汪煤矿以东之固岬及运河南北两岸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三总团第二分团陆仰山部和龙希贞部；（五）活动在铜山县第二区青山泉及柳河两岸的国民党苏鲁边游击司令韩治隆部；（六）国民党的滕县县长周侗、峰县县长李同伟、铜山县县长蓝伯华、邳县县长王化云等人利用合法名义组织的武装。有些区长也拉起了队伍。这些人或利用旧政权权势，或依仗某些反动势力，或利用地主民团、小股土匪武装为基础，到处搜缴民枪，拉夫充数，扩充实力。他们不管人数多少，头目皆称“司令”。枣庄地区大小“司令”有72个之多。这些乌合之众打

着抗日的旗号，鱼肉乡里，欺压百姓。

除此之外，峰滕铜邳地区土匪蜂起，台儿庄以北地区较大的土匪有王学礼、张发德、梁广怀等，每股多达数百人，有的千余人；在贾汪以东的铜山县和邳县边境附近较大的股匪有魏玉吉（魏荣宽）、刘七、黑烟筒、大脚丫子、姜东海等；在运河北岸有邵庄户、李花、曹文家、李云福等；峰滕边境有曹万伦等；运河南岸的峰县地区，西有平山子的潘明希，东有杨楼的张元太。这些土匪，无论大股小股，都到处抢劫绑票，各阶层人士无不切齿痛恨。

在汉奸操纵下，各种反动会道门也迅速孳生蔓延。沙沟车站以东的黄沙会、峰县城周围的中央道、贾汪周围的红枪会，都名为保家，实则充当日本侵略军的走狗。运河以南地区的红枪会头子王亚平自称红枪会总队司令，由于替日军效力有功，被称为“铁板太君”。

枣庄地区的地主阶级为了保家护产，也乘机扩充私人武装，多者百人，少者数十人。大部分地主武装与土匪私通勾结，坐地分赃。

在这种混乱局面之下，各种武装力量的地盘犬牙交错。他们时而勾结，时而械斗，但欺压百姓却是其共同的特点。不管

是什么人，只要拉起武装，就以抗日保家名义向当地群众派粮派款，使沦陷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从创建之日起就勇敢地开赴抗日前线，为国家、为民族、为黎民百姓的生命财产而战，打伏击、破铁路，歼灭、牵制大量日军，为支援配合台儿庄战役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这支抗日武装继承发扬老红军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时时处处爱护百姓，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爱戴和支持。

台儿庄战役前后，活动于峰县南部、运河以北地区的地方抗日武装，主要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五〇支队第三梯队孙云亭部、孙伯龙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区特种工作团第三分团第五大队邵剑秋（邵世澄）部，还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董尧卿部。在此之前，峰县县委已派共产党员孙怡然、孙伯英进入孙云亭部做争取工作。孙伯龙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曾任国民党峰县县党部书记。他依靠自己的地位和其父在周营一带的社会关系，组织了不到百人的抗日武装。由于他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五〇支队司令黄僖堂都是复兴社成员，因而当上了黄部的参谋

长。不久，由于孙伯龙不满黄僖堂的反共政策，便带着自己的部队离开黄部，单独活动在周营地区。邵剑秋是个热血抗日青年，在家乡办过乡农学校，还曾在张家口张克侠主持的西北军干训队受过训，国民党峰县县政府曾因他“思想左倾”而捉拿他。抗战爆发后，他在自己的家乡峰县西部弯槐树村一带，利用同学、家庭关系，联系了一部分抗日知识分子，在联庄会的基础上组织起 200 多人的抗日武装。因组建抗日武装急需一个正式名义，便接受了特种工作团的委任。孙云亭、孙伯龙及邵剑秋等虽然打的是国民党旗号，但拥护共产党的合作抗日主张。

1938 年 6 月，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为了巩固滕峰边区，扩大抗日根据地，派朱道南率义勇总队第三大队赴峰县南部地区活动。第三大队抵达峰南后，部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走到哪里便把抗日歌曲唱到哪里，帮助群众重建家园，在群众中影响很大。经过朱道南说服动员，孙伯龙、孙云亭、邵剑秋均表示愿意与共产党部队合作，共同抗战，同意建立“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

6 月下旬，朱道南在周营主持召开了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成立大会，孙伯龙、孙云亭、邵剑秋、董尧卿以及义勇总队

第三大队的刘景镇参加了大会。会上公推朱道南为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孙伯龙、邵剑秋、孙云亭为副主任委员。根据邵剑秋要求，鲁南特委派文立正等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邵部工作。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的建立，为后来创建八路军运河支队、峰县支队，开创峰南黄邱山套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建立不久，在周营附近的白楼村举办了抗日青年干部训练班，鲁南中心县委派来共产党员、辅仁大学毕业的文立正任政治教官，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女队员梁巾侠任助理教官。训练时间为一个月，有 50 余人参加培训。受训人员后来大都成为抗日部队的骨干。后因日军“扫荡”，形势紧张，训练班只办了一期就被迫停办。此后，文立正奉命留在邵剑秋部工作。

第三节 开辟滕峰边区根据地

1938 年 5 月徐州失守后，山东全境沦为敌人后方。这时，山东的日伪军主要兵力用于控制中心城市，其兵力不足以向山东腹地广大乡村进攻，这就为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 1938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就指示山东省委，山东党应以发动群

众、开展游击战争与建立根据地为中心任务。4月21日，中央又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山东、河北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划分若干游击分区，成立游击司令部，组织不脱产的自卫军，在已收复的地区，通过上级或司令部的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建立县政府。5月20日，毛泽东主席致电第十八集团军并长江局：“徐州失守，武汉危机，我军准备向苏、鲁、豫、皖四省挺进。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得力一、二两营去作基干更好。”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于5月下旬决定将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仍由郭洪涛任书记，领导黄河以南的山东全境和原属河南省委领导的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所辖地区。至此，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划归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边区省委在上南庄会议上作出了在山东各地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决定，随后又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内容之一就是向南发展，开创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这一战略计划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根据中央及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边区特委积极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和努力创建抗日根据地。调集沛县、峒县、滕县抗日武装，在滕县、峒县边区的南塘一带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正式

建立党领导下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总队部驻滕县第二区的南塘，第一大队活动于羊庄、北溪一带，第二大队活动于善垌、桑村一带，第三大队活动于临枣铁路两侧、墓山南北一带。义勇总队成立后，便在滕峰边一带积极开展袭击日军活动。第一大队曾袭击官桥火车站的日军，并在柴胡店抓获大汉奸、伪济南市商会会长的儿子张某，对其罚款 1000 元，充作抗日报费；第二大队在柴胡店伏击日军，打死打伤数人；第三大队在甘霖伏击日军运输队，打死打伤日军数人，缴获洋马三匹、东洋刀两把、弹药物资一宗。人民群众无不称赞“义勇总队才是真正抗日的”。与此同时，边区特委还领导义勇总队在善垌、南塘、赵庄南北一带广泛开展群众抗日工作，先后组织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抗日自卫团等群众抗日团体。6 月，为开辟滕峰边抗日根据地，特委在滕县徐庄建立了滕峰边县委，并在附近十几个村庄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和自卫武装，还积极筹备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在此之前（4 月下旬），中共滕县党组织为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派生碧泉、马奉莪、李景黄等与退逃至滕西的国民党滕县县长周侗联系，协商建立了滕县抗日联合政府，由周侗任县长，中共党员马奉莪任第五区区长。

边区特委领导义勇总队在滕峰边山区发动群众，袭击日军，发展党组织，使这一地区的抗日运动空前高涨，义勇总队迅速发展，特委控制的地区不断扩大。这也引起了原来盘踞这一带的封建地主武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嫉妒和仇恨。他们封锁抗日武装的给养，限制共产党的活动。边区特委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先后派郭子化到张里元部，李微冬、韩文一到申宪武部，石涛到李子瀛部，韩去非到王洪九部，朱道南到王学礼部，赵笃生到沈鸿烈部，做团结争取工作，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经过说服工作，其中一些人与边区特委保持了较好的统战关系，而另一些人则把特委的工作视为软弱。自称为国民党华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的马卫民，收编附近的土匪武装，组织了一支400余人的队伍，盘踞在滕峰边山区的马庄一带。他们到处抽枪、派款、牵牛、绑票，群众对其恨之入骨。更有甚者，他们经常用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名义绑票，还在徐州国民党的报纸上骂义勇总队是土匪。一次，义勇总队第三大队第三中队的司务长乔锦章，率领10余人到墓山村催柴草、粮食，路过小马庄时，被马卫民部的人收了枪，扣了人。义勇总队多次派人交涉未果，于是决定歼灭这股顽匪。义勇总队与马卫民部激战3日，全歼马部400余人，生俘马卫

民，缴获电台一部及大量枪支弹药，被马部抓去的 10 余人也全部解救出来。消灭了顽匪马卫民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认为只有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才是保护老百姓利益的抗日队伍，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义勇总队。

边区特委进驻滕峰边山区后，先后建立了滕县特支、滕峰边县委，并充实调整了峰县县委，群众性抗日工作不断高涨，义勇总队迅速壮大，滕峰边山区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第四节 反击地方顽军的进攻

滕峰边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形成以及义勇总队的发展壮大，引起了这一地区顽固势力的不满和仇恨。1938 年 6 月，驻滕县东部冯卯的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司令申宪武，纠集邹县的秦启荣、峰县的梁继璐、滕县的刘广田、费县的李以锦等国民党地方顽军，密谋吃掉这支新建的抗日武装。申宪武率 3000 余人南下羊庄镇，妄图围歼驻南塘的义勇总队。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有统战关系的峰县士绅崔遽庵获悉这一情报后，将地方顽军的阴谋信告特委。郭子化立即通知朱道南率领义勇总队第三大队连夜返回南塘总队部。郭子化主持召开会议，分析严峻的斗争形势，并命令各大队立即进入临战状态。会后，特委调集鲁南抗敌自卫军董尧卿部、临邳费峰四县边联常备队前来参

战。与特委统战关系较好的田瑶峰、崔遽庵、梁继箴等也派人前来协助。公推上级派来的红军军事干部童陆生统一指挥这次反顽战斗。部队迅速集结，密切配合，经四昼夜激战，将集结在羊庄、庄里、北塘的申宪武部一举击溃，并争取了朱锡海中队投诚，取得了反顽作战的初步胜利。申宪武率残部逃回老巢冯卯、东江一带。

作战中，义勇总队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总队政治委员何一萍及 10 余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30 余人负伤。何一萍，又名何冰如，河南孟县人。1913 年生，七七事变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 10 月受中共河南省委派遣来特委工作，先后任特委委员、宣传部长兼鲁南中心县委书记、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政治委员等职。他担任义勇总队政治委员后，不避危险，深入前线指挥，赢得了全体指战员的爱戴和拥护。在反顽战斗中，何一萍不顾大家劝阻，坚持到前沿阵地视察敌情，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25 岁。何一萍牺牲后，边区特委和义勇总队召集全体人员在北塘村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高度评价何一萍的革命功绩，号召全体官兵向他学习。特委书记郭子化沉痛地写下了《悼念何一萍烈士》诗一首：

热血满腔愤义师，锄奸未尽竟长辞。

独留豪气摧敌胆，先把宏躯奠国基。
呜咽南塘流漫漫，隐忧北岭草萋萋。
祈君安息泉台下，逐倭杀寇有健儿。

第五节 抗日义勇总队撤离滕峰边区

取得反击地方顽军申宪武部战斗的初步胜利之后，边区特委和义勇总队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释放了申部全部被俘人员，并退还了缴获的枪支弹药，真诚地希望申宪武能够接受教训，改变其反共立场。可申宪武毫无悔过之心，反将义勇总队的宽容忍让视为软弱可欺，妄想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他一面在冯卯、东江一带召集旧部，招兵买马，一面联络文王峪的地主武装韩秀尧、东江的土顽刘广田等，又聚集起上千人马，凭东江之险，固守待机。另外，峰县、滕县、费县等地的土顽势力，见马卫民、申宪武部被义勇总队消灭或击溃，既怕又恨，这些打着抗日旗号、割据一方的土霸王，为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同声相应，沆瀣一气，在申宪武的串通下，纷纷向边区特委和义勇总队驻地逼近，对初创的滕峰边根据地形成四面包围之势。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郭子化召集特委和义勇总队负责人

开会研究对策。一致认为，义勇总队要想在滕峰边站稳脚跟，创建抗日根据地，必须向省委请求援助。于是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派王见新北上求援。1938年6月上旬，王见新抵达鲁中，向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汇报后，郭洪涛决定率省委机关和鲁中第四支队第二、第三两个团南下支援义勇总队。同时执行党中央指示，在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滕（县）费（县）峰（县）一带创建鲁南根据地。6月15日，郭洪涛、省委组织部长兼第四支队第二团政治委员程照轩、第四支队副司令赵杰、第四支队参谋长王彬等率领省委机关大部和第四支队第二团、第三团一个营及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向鲁南进发。部队到达滕县东北山区，与义勇总队取得了联系。7月7日，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一周年纪念日，郭洪涛在滕东主持召开干部会议。会上，郭洪涛分析了当地敌顽我友各方力量，并作出部署，决定集中力量打击申宪武的老巢冯卯。在滕东冯卯、高庄附近，第四支队在义勇总队配合下，首先向申宪武老巢冯卯发起突然进攻。经过7昼夜20余次战斗，先后攻克申部驻地冯卯、高庄等村，毙伤顽军200余人，俘15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第四支队阵亡10余人，副司令赵杰和第二团第一营营长封振武等30余人负伤。8月2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

就滕峰边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其主要内容是：（一）我部队至滕县后，配合当地义勇队、自卫团进攻顽军申宪武老巢，经几日围剿已完全解决。（二）此地义勇队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共 600 人，另有 400 名不脱产的自卫团武装。（三）国民党滕县县长周侗尚好，今后民运工作，计划与其共同进行。（四）最近将滕县工作搞好，再开展峰县工作，最后进行费县工作，创建抱犊崮根据地。从郭洪涛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可知，省委的意图是先开辟滕峰边工作，然后以此为依托，逐步向东发展，最终创建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

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率领的第四支队和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的一系列军事反击，虽然粉碎了地方顽固势力的进攻，但未能对其给予歼灭性打击。地方顽固派申宪武得到喘息机会后，又联合到滕县活动的国民党复兴社分子秦启荣，并鼓动滕县的褚汉峰、刘昭汉、孙鹤岭，峰县的梁继璐、黄僖堂，费县的李以锦等地方顽固势力，从四面包围滕峰边根据地。加之省委第四支队在反击顽固派进攻过程中，没有很好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打击面过宽，致使一部分原与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保持较好统战关系的地方武装，亦纷纷调转枪口，仇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样，在滕峰边根据地周围，顽固势

力的力量数倍于抗日武装力量，抗日武装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而此时滕峰边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面积狭小，抗日武装在根据地内回旋余地不大。边区省委分析了上述形势之后认为，建立滕峰边根据地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于8月中旬决定，省委机关和四支队撤离滕峰边山区，返回鲁中。同时向边区特委发出通知：（一）滕峰边区偏处一隅，省委机关须移驻沂蒙山区，指挥全面工作；（二）鉴于特委与张里元有较好的统战关系，省委可在鲁中张里元辖区活动；（三）土顽势力联合向我逼近，形势不利，特委率义勇总队能在当地坚持活动就在当地活动，否则可以转移到其他地区。

郭子化接到郭洪涛撤离滕峰边的指示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为了挽救滕峰边的危局，他派朱道南和丛林去莱芜国民党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找到在石部任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张友渔，请求支援未果。在这种困境下，特委和义勇总队决定撤离滕峰边区，向抱犊崮山区大炉一带转移。滕峰边区的群众难舍难离，尤其部队家属怕顽军报复、杀害，有300多户要求随部队转移，特委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义勇总队800多人，加上300多户家属，成为一支2000多人浩浩荡荡的庞大转移队伍。

东撤行军不久，突然天降大雨，部队和随军家属冒雨前进，由于道路泥泞，行走极为困难，一天仅能走几十里，在路上还不时受到顽军的阻击。部队在山亭休整了一天，第二天，当先头部队东行抵至滕县东部旱河子村时，遭到土顽刘玉华部堵截。义勇总队一面掩护随军家属撤退，一面进行自卫还击。战斗中，义勇总队第二大队连长刘廷玉、政治指导员杜继贤负伤。第二大队教导员渠玉柏、义勇队政治战士杨际元在掩护部队撤退时负伤被俘，顽军在他们身上捆上石头后将其推到奔流的河水中，渠玉柏、杨际元壮烈牺牲。部队于当夜到达鲁南中心县委驻地徐庄宿营。第二天，义勇总队从徐庄继续东行，于深夜到达孔家汪村，又遭到土顽李以锦部的堵截。天亮后，张光中持张里元的信去交涉方准通过。经过四五天的艰苦跋涉，特委率领义勇总队几经辗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目的地—临沂县大炉。

第六节 创建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

抱犊崮地处临沂县、费县、峄县交界处，是鲁南山区最高的一座山头，海拔 580 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交通闭塞。其周围山区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义勇总队到达抱犊崮山区之后，活动于抱犊崮以东的大炉村周围地区。这里曾是郭

子化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统战工作和群众基础比较好。为适应当地抗日斗争的需要，在特委和义勇总队到达抱犊崮山区之后（1938年8月），建立了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县委，王永福（王一夫）任书记，对外名义为“四县边联办事处政治部”。原四县边联办事处主任李同伟，在出任国民党峰县县长时，曾拉走边联县部分武装。四县边联县委将剩余部队进行整顿，并通过进一步发展，将队伍改编为两个营，即山东第三区保安司令部直辖第一营、直辖第二营。直辖第一营由地方士绅宋云石任营长，共产党员王墨山、宋荣文、杜季伟等掌握部分兵力；直辖第二营由万春圃任营长，其武装由共产党员万国华、刘清如、蓝铭述等掌握。第二营有400余人，武器较好，营、连两级都建有党的组织。同时，经边区省委批准，将临郯青救团和四县边联大队大部编入义勇总队第一、二大队。

1938年9月，边区省委根据鲁南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心已转移到抱犊崮山区的实际情况，决定撤销鲁南中心县委，建立临郯中心县委，由刘剑任书记，韩去非、周南、丁梦孙、朱道南、杨士法、石世良分别任组织、宣传、青年、统战、民运和军事部长。中心县委领导峰县、滕县、四县边联、费县等县委。临沂县委撤销，该县的党组织由中心县委直接领

导。中心县委按照边区省委的指示，负责开辟东海、赣榆等地党的工作。

抱犊崮大炉一带是贫瘠的山区，当地人民群众生活非常艰苦。为减轻当地群众的负担，9月，经边区省委批准，义勇总队在保持原领导干部和独立编制不变的情况下，暂改用张里元的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保安司令部直辖第四团的番号，仍受边区省委指挥。改编后，张里元仅供给棉大衣千件和少量弹药，并未执行统一发放粮食、被服的协议。部队处境虽有改善，但供给依然十分困难。义勇总队改编为直辖第四团后，张光中任团长、李乐平任政治委员（对外称政治处主任），梁度世任政治处副主任，韩文一、张少溪先后任参谋长，下辖三个营：第一营营长为朱玉相（原第一大队长谢文秀调离），教导员为宋学敏；第二营营长为石世良（原第二大队长于公调离），教导员为白坚（原第二大队教导员渠玉柏牺牲）；第三营营长为刘景镇，教导员为张鸿仪。

1938年12月，中央决定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整编抗日武装起义部队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命张经武为总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后，义勇总队（直辖第四团）正式列入山东纵

队编制，团长张光中、政治委员李乐平奉命到山东沂水县王庄参加山东纵队成立大会。会后，张光中参加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举办的团与支队领导干部训练班。在张光中学习期间，山东纵队派李如琴接替张光中任团长。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决定该部编入山东纵队后，对外仍沿用直辖第四团的番号，继续同张里元保持统战关系，在抱犊崮山区积极开展抗日活动。

1939年4月，经山东分局同意，直辖第四团改称张里元的保安第二旅第十九团，并将四县边联办事处领导下的保安直辖第二营编入该部。张光中任团长，李乐平任政治委员，参谋长为张少溪，政治部主任为毕秀山，后勤供应处长为刘炳文，宣传队长为渠维瑛。第十九团下辖三个营：第一营营长为刘清如，教导员为郎义民；第二营营长为石世良，教导员为李荆山；第三营营长为刘景镇，教导员为张鸿仪。

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对外称直辖第四团和第二旅第十九团时期，按照山东纵队的部署，活动于抱犊崮山区的大炉、车辋、埠阳、长新桥、白山一带。义勇总队在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在抱犊崮山区开展群众工作，协助边联县组织农会、妇救会、自卫团和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同时，派部队打击日伪顽小股武装，有时配合张里元部伏击日军。

胭脂山又名颜柱山、燕柱山，位于临沂县境内（现属兰陵县），地势起伏，丘陵逶迤，临（沂）枣（庄）公路穿行其间。1938年8月，临沂、郯城各据点的日军调动频繁，临枣公路上的运兵车辆不断。直辖第四团联合张里元部，决定于9月上旬在胭脂山伏击日军。部署是：张部卢焕彩团和何志斌团的一个营埋伏在公路北面与东面，直辖第四团的两个营与临郯费峰边联县直辖第一营第一连埋伏在路南面。并约定战斗先由卢团打响，尔后全线出击。上午9时许，日军约五六百人分乘六七十辆汽车，由西南朝东北方向的临沂城疾驰，卢团见敌势众，未放一枪即悄然撤退。直辖第四团、直辖第一营第一连和何团皆不知此情，仍坚守以待。当日军汽车快要过完时，直辖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共产党员宋荣文恐贻误战机，遂发起攻击。直辖第四团和何团一个营亦全部投入战斗。经两小时激战，毙敌六七十人。连长宋荣文等60余人壮烈牺牲，全连仅剩五六人生还。何团阵亡四五十人。战斗结束后，直辖第四团全体官兵在北寺村为宋荣文等烈士召开追悼大会。会上，群众情绪激昂，踊跃报名参军，很快重新建立起第一营第一连。

1938年10月，日军300余人在刘克锡、崔六两股伪军的配合下，侵占了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办事处的行政中心车辋村，

并安设了据点，对当地军民的抗日活动造成很大限制，拔除车辋日军据点，就成为当务之急。车辋据点深沟高垒，工事坚固。由于抗日武装的攻坚能力差，如强攻难免付出沉重代价。于是直辖第四团就采取了长期围困、迫敌撤退的战术。

12月中旬，直辖第四团控制了车辋西北的米山子及北面的各丘陵高地，实行迂回包围战术，钳制敌人，使其不能向四周伸展。日伪军曾六次向米山子第四团阵地发起进攻，均被击退。1939年1月，临沂日伪军兵分两路扑向米山子阵地和大炉。直辖第四团和边联县两个直辖营分兵设伏，击退了来犯之敌，并截获敌人在当地抢劫的大量物资。29日，临沂之日伪军再次出动步、骑、炮兵200余人前来援助，途中被联庄会武装击退，粉碎了敌人的增援计划。盘踞车辋据点的日伪军，久待援军不至，于当日下午开始突围。直辖第四团选择有利地形于途中伏击，歼敌一部，其余逃窜。2月初，日伪军再次“扫荡”抱犊崮山区并占领车辋，向大炉进犯，直辖第四团和边联武装合兵抵御。万春圃亲自指挥，其次子、直辖第二营连指导员万国英率队冲锋陷阵，不幸中弹牺牲。万春圃强忍悲痛，高声激励战士奋勇杀敌。战士们同仇敌忾，一鼓作气将敌击溃，再次夺回车辋。

初步打开抱犊崮抗日根据地局面之后，为了扩大抗日武装的影响，第二旅第十九团（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决定袭击驻峰县城的日军。日军侵占枣庄、峰县后，为掠夺煤炭资源，对峰县城一直派兵重点守卫。峰县城经常驻有日军 150 余人，伪军、伪警察 200 余人。日伪军武器装备优良，并配备小钢炮和骑兵队。但日、伪军之间，伪军、伪警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彼此动作并不协调。义勇总队此前已派孙继德打入峰县伪警察局任巡官，预作内应。孙继德利用各种关系，经过一年多的秘密工作，争取了近 20 名伪军，待机起义。第二旅第十九团团团长张光中根据这一情况，决定派刘景镇率第三营以长途奔袭的方法奇袭峰县城，打击敌人，并接应起义人员。

1939 年 7 月 24 日下午，刘景镇派牛继文、许美庭等 10 余名战士，在孙继德的掩护下化装混进城里，以作内应。当日黄昏，营长刘景镇、教导员张鸿仪率领第三营于天黑后埋伏在峰县城西门外，等待城内的接应信号。翌日凌晨，孙继德带孙景新以查岗哨的巡官身份到达西门，乘敌不备，将日军打死，打开城门，接应刘景镇部队入城。战斗打响后，住在县城内的日军宫板司令、未吉顾问及宪兵队的三宝队长等，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龟缩在屋内盲目地乱打枪，南门很快被

占领。教导员张鸿仪带领一排队员捕捉日伪逃兵，战斗至拂晓，打死日本兵 10 余名，毙俘伪军 100 余人，缴获步枪 50 余支，并争取伪军一个中队反正。第三营除担任掩护的机枪射手万兴法牺牲外，其余全部安全返回。夜袭峰县城的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信心，提高了人民抗日武装在枣庄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第七节 峰滕铜邳地区的抗日斗争

枣庄南部的峰滕铜邳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东北不远是台儿庄重镇，西边是煤城贾汪。在枣庄地区境内的运河东西长约 40 公里，八个闸口形成了八个集镇，其中涧头集是峰县第六区的驻地。徐州会战后，国民党军队撤退，国民党地方政权纷纷瓦解，运河地区沦为敌后。这时鲁南一带政局混乱，打着抗日旗号的形形色色的武装，就其大股而言，有数十支之多。这些所谓的抗日武装，不外三种：一是被截留于敌后的国民党军队；二是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和豪绅武装；三是土匪强盗。纯朴而强悍的运河地区人民，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跟着他们打鬼子、保家卫国。

1938 年 9 月，纪华接任峰县县委书记。他走村串巷，从山里到山外，在南北于、石头楼、马兰屯、涧头集等地开展工

作。原国民党峰县第六区区长孙斌全，为人有正义感、思想进步。峰县被日军占领后，第六区龙庄的大地主龙传道想当伪区长，群众害怕区政权一旦落入其手，会受更大的压迫，力主让孙斌全当区长。本来不想当汉奸的孙斌全无奈出任了伪区长。他一面应付日军，一面又要同各种恶霸势力周旋。就在他进退两难之际，纪华利用朱道南与孙姓亲属的关系，于11月下旬与孙斌全进行直接交谈。孙斌全在纪华教育启发之下，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进行抗日。此后孙斌全所掌握的第六区公所武装，成为峰县县委所掌握的第一支抗日队伍。涧头集成为中共峰县县委领导抗日斗争的中心。

正当抗日斗争形势在峰县涧头集迅速发展的时候，来自贾汪的一股反动武装一红枪会成了峰县抗日武装最大的障碍。原来，在贾汪以东崮峒、阎村一带为了防御土匪滋扰，当地群众有组织红枪会武装自卫的习惯。1938年，日本特务王亚平混进贾汪的红枪会组织，在他的反动宣传鼓动下，贾汪红枪会视涧头集的峰县抗日力量为眼中钉，一直想占领涧头集，进而把整个运河南北地区都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6月，王亚平带领红枪会武装200余人，由万年闸北渡运河，到第五区的抗埠村活动。第五区孙茂墀部派兵反击，王亚平率部窜到第六区。孙

斌全获悉后，率特务营在刘庄阻击。王亚平部向刘庄进攻，与特务营发生战斗。下午天降大雨，红枪会撤退。在战斗中孙斌全负伤，张喻鼎在阵地转移中不幸被俘，被红枪会残酷折磨而死。不久，王亚平又纠集红枪会约 2000 人进攻涧头集。峰县县委获得情报后，调集运河北的孙云亭、孙茂墀等部队约 1000 人前来增援。经过激战，红枪会败退。战后，峰县县委采取了以下措施：用抗日区长名义发布取缔红枪会布告；印发告人民群众书，揭露反动红枪会首领王亚平投降日军、甘当汉奸的罪行；在涧头集召开上层人士座谈会，动员各界人士，协助抗日政府取缔红枪会。三管齐下，使峰、滕边境运河地区的红枪会迅速瓦解。王亚平仅带着 20 多名骨干分子，龟缩到贾汪日军据点，再也不敢出来滋事。7 月，素有黄邱山套套主之称的实力派人物谢绍唐带着 30 多人的队伍，参加峰县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从而使这一地区很快成为峰县县委领导的峰滕铜邳地区军民坚持抗日斗争的核心地带。

1939 年初，活动在运河地区的胡大勋和其胞弟共产党员胡大毅，带领 200 多人的武装参加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被编为机炮连，胡大勋任支队参议。胡大勋原籍是铜山县柳泉车站东北侧的西堡村。早年学农业，尔后参加北洋军阀部队，曾任

过校衔参议。七七事变前数年失意闲居在家。他为人正直仗义，反对铜山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欺压群众，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声望。胡大勋根据苏皖特委的指示，与陈诚一、胡大毅、高守云、孙式金等 12 人带着 200 个八路军的臂章，回到贾汪镇东北侧的唐庄，宣布成立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驻峰滕铜邳四县边联办事处，进行组建部队的活动。当时贾汪、唐庄均属滕县第九区。贾汪、柳泉虽已进驻日军，但对周围的统治甚为薄弱，乡村政权在混乱的局势下采取对各方应付的态度。贾汪维持会会长李公俊采取表面应付日军、暗中支持八路军的做法，为抗日武装的组建提供了便利条件。不久，贾汪西林子村共产党员王洪洲，在其叔王玉鸣的支持下，带领 20 余人的武装参加办事处。此外，柳泉西的周山头村中共支部书记周云锦，以及贾汪东小李庄村陈启和等爱国人士，亦筹集部分枪支，组织部分人员参加办事处。办事处将各路队伍合编，成立了警卫连。王洪洲任连长，孙式金、王洪酬任排长。之后又组建了运河大队（后编入运河支队），胡大毅任大队长，陈诚一任政治委员。

1939 年 5 月，运河大队警卫连夜袭柳泉伪区公所。柳泉是徐州以北津浦线上的第二个车站所在地。伪区公所设在这个小镇上，离车站只有一里多远。伪区长马敬典是铜山县徐州北

乡口上村的大地主，1938年徐州沦陷后投降日军。偷袭伪区公所获得了成功，活捉马敬典父子，伪区队40余人全部被俘，缴获枪支40多支。运河大队首战告捷，扩大了声威。

柳泉战斗后不久，徐州贺村的佟震五，经过胡大毅做工作，率领140余人的抗日队伍“溜河大队”，自愿参加八路军。峰滕铜邳四县边联办事处将其命名为铜山县独立营，佟震五任营长，佟昌勤任副营长。这支队伍一部随胡大毅在贾汪一带山区活动，一部由副营长佟昌勤带领，在徐州近郊贺村一带活动。8月，运河大队夜袭茅村伪乡公所，活捉了伪乡长周光前和日军翻译金波。

陈诚一在部队建立起来以后，主要搞地方民运工作。他利用柳泉、贾汪一带的社会关系，组织抗日团体，在数月内打开了贾柳铁路两侧的抗日局面。南从茅村以东，北至柳泉以东江庄、高村等，西至微山湖畔的周山头、饶山子、铁庄等村，都建立了农救会和青年团。同时在西堡、前柿庄、周山头、大王家、后许家等地发展党员50余人，建立了4个地下党支部。

为适应活动地区狭窄、敌伪顽我并存的复杂局面，办事处找一些有民族气节、群众威信较高的民主人士来当伪乡长，应付敌人，支持抗日。如周山头的周云锦、后湾村的张殿桂、林

子村的王玉鸣、胡埠村的胡兴孝、小王家的王贤林等。这些乡政权，在搜集日伪情报、掩护八路军等方面，都起到了特殊作用。

经过五个多月的战斗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办事处发展了300多人的抗日武装，开创了运河地区抗日斗争新局面。

第九章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抱犊崮山区

和枣庄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抱犊崮山区以后，指导成立中共鲁南区党委，指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统一整编地方抗日武装，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

第一节 第一一五师挺进抱犊崮山区

抗战初期，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时，尚没有到达山东地区。1938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要求派一个主力团到山东，毛泽东说：“看来还要多

一些。”同年六七月间，八路军永兴支队和津浦支队进入山东北部的冀鲁边区，这是第一批进驻山东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1月25日，毛泽东等致电彭德怀，指出：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陈旅主力（两个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继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于12月到达湖西地区后，1939年3月1日，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在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下，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到达鲁西南。当时正值彭德怀要去冀南与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局事鹿钟麟谈判，一一五师便以组织东进支队护送彭德怀的名义，翻越太行山，过平汉铁路，然后直插山东的鲁西地区。此后，一一五师连续取得樊坝歼灭战、陆房突围战、梁山伏击战等重大战斗的胜利，迅速打开了津浦路以西、黄河以南的运（河）西和泰（安）西抗战局面。

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虽然也声言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他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要怕它。”其后，制定了一系列反共政策。1939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军政会议，

作出“防区划分”的决定，把山东纵队的防区划在泰山、徂徕山以南，津浦路以东，滕县以北，石莱（新泰县西南角）以西的狭小山地，并规定：山东纵队“除胶东、鲁西各支队仍在现活动地区以外，其鲁南及胶济路北各支队应向指定地区集结，限5月15日以前到达”。企图以此限制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发展，借用日伪力量，将山东的抗日力量消灭或驱出山东。

为支援鲁南地区的抗日武装，创建、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第一一五师还在泰西地区时，就积极调整部署，准备向津浦路东的鲁南发展。4月26日，罗荣桓在泰西中固城村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第一一五师进军鲁南的任务。5月下旬，第一一五师司令部参谋处长王秉璋、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领司政机关、直属队及冀鲁边第七团，首先进入鲁南的费县西北地区。8月1日，新成立的八路军第一纵队致电第一一五师，要求将第六八六团调往鲁南。于是，第六八六团立即由鲁西出发，过南阳湖，首先进入邹（县）滕（县）边界，于9月初进入抱犊崮山区。8月上旬，由王秉璋、黄励率领的师部机关、直属队由费县南下，于9月1日到达抱犊崮山区大炉。从此，津浦路以东也有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这对山东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沈鸿烈排挤山东

纵队的计划也因此而落空。9月4日，八路军总部致电第一一五师，指出：肥城山区甚小，我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萧华活动之冀鲁边地区粮食困难，敌人封锁严密，应以一部转入鲁西。10月26日，罗荣桓等到大炉，与准备赴延安学习的郭洪涛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会合，随即率一支警卫部队星夜奔赴湖西，处理湖西“肃托”事件。11月下旬，罗荣桓将原苏鲁豫支队第四、第五大队加以整编，令梁兴初率领东渡微山湖，开赴鲁南。12月，罗荣桓从湖西返回大炉，陈光也由鲁西来到大炉。

当第一一五师进入抱犊崮山区前，除了大炉、车辋一带为人民抗日武装第二旅第十九团掌握，徐庄、大安、高桥、辛庄、马庄、黑峪等为万毅（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第三三四旅第六六七团团团长，共产党员）团驻防外，其他大部村寨都控制在地主武装手中。第一一五师到来后，除少数开明士绅欢迎八路军外，其余地主武装对八路军心存疑虑，采取敌视态度，大都关闭寨门，不让八路军进村与老百姓来往。

针对这一局势，罗荣桓主持召开了主要干部会议，听取山东负责人的汇报，帮助总结鲁南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联合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他提出，在坚持统一战线、加

强党的领导、联合友军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党的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要以抱犊崮为中心，向北与山东纵队打通联系；向南控制郯（城）马（头）平原，打通与华中区新四军的联系；向西与湖西区连接在一起；并东进向滨海地区发展。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他号召第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在当地党组织、武装的配合下，运用正确的对敌斗争方针，团结争取友军和爱国民主人士，孤立、打击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使鲁南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

第二节 成立中共鲁南区党委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939年7月底，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把山东地区统一划为三个地区。胶济路南、津浦路东的鲁中、鲁南地区为第一区（统称鲁南区），津浦路西的鲁西区为第二区，胶东为第三区。湖西、清河为特区。三个地区均设区党委。第一区党委（即大鲁南区党委）于10月在沂水县召开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区党委领导机构，林浩任书记兼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为史秀云（女），副部长为魏思文，宣传部副部长为林乎加，民运部长为李林，社会部长为朱玉干，政府工作部长为霍士廉。

第一区党委建立后，于7月至9月间将划归其领导的泰山、淄博、尼山、鲁南、鲁东南五个特委分别改建为第一、二、三、四、五地委，其中，将尼山特委改建为第三地委，宋子成任书记兼社会部长，乔海秋任秘书长，冯起任组织部长，燕遇明任宣传部长，杨士敬任青委书记兼民运部长，于化琪任统战部长兼政府工作部长，于康任职工部长，何毅（孙广茹）任妇女部长，宋宜安任农救会长。第三地委下辖峰县县委、滕东县委、边联县委、费县县委、曲泗宁县委、邹县县委。临邳县委划归第四地委领导。临费县委撤销。第三地委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仅仅存在八九个月的时间，但这段时间，是鲁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第三地委适应了这种局势的转变，在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党委的领导下，动员群众，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第三地委书记宋子成向罗荣桓汇报工作情况时，罗荣桓肯定了地委的工作成绩，并希望地委积极配合主力部队，搞好抗日根据地建设，把鲁南变成钳制和打击敌人的战略阵地。第三地委虽然受区党委和第一一五师双重领导，但由于地委机关和第一一五师党委长期在一起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讲第三地委已成为第一一五师党委的一个部门和机关，许多工作都是在师党

委和陈光、罗荣桓等首长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此第三地委的工作与第一一五师的工作是很难分开的。第三地委领导各县委贯彻执行了上级党委的各项工作指示，保证了部队补充兵员和军需供应，帮助军队排忧解难，促进了部队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1940年4月，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撤销第一区党委，在原辖区内分别成立鲁南、鲁中区党委。原第一区党委所辖的第一地委（泰山地委）、第二地委（沂鲁地委）、第五地委（鲁东南地委）划归鲁中区党委；原第一区党委所辖的第三地委（尼山地委）、第四地委（鲁南地委）划归鲁南区党委。

6月上旬，鲁南区党委在鲁南天宝山区的油篓村召开会议，宣布了区党委领导名单，赵搏任书记，魏思文任组织部长，林乎加任宣传部长，杨涤生任民运部长，于化琪任政府工作部长，宋子成任社会部副部长，孙学之任职工会长，宋宜安任农救会长，杜前任青救会长，李岩任妇救会长，南竹泉任秘书处主任。从此枣庄地区的党组织在鲁南区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油篓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的方针》《关于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和《第一一五师创建抱犊崮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并在分析鲁南

形势、找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四项决议：（一）撤销原第一区党委第三、第四地委，建立鲁南区党委第一、第三地委；（二）筹备召开鲁南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鲁南参议会和鲁南专员公署；（三）发展主力部队，扩大地方武装，尽快组建鲁南军区；（四）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抗日群众团体等。依照决议，第一地委在原第三地委基础上组成，许言任书记，周蓝田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杨士敬任民运部长兼群委书记，于康任工委书记，冯起兼任妇委书记。第一地委辖泗水县委、邹县县委、泰宁工委、曲阜工委等党组织。第三地委在原第一区党委第四地委的基础上组成，由李乐平、杨涤生先后任书记，杨士法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周南任宣传部长，王永福任民运部长，牛一萍任工委书记，赵民三任农委书记，蓝铭述任青委书记，孙宇维任妇委书记。第三地委辖临沂县委、邳县县委、苍马工委、郯马工委、东海工委等党组织。另外鲁南区党委还直辖滕东县委、峄县县委、临邳费峰边联县委、费南县委。据当时的统计，全鲁南区（小鲁南）已有党员 7300 名。

在鲁南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针，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

创办了鲁南区党委机关报《鲁南时报》，出版了区党委主办的党刊《先进》，罗荣桓、赵搏亲自撰写了重要文章。罗荣桓在文章中分析了鲁南民间枪支很多、地主武装较强的特点，指出，必须大力发展农民武装，要把枪支从地主手里转移到农民手中。还将第一区党委党校改称鲁南区党委党校，赵搏兼任校长，穆林任主任。

鲁南区党委成立不久，即在油篓村召开了地、县委组织部长会议，区党委书记赵搏传达了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山东分局关于巩固党的指示，确定了党校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党组织、教育审查干部和党员。教材由党校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理论著作编写。审查的重点是：党员和干部成分不好的，失掉关系的，来历不清的，意识模糊的，行动越轨的，入党手续不完备的，参加过其他党派表现不好的，敌人“扫荡”时妥协投降的等。通过整顿和教育，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鲁南区党委在整顿党组织的同时，还对各地县委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调整，使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组织进一步健全。

9月中旬，根据中共山东分局桃峪扩大会议的决定，建立

鲁南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赵搏任副书记。鲁南军政委员会是统一领导鲁南地区抗日斗争的最高领导机构。

这一时期，滕县的党组织属第一地委领导，峰县、台儿庄地区的党组织属第三地委领导，峰南县的党组织一度划归华中淮北区邳睢铜地委领导，在津浦铁路以西的枣庄地区党组织属鲁南第二地委领导。

第三节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9年6月21日，中央军委指示：在敌人“扫荡”后，鲁南局面混乱，我应趁此机会将第一一五师师部、第六八六团及萧华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下放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第一一五师进入鲁南之前，只有日伪和国民党的政权。共产党和八路军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供给只能靠募捐和自筹来解决。第一一五师到达后，纠正了忽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问题。罗荣桓就如何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问题多次指示第三地委书记宋子成，抗日民主政权事关重大，是关系到能否在鲁南山区立住脚跟，能否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大问题。地委要不失时机地抓紧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第三地委根据罗荣桓的指示，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建立抗日政权的问题。为了促进鲁南地区政权建

设的发展，第一一五师及第三地委抽出 100 多名干部，组成了若干个工作队，分赴各县进行发动工作。第三地委相继成立了峰县、临郯费峰四县边联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第一一五师政治部民运部长潘振武率领工作队，与峰县县委书记纪华等人一起筹建了峰县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朱道南任主任。动委会的成立，对枣庄地区抗日政权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经过动委会的努力，1939 年 11 月 20 日，鲁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峰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王家湾正式成立。在 170 多人参加的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高级参议彭畏三及第三地委书记宋子成先后讲了话。第一一五师民运部长潘振武当选为峰县县长，民主人士孙倚亭当选为参议长，选出朱道南、邱焕文、王子刚、王鼎新等 35 名县政府委员。动委会主任朱道南兼任民政科长、张捷三任财政科长、刘仲旭任教育科长、刘少彭任实业科长、房洪义任武装科长。之后，峰县六个区政权也相继建立起来。随着形势的好转，峰县抗日民主政府还发行了峰县流通券。流通券不但在解放区能用，连敌占区枣庄的商人也乐意使用。流通券的发行，对于克服困难，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峰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罗荣桓亲自总结了峰县建政经

验，并推广到鲁南各县。从 1939 年底至 1940 年春，鲁南先后建立了邹县、郯城、苍马、费县、邳县、临沂、费北、费南、泰宁、东海、滕东 11 个县级政权，38 个区、171 个乡（改造的 108 个）、2100 个村庄（改造的 1108 个）的政权机构。这一时期是鲁南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黄金时期。

在鲁南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纷纷建立之际，党组织又领导人民适时组建了鲁南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统一领导机构。1940 年 6 月，在费滕峰边区的九子峪（现属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召开鲁南人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400 余人。罗荣桓、赵搏出席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作《关于抗日民主政府的性质和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充分酝酿和民主协商，按照三三制（即在抗日民主政府中，共产党员、进步力量、中间力量各占三分之一）原则，选举产生了鲁南参议会和鲁南专员公署。鲁南著名爱国人士彭畏三当选为参议长，于化琪当选为专员。鲁南专员公署还建立健全了工作机构。华山任秘书长，梁度世任一科科长，邝任农任二科科长，马华任三科科长，万春圃任四科科长，王天翼任五科科长。鲁南专员公署下设两个行署：第一行署和第二行署。

第四节 统一整编地方抗日武装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初到鲁南抱犊崮山区时，山东纵队下辖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编号为张里元的保安第二旅第十九团）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只有大炉、车辋等十几个山区村庄，活动地区比较狭小，且经常受到日伪顽匪的封锁和阻挠，群众尚未彻底发动起来，使第一一五师感到没有依托。因此，整编地方武装，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进一步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当务之急。第一一五师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以及鲁南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将创建并活动于鲁南各地的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和部分爱国人士创建的抗日武装，相继整编为苏鲁支队、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队、运河支队、峰县支队、鲁南支队、临郯费峰四县边联支队和鲁南铁道大队等。这些地方人民抗日武装编入八路军序列之后，在第一一五师的统一指挥下，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同日伪顽斗争，为巩固和扩大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组建苏鲁支队

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是鲁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骨干武装，但从1938年9月起一直使用国民党张里元部的番号，在当时情况下虽有利于对张部的统战工作，但同时又受到束缚和限制，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尤其是1939年春，

以沈鸿烈、秦启荣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在山东掀起反共高潮之后，张里元在国民党特务的要挟下逐步与共产党疏远，趋向反共。9月，第一一五师抵达鲁南抱犊崮山区大炉与义勇队第一总队会师后，经与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协商，决定取消张里元部第二旅第十九团的番号，于10月1日在呦鹿山镇将第一总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仍属于八路军山东纵队建制，但由第一一五师指挥。第一一五师抽调彭嘉庆、胡云生、吴世安等红军干部和两个红军连队充实加强苏鲁支队的领导和基干力量。改编后，由张光中任支队长，李乐平、彭嘉庆先后任政治委员，胡云生任参谋长，李荆山任政治部主任。苏鲁支队下辖第一、二、三营和特务营。

部队改编后，苏鲁支队配合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在郯城、马头、邳县一带活动。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抵达郯马地区之后，苏鲁支队又配合东进支队活动，先后击退国民党顽固派郯城县县长阎丽天和国民党邳县县长王化云的进攻，解放了马头镇、重坊镇等重要城镇，开辟了郯马地区，打通了鲁南与苏北的联系。苏鲁支队利用战斗的间隙，在第一一五师的帮助指导下，积极进行军政训练，部队的军政素质不断提高，战斗力大为增强。尤其是1939年12月召开苏鲁支队党的代表大会之

后，进一步树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量发展了新党员，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使苏鲁支队战斗力不断提高。

1940年4月，苏鲁支队正式划归第一一五师建制，仍由张光中、彭嘉庆分别任支队长、政治委员。

苏鲁支队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较著名的有下列各项：

（一）配合主力，保卫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底，峯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抱犊崮山区成立后，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苏鲁支队第三营在支队长张光中的率领下，到滕峰边山区开展工作。滕县的日伪军乘支队立足未稳发起进攻。苏鲁支队与敌激战一天，日伪军溃逃。不久，枣庄、峯县的日伪军又纠集更多的兵力，对苏鲁支队实施迂回包围。苏鲁支队一面还击，一面巧妙地跳出包围圈，并取得毙伤日伪军30余人的胜利。

1940年2月，苏鲁支队奉命配合第一一五师主力，参加白彦战斗。白彦地处抱犊崮和天宝山之间，是鲁南山区战略要冲。这里是鲁南大地主、汉奸孙鹤龄的老巢和日军在鲁南山区的据点，经常驻有孙鹤龄部千余人和部分日军。2月14日，苏鲁支队在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统一

指挥下，向反共堡垒白彦发起攻击。支队长张光中、政治委员彭嘉庆率苏鲁支队，攻打白彦东北部的魏庄、苗庄日伪据点。他们兵分两路，同时展开攻击。突击队相继攻破敌人的防线，大部队随即冲入村内，两据点先后被攻克。此次战斗计歼敌百余名，缴获汉阳造步枪 100 多支。接着，苏鲁支队又配合第一一五师主力，对白彦及其周围的其他伪据点发起进攻，各部密切合作，经两昼夜的激战，白彦及各据点均被攻克，毙伤孙鹤龄及以下官兵数百人。

自 1940 年 3 月 7 日起，滕县、城前、峰县、费县、梁邱和平邑等处日伪军出动 4300 多人，向白彦发起三次攻击。苏鲁支队等部英勇反击，经过 14 昼夜的连续作战，终将日伪军击退，缴获长短枪 350 余支，弹药一大宗。白彦争夺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占据白彦镇的企图，切断了日军占据的费滕公路，解放了费南广大地区，为鲁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

4 月 14 日，日军纠集了邹县、滕县、峰县、枣庄、临沂县和费县等处日伪军 8000 余人，对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苏鲁支队在支队长张光中、政治委员彭嘉庆的率领下，与兄弟部队一起，经过 20 余天的反“扫荡”，粉碎了

敌人的“扫荡”阴谋，保卫了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苏鲁支队在开辟和保卫抱犊崮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冲锋陷阵，威震敌胆，战绩突出，支队长张光中和政治委员彭嘉庆等人受到第一一五师首长的表扬。

（二）开辟邹滕东地区。邹滕东地区为津浦铁路以东邹县、滕县、曲阜三县的边联地区。这里既是鲁南和湖西地区的结合部，又是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西北部屏障。为开辟这一地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曾派苏鲁豫支队第三、四大队到这一地区活动。他们在步云亭、冯起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对日伪顽反动武装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很快打开了局面。1939年底，在这一地区相继建立了邹东县委、县政府。1940年6月，刚刚开创的邹滕东抗日根据地处于日、伪、顽、匪的四面包围之中，除重要城镇被日军占领外，顽军李延寿、张显荣部占据泗南，申宪武部占据滕西，刘昭汉部盘踞邹东香城。他们结成反动同盟，封锁给养，袭击抗日武装，并将邹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大队等围困在十八盘山上。

为了打开这一地区的局面，彭嘉庆奉命率苏鲁支队第二营500余人赴邹东反击顽军的进攻。他们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直扑申宪武的老巢田黄。申宪武部仓猝应战，大败而逃。

邹县抗日民主政府之围随之而解。

苏鲁支队击溃了申宪武等顽军之后，乘机拔除了一些顽军据点，解放和控制了周围几十公里的地方，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9月底，400多名日伪军“扫荡”苏鲁支队驻地田黄，彭嘉庆因病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苏鲁支队在邹县县大队的配合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泉沟村、罗头一带伏击日伪军“扫荡”队伍，激战一日，歼敌1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随后苏鲁支队又向平原和津浦铁路两侧扩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邹滕东抗日根据地。

（三）两下峰南，配合运河支队、峰县支队反击顽军进攻。1940年4月，鲁南日军集中其第三十二师团、第二十一师团、独立第六和第十混成旅团各一部，共计8000余人，于14日开始从邹县、滕县、枣庄、峰县、临沂县、费县等地出动，对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为时一个多月的大“扫荡”，使根据地的抗日武装遭受重大损失。5月，第一一五师首长命张光中支队长率领苏鲁支队第三营护送峰县县政府出山，支援峰南地区的反“扫荡”斗争。途中，第三营营长刘景镇率两个连首先拔除了葛针园伪据点，歼灭伪军30余人，缴获枪支20余支。然后继续向南跨过临枣铁路，抵达峰南棠阴、周营一带，支持峰县县

政府组建抗日武装。此后苏鲁支队与运河支队、峰县支队、鲁南铁道大队等抗日武装并肩战斗，攻克 10 余处日伪军据点，解放了数十个村庄，帮助建立健全了峰县党政军群组织。此外，张光中支队长还派人打入敌占区的枣庄、滕县、韩庄，在铁路沿线建立了“丁”字型情报网，有力配合了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峰南的抗日局面打开之后，张光中率苏鲁支队返回山区根据地。

1940 年 7 月，张光中率领苏鲁支队第三营再次南下峰南地区，配合运河支队、峰县支队反击顽军的进攻。苏鲁支队首先配合峰县支队攻克穆庄反动土顽据点，接着又进入黄邱套山区，配合运河支队反击顽军韩治隆部和梁继璐部的进攻，将他们赶出涧头集、贺窑一带，并活捉国民党峰县抗敌自卫总团团团长龙希贞（外号龙瓜屋子）。9 月，苏鲁支队决定讨伐孙茂墀部。孙曾任国民党峰县第五区区长，有武装 400 余人，在峰滕铜邳抗日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于 6 月表示愿意改编为峰县支队第二大队（孙任大队长）。但孙一直不听峰县支队指挥，并拒绝接收八路军派去的干部。在峰县支队打下穆庄、枪毙了其姑父王平吉之后，他就更加仇恨共产党，处处与抗日武装为敌。为扫除这一障碍，张光中支队长统一指挥苏鲁支队（第三营）、

峰县支队、运河支队（第一大队），发起讨伐孙茂墀的战斗。孙部分驻古邵西北颜庄、邱庄、洛庄一带。经激战，运河支队一举攻克颜庄、古邵，俘获守军 60 余人，第二中队副中队长刘金标在战斗中牺牲。苏鲁支队和峰县支队负责攻击孙茂墀指挥部邱庄。战斗至下午，将孙部主力压缩在两个院落里。孙茂墀为避免被歼，表示承认错误，接受指挥，苏鲁支队和峰县支队随之撤围（旋即孙又叛变）。

9 月下旬，三营营长刘景镇、教导员张鸿仪率苏鲁支队第三营第十一连转战至枣庄西南的小屯，突遭齐村日伪军 100 余人的进攻，刘景镇迅即占领南山指挥战斗。激战数小时，击退敌人进攻。刘景镇在指挥战斗时，不幸腰部连中三弹，他强忍疼痛继续指挥战斗。战斗结束后，群众用门板将刘景镇抬回小屯救治。因部队马上要转移到峰南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刘景镇便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后因治疗不及时，伤口恶化，刘景镇在上级领导再三劝说下，才不得不离开战友，回家乡养伤。后因叛徒告密，刘景镇被日伪军包围在一草垛中。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刘景镇镇定自若地用手枪与敌战斗，连续毙敌 10 余名，最后饮弹牺牲。

1940 年 10 月，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决定建

立鲁南军区，邝任农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年底，苏鲁支队队长张光中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接替邝任农任鲁南军区司令员，鲁南区党委书记赵搏兼任军区政治委员。苏鲁支队编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第五团，彭嘉庆任政治委员，胡云生任团长，王根培任副团长。

二、组建鲁南铁道大队

鲁南铁道大队是活跃在临（城）枣（庄）铁路支线和津浦铁路滕县至韩庄段的一支抗日游击武装。他们打洋行、炸火车、毁桥梁、搞机枪、劫布车、打票车，搞得敌人魂飞胆丧，被人们誉为铁道线上的“飞虎队”。1938年10月，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为掌握枣庄日军情报，派洪振海、王志胜潜回枣庄建立情报站。1939年8月，他们夜袭日特机关正泰国际公司（群众俗称“洋行”），打死日特2名，打伤1名。10月，王志胜利用做铁路搬运工之便，侦知停在枣庄火车站的日军军车上装有武器弹药，便通过关系推迟到晚上发车。洪振海爬上飞奔的火车，截获机枪2挺、12支马大盖步枪和2箱子弹，及时送到山里。11月，洪振海、王志胜等人在枣庄情报站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支10余人的武装，自称枣庄铁道队。

1940年2月，苏鲁支队派第二营副教导员杜季伟到枣庄。

鲁南铁道队在枣庄火车站附近的小陈庄正式建立，苏鲁支队委任洪振海为队长，杜季伟为政治委员，王志胜、赵连有为副队长。4月，铁道队党支部建立，杜季伟任书记。5月，铁道队再次袭击正泰国际公司，打死日特10余人。后因泄密，日军突然包围陈庄炭场，铁道队事先转移，避免了损失。

由于日军频繁对鲁南山区进行“扫荡”“清剿”，山区抗日部队生活极端困难。铁道队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截击日军连云港到济南的票车（该列车上有一节日军运钞车厢）。事前，他们化装成工人、农民和小商人混进各节车厢。客车行进至枣庄西部王沟附近时，洪振海、李云生等飞身跃进车头，将司机捆住，由洪振海亲自驾驶。当列车行至伏击圈内，刹住了列车，鸣笛为号。各个车厢的队员听到信号，立即与日伪军开展了战斗。车上的12个日伪军全部被消灭，缴获伪钞8万多元、机枪1挺、手炮1门、长短枪12支和其他军用物资一批。战斗结束后，杜季伟将列车上的乘客集中起来，向他们讲明了铁道队袭击火车的目的，宣传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政策，然后，掩护乘客转移疏散。当日军的铁甲车抵达时，游击队员和乘客们早已转移。

鲁南铁道队的范围由临枣线延伸到津浦线后，经常与在那

里活动的另外两支铁道队配合行动，并建立了友谊。为了有利于这三支铁道队的领导和指挥，苏鲁支队报请鲁南区党委批准，将枣庄的鲁南铁道队与滕沛边县委领导的临南铁道队（亦称第二铁道队）和临北铁道队（亦称第三铁道队）合并成立鲁南铁道大队。洪振海任大队长，杜季伟任政治委员，王志胜任副大队长。大队下辖三个中队：枣庄铁道队为第一中队，徐广田任中队长；临南铁道队为第二中队，孙茂生任中队长；临北铁道队为第三中队，田广瑞（后叛变）任中队长。此外还将铁路两旁的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组建了破袭队，华绍宽任中队长。各中队以分散活动为主，大队部一般随第一中队活动。1940年10月，鲁南军区成立后，鲁南铁道大队改由鲁南军区直接领导。

由于铁道大队频繁地活动在铁路线上，给日伪军的交通运输以极大的打击，日军纠集了大量兵力，加强了对铁路线的防卫，在铁路沿线构筑了不少碉堡，使铁道大队的活动更加困难。1940年11月，鲁南军区调铁道大队进山休整。罗荣桓和鲁南军区首长亲自接见了他们，对前段战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在休整期间，对铁道大队的领导成员进行了充实调整，加强了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使铁道大队的

政治军事素质大大提高。

1941年2月，鲁南军区决定铁道大队再度出山。铁道大队这次出山，不仅仅是在铁路沿线打击敌人，而且也在铁路沿线开展了反伪化斗争。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铁道大队经常突然袭击炮楼，对伪军进行训话和形势教育，让他们改恶从善。对一些作恶多端、死心塌地的汉奸头子和叛徒、特务就坚决镇压。对被迫当了伪保长或伪职人员，表面上应付敌人，秘密帮助抗日的则给予鼓励，有的则发展成为铁道队的联络员。对于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采取记“红黑点”形式，做了好事点红点，做了坏事点黑点，定期警告提醒。通过这些活动，使不少伪保长和伪警察转变了立场，铁道大队很快又掌握了铁路线的主动权，打开了斗争局面。

1941年7月初，铁道大队短枪队长徐广田混进临城车站，在地下党员徐广友的配合下，将两辆机车头从不同方向对开，然后在一座七孔大铁桥上相撞，造成车毁桥塌，迫使日军在津浦路上十几天不能通车。

不久，鲁南铁道大队又成功地袭击了临城火车站。事前，洪振海、杜委伟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分成三个战斗小组。第一组由王志胜副大队长和刘金山、徐广田率领。他们化装成铁路

工人，乘夜混入车站，迅速接近目标，将特务头子高岗及其卫兵石川击毙，收缴了其携带的 2 支手枪及存放在那里的 2 挺机枪。第二组由曹德清、孟庆海等 6 名队员组成。他们事先化装成伪军潜伏在车站，待战斗打响后，堵住伪铁路警备队寝室大门，伪军们惊恐万状，纷纷缴械投降。第三组由李云生、梁传德率 10 余名队员组成，由洪振海和杜季伟统一指挥，在车站外负责打增援。战斗仅十多分钟，第一、二组即完成战斗任务，携带战利品撤出火车站，在第三组的接应下胜利返回驻地。这次奇袭临城火车站的战斗，击毙日军 2 人，伤 1 人，缴获长短枪 30 余支、机枪 2 挺和子弹 1 宗。

撤出临城车站时，曹德清等人故意将伪军的帽子丢下。第二天，日军发现了伪军帽子，便怀疑是伪军头子阎成田所为。于是，立即将阎成田等人拘捕，并解除了临城伪军的武装。

1941 年初冬，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天气已经很冷，战士们还衣着单薄。军区首长指示铁道大队要尽快搞些棉布，以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铁道大队接到指示后，立即进行研究，徐广田、孟庆海从沙沟火车站副站长张允骥处得知，一列开往上海的客车尾部带有两节装布匹的闷罐车厢，经做工作，张允骥答应将这两节车厢搞下来。摸清情况后，铁道大队和微湖大

队共同研究了战斗计划，明确了分工，并发动数百名群众参与抢运行动。一天深夜，当载有布匹的列车通过沙沟车站时速度放慢，洪振海、刘金山和徐广田等人敏捷地爬上火车，拔下连接插销，摘掉风管，两节装载布匹的车厢被甩在预定地点。洪振海打开车门，队员们立即将布匹卸下，掩护着群众将布匹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黎明时分，洪振海将剩余的布匹连同车厢一起放火烧了。列车进入徐州站后，日军发现丢了布车，便立即纠集兵力沿铁路线寻找。当赶到现场时，只见两节车厢已化为灰烬。日军沿着群众运布的足迹，追到微山湖边，盲目向湖里打了一阵枪便撤退了。

鲁南军区派王六生带一个连将布匹运往山里。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邝任农接见了洪振海、杜季伟，并代表鲁南党政军领导向英雄的铁道队表示感谢，称赞他们是“雪中送炭”，鼓励他们发扬英勇机智顽强的战斗精神，再接再厉。洪振海、杜季伟向军区首长汇报工作时，提出组建长枪队的请求，军区立即同意，迅速从各部队中抽调了作战经验丰富的战士，组成了一支数十人的长枪队，派军区政治部保卫干事赵宝凯任队长兼指导员，调第五团第三营排长赵永良任副队长。

鲁南铁道大队有了长枪队，如虎添翼，进一步巩固了在铁

道线上的主动权。按照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铁道大队相继在各中队配备了政治指导员，加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从而大大提高了大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鲁南铁道大队的发展壮大，使日伪军惊恐万状，多次进行“扫荡”“清剿”，都因找不到铁道队的踪影而扑空。于是，日军改变手法，用重金悬赏，捉拿洪振海等铁道队骨干，结果仍是枉费心机。临城日军利用叛徒黄二、田广瑞、殷华平等入四处侦探，将情报站站长秦明道杀害，将交通员郝贞、刘桂清、大老殷等人抓捕，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她们三人面对敌人的酷刑，视死如归。后经铁道队多方努力，将她们三人营救出狱。

叛徒是鲁南铁道大队最危险的敌人，大队领导决定，集中力量，尽快挖掉日军的耳目。经过详细侦察，先后查清了叛徒黄二、殷华平、田广瑞等人的活动规律，将其一一镇压。清除了叛徒，既扫除了铁道队活动的障碍，也稳定了民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

为侦查铁道大队的行动，1941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临城日军特务头子松尾带着三名汉奸，化装闯入六炉店，被放哨的女交通员郝贞识破。铁道大队随之与其展开战斗，洪振海大队长指挥队员将其包围，活捉两名汉奸，松尾和另一名汉奸漏网

逃走。松尾逃回临城后，纠集数百名日伪军向六炉店包抄过来。此时铁道大队已经转移，敌人恼羞成怒，将六炉店村的房子放火烧光，逼迫群众说出铁道大队的去向，许多村民为保守铁道队的活动秘密，被日军打得皮开肉绽。

铁道大队为了给六炉店群众报仇，在黄埠庄附近的河堤上与日军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政治委员杜季伟劝大队长洪振海不要恋战，赶快转移。可洪振海未听劝告，带头向敌群冲锋，连中数弹倒下。副大队长王志胜旋即冲上去将大队长救起，率队员撤出战斗，洪振海在撤离过程中牺牲。铁道大队将洪振海的遗体就地安葬于黄埠庄，后又迁至其家乡滕县羊庄镇北塘村。不久，洪振海被追认为中共党员。洪振海牺牲后，刘金山继任大队长，增补赵永泉为副大队长。杜季伟和王志胜仍分别任大队政治委员和副大队长，赵宝凯改任大队政治协理员。

1942年春，日伪军5000余人分别从韩庄、沙沟、临城和峄县、枣庄等地出动，围攻微山岛。鲁南铁道大队与其他抗日武装一起，在统一指挥下进行战斗，因众寡悬殊，鲁南铁道大队换上日军服装，突出重围。

鲁南铁道大队在微山岛突围后，奉命再次进山整训。在整训期间，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和政治部主任李荆山听取了他

们的全面汇报，表扬他们在对敌斗争中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迟滞了日军行动，为山区主力部队反“扫荡”、反“清剿”、反“蚕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同时鼓励他们要尽快返回津浦线上去，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扩大活动区，粉碎日军的伪化，开辟山东、华中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为护送过往干部做好准备。整训后，鲁南铁道大队全体指战员进一步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以饱满的抗日热情返回铁道线上。

微山岛失守后，该地区再次伪化，铁路两旁碉堡林立。日伪军在铁路两旁还挖了封锁沟，并向铁道大队经常落脚的村庄实施突袭，给鲁南铁道大队的活动带来极大困难。为粉碎敌人新的阴谋，1942年经鲁南区党委批准，建立了临沙工委，刘向一任书记，杜季伟、朱奇民为委员。鲁南铁道大队与临沙工委紧密配合，掩护地方工作，并根据工委的交待，消灭了滕八区区长殷华平等叛徒特务，有力地保护了地方党组织。与此同时，工委将临城两个党支部交给鲁南铁道大队领导。鲁南铁道大队还根据上级指示，采取“武装大请客”的方式，将这一地区的伪乡长、保长全部强行“请”到山里受训。将他们培训一段时间，使其思想转变，悔过自新，然后让他们继续担任乡长、

保长，明里应付日伪军，暗地里为抗日服务。这些人中比较典型的是姬茂喜，他给铁道队送了大量的可靠情报，为抗日斗争做出了一定贡献。

1942年4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由华中来山东检查工作。8月，刘少奇返回延安。鲁南铁道大队接到护送刘少奇过路的任务后，杜季伟、刘金山、王志胜、赵永泉等大队领导人作了明确分工。他们在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旅长曾国华所带领的警卫人员的配合下，圆满地完成了护送刘少奇等人的过路任务。1942年秋，鲁南军区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决定将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队、滕沛大队和文峰大队合编为鲁南独立支队。为了保持鲁南铁道大队这支“飞虎队”对日伪军的威慑力量，铁道大队被改编为鲁南独立支队第二大队后，对外仍称鲁南铁道大队，其中心任务是保护华中通往延安的交通线，护送华中和山东的领导人过津浦铁路。鲁南铁道大队自承担护送任务之后，先后护送刘少奇、萧华、朱瑞、陈光、陈毅等领导人数十次、千余人，跨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均安然无恙，多次受到军区和被护送首长的表扬。

1943年春，鲁南铁道大队已有150余人，编为3个短枪中队和3个长枪中队。鲁南军区先后调赵宝凯、黄岱甡、刘依

勤、张静波、张建中、张再新、颜耀华、郑林川、李德福等 10 多名干部到鲁南铁道大队任中队指导员。他们到任后，把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优良传统带到铁道大队里来，通过言传身教，使这支部队不断成长壮大，为保证各项战斗任务的顺利完成作出了贡献。

1944 年初，枣庄地区的抗日形势有了较大的好转，改变了过去被日伪顽军严重封锁、分割的局面，尤其是湖西反顽战斗胜利结束后，相继建立了第二地委、第二专署和第二军分区。为加强对日伪军的政治斗争攻势，鲁南军区派鲁南在华日军反战同盟盟员田村伸树和小山口到鲁南铁道大队工作。他二人原来都是侵华日军普通士兵，被俘虏后经党的教育改造，加入了反战同盟，成为反法西斯战士。政治委员张鸿仪、副政治委员郑惕、大队长刘金山，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情的欢迎，对他们的工作给予积极支持，使他们很快适应了铁道大队的战斗生活。他们用日语写标语、印传单，对日军据点喊话，瓦解日军，提高了铁道大队对敌人的威慑力量。他们在鲁南铁道大队一年多的时间里，与铁道队员建立了深厚友谊。

1944 年 8 月，鲁南铁道大队派代表参加了山东省军区在莒南县坪上镇召开的全省第一次战斗英雄、民兵英雄代表大

会，中队长徐广田被评为一等战斗英雄（亦称列车英雄）。他在作典型发言时介绍了鲁南铁道大队战斗成长的过程及其英雄事迹。徐广田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时隔不久，《大众日报》《鲁南时报》分别以长篇通讯、纪实文学的形式，介绍了鲁南铁道大队的英雄事迹，并很快传遍全省、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山东文化》丛刊副主编刘知侠在鲁南铁道大队英雄事迹的感召下，深入到铁道大队，采访了大队领导和队员，走访铁道队基点村的人民群众，并在铁道队长时间地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反映铁道大队事迹的文学作品，由此他被鲁南津浦铁路工委和鲁南铁道大队授予“荣誉队员”称号。

1945年1月，鲁南铁道大队政治委员张鸿仪等参加了山东军区召开的全省武工队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介绍了铁道队的抗日英雄事迹，受到与会人员的普遍赞扬。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在会上讲道：“武工队在敌后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在配合主力作战方面作出重要贡献，鲁南铁道队即是武工队的一个榜样。”会后，鲁南铁道大队受到军区政治部通令嘉奖。

1945年6月，鲁南铁道大队整训结束出山，途经滕峰边山区龙山头、大官庄宿营时，突然遭到驻滕县城、临城等处日

伪军 2000 余人的包围。这时，鲁南铁道大队不足百人，加上活动在这个地区的滕县第六区中队 70 余人，两支武装在数量上不到日伪军的十分之一。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张鸿仪为了掩护部队转移，率领一个班阻击敌人，不幸中弹身负重伤。队员们抬着他突出重围，送往军区医院，经抢救无效牺牲。张鸿仪牺牲后，副政治委员郑惕接任政治委员。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枣庄一带的日军 1000 余人最后向鲁南铁道大队投降，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唯一一次由游击队接受大批日军投降的事例。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鲁南铁道大队也完成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使命。1946 年 3 月，鲁南铁道大队奉命撤销，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鲁南铁路局。鲁南铁道大队所属的 3 个长枪队和一个短枪队大部分编入鲁南军区第十九团特务第二连，少部分编入鲁南铁路局警卫连。

国民党从 1946 年 7 月开始向鲁南解放区大举进攻，为迟滞国民党部队北上，鲁南军区于 8 月又调集原鲁南铁道大队部分骨干，重新组建了由 190 余名队员组成的鲁南铁道大队，由刘金山任大队长，蒋得功任政治委员。新铁道大队仍活动于津浦铁路鲁南段及峄县南部和枣庄周围地区，配合山东野战军破

袭铁路，打击国民党军，为枣庄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新贡献。同年 11 月，因斗争形势发生变化，鲁南铁道大队番号再次奉命撤销，部队改编为鲁南军区特务团第二营。

三、组建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队和鲁南支队

1938 年夏，国民党第十集团军石友三部队驻扎在山东。石与孔昭同取得联系后，双方协商，孔同意将活动于抱犊崮西北的滕县、邹县、泗水、费县一带的自卫军编入石部，为暂编第六师，董尧卿率领的鲁南抗敌自卫军编为暂编第六师第二旅。年底，石部调往河北，自卫军留在家乡坚持抗战。1939 年 3 月，孔部在滕北龙山下，同 100 余名日军遭遇，孔虽然已年近花甲，但仍脱下皮袍光着膀子指挥战斗，一举击溃日军。同年 7 月，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在王秉璋、黄励率领下，由费县西北抵达滕县董尧卿部的活动区，中共山东分局派联络参谋李贵斌到董部联系，董尧卿热情接待，并将李贵斌引荐给孔昭同，孔昭同非常高兴，随即安排第二旅秘书长王子真带一个连队及猪、羊等慰问品前去欢迎和慰问。9 月，第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到达大炉后，孔昭同又派秘书长刘元甫和董尧卿前去慰劳。董尧卿请求第一一五师首长派干部帮助该旅训练部队。

第一一五师决定派周乐亭去董尧卿旅任参谋长，并在董旅

建立党支部，周乐亭任书记。孔昭同闻讯后，也请山东教育界知名人士彭畏三前去联络。彭到大炉后，罗荣桓按照当地的习惯，摆了“十大碗”热情款待。席间，罗荣桓向彭畏三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当时，于学忠和张里元都在拉拢孔昭同。孔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很反感，对共产党坚决抗日很钦佩，但是，多少还有一点守旧思想。为了解除孔昭同的顾虑，罗荣桓请彭畏三转告孔昭同，八路军与孔师合作抗日，孔师可保持原来的番号，继续在原地区活动，双方要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彭畏三提出，孔昭同希望八路军派一位政工干部到孔师去作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当即将作陪的特务营教导员黄玉昆和曹正之介绍给他。黄玉昆系红军干部，在樊坝战斗中曾担任主攻连的指导员，机智勇敢，英勇善战，还特别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是一位优秀的军政干部，曹正之也是优秀的政工干部，彭畏三听了罗荣桓的介绍非常满意。

彭畏三在第一一五师驻地大炉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黄玉昆和曹正之一起到了孔师。孔昭同按照罗荣桓的安排，分别给黄玉昆和曹正之下了暂编第六师政治部主任和第二旅政治部主任的委任状。

1939年12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滕县活

动的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蠢蠢欲动，企图进攻孔昭同部。孔昭同第一旅旅长刘昭汉亦勾结申宪武，要挟孔昭同，扬言孔昭同若再接近八路军，便脱离孔师。面对顽军的威胁，孔昭同毫不动摇，与黄玉昆、曹正之、周乐亭和董尧卿一起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并让周乐亭立即去大炉向罗荣桓汇报。陈光和罗荣桓决定，先打击申宪武部和其驻在东江的两个团，杀一杀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待反顽战斗结束之后，征得孔昭同师长的同意，再将董尧卿旅同第六八六团合编。

孔昭同面对顽固势力的威胁利诱，回想抗战以来自己和国共两党的接触，他深切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尤其是经过黄玉昆积极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帮助整顿部队，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部队战斗力有很大提高，使孔昭同更加钦佩八路军治军有方，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

1939年12月，张仁初率第六八六团主力向盘踞在滕东的申宪武部发起攻击，暂编第六师第二旅旅长董尧卿率部配合作战，向东江两个顽军团部迂回包围，以奇袭的方式，活捉了两个顽军团团长，全歼东江顽军。盘踞滕东冯卯的申宪武部被第六八六团击溃，死伤100余人，申宪武率残部逃往津浦路西。

滕东反顽战斗结束后，董尧卿旅在周乐亭和曹正之的协助

下，按照第一一五师首长的指示，开往峰南周营一带休整。这时，董旅接到峰县数百名日伪军调防沙沟的情报，便在周营以西伏击，日伪军死伤甚多，残敌向沙沟方向逃窜。董尧卿在组织兵力追击逃敌时左肩受伤，参谋张广兰用毛巾给董旅长包扎了伤口，董旅长带伤继续指挥战斗。战斗结束后，董尧卿率部抵达大炉。陈光、罗荣桓等领导闻知董旅长负伤便立即探望，安排他住进野战医院，使董尧卿深受感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董尧卿伤口痊愈，又投入了新的战斗。在大炉，董旅遵照第一一五师的指示，与第六八六团合编为第一一五师鲁南支队，第六八六团团团长张仁初任支队长，董尧卿任副支队长，董旅为鲁南支队第四大队。

董旅编入鲁南支队之后，孔昭同也毅然决定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一天晚上，他选派了10名身强力壮的保镖，护送黄玉昆连夜向陈光和罗荣桓报告编入八路军的请求，陈光和罗荣桓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孔昭同的请求。

1940年2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报请八路军总部批准，孔昭同部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队，孔昭同任司令员。陈光、罗荣桓、孔昭同等参加了整编大会。第一一五师首长为孔部指战员颁发了八路军臂章和军装，

补充了武器弹药，并设宴款待了孔部的各级指挥员。

1940年秋，孔昭同病重，在弥留之际，他对儿子孔宪绍说：“共产党、八路军不歧视我们，不撤换我们，也不编散我们的部队。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你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1940年11月11日，孔昭同病逝，陈光、罗荣桓、萧华联名送了挽联，高度赞扬孔昭同热爱真理，为民族、国家英勇奋斗的高尚品德。

四、组建运河支队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运河支队，是由朱道南倡导创建的山外抗日军联合委员会中的孙伯龙部、邵剑秋部，以及党领导的运河大队和第十四区队等抗日武装合编而成的。

1939年6月，孙伯龙、邵剑秋先后到抱犊崮山区访问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表达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向往之情。当时鉴于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仍使用张里元部的番号，宋子成便派朱道南到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张里元那里说合，张里元分别给予孙伯龙、邵剑秋旅长和团长的委任。从此，孙、邵便分别舍弃了原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第五〇支队和特种工作总团第二分团第五大队的番号，7月间，孙、邵两部相互配合，在峰县曹家埠成功地伏击了日军小分队，

歼灭日军 22 人，开创了运河地区一次战斗全歼日军的先例。之后，孙、邵两部都相继发展到 400 余人。

早在 1938 年 10 月，峰县县委就建立了峰县抗敌自卫总团，总团辖直属大队、常备大队。11 月，峰县县委又以峰县第六区武装为基础，建立了峰县抗敌自卫总团特务营，活动在苏鲁边的黄邱山套一带。1939 年 10 月，该武装被整编为第一一五师第十四区队，全队 500 余人。

另一支抗日武装是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领导的、活动于贾汪一带的运河大队，胡大毅任大队长，陈诚一任政治委员。后来，胡大勋和其弟胡大毅又争取了徐州近郊东贺村的佟震武部 140 余人，整编为运河大队下辖的铜山独立营。经过胡大勋等五个多月的组织发动工作，到 1939 年底，运河大队发展到 300 余人。在胡大毅、陈诚一等人的带领下，运河大队同日伪顽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在峰滕铜邳边联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同年 10 月，运河大队划归第一一五师后方司令部领导。

以上四支武装，在朱道南、纪华、文立正、胡大毅等努力争取下，都以不同形式相继向第一一五师提出了合编为八路军地方武装的要求。1939 年底，第一一五师决定将活动于峰县

运河南北两岸的孙伯龙部、邵剑秋部、孙斌全部和胡大勋部合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运河支队。任命孙伯龙为支队长，朱道南为政治委员，邵剑秋为副支队长，胡大勋为参谋长，文立正为政治处主任。支队下辖两个大队。

1940年1月1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运河支队在峰县西南部的周营镇宣布成立，并召开了军民庆祝大会，张贴了布告。为加强运河支队领导力量，第一一五师首长相继派遣了红军干部王福堂、钟连祥、王广汉、杨荣、周振东和抗大毕业生郑林昌、傅秀亭等10人到运河支队工作。他们把老红军的革命传统和建军经验带到了运河支队，为运河支队的不断成长壮大发挥了作用。

运河支队成立后，运河南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一些反动地方武装亦迫于八路军威势，纷纷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的改编。如大恶霸地主龙传道之子龙希贞部300余人一度被编为运河支队第三大队，国民党峰县第五区区长孙茂墀部400余人一度同意编入峰县支队。

1940年2月初，运河支队第一大队奉命由运河北进到河南，配合第二大队，对日伪军进行袭扰活动，以牵制日军对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扫荡”。2月中旬，第一大队第三中队

（第一排和第三排）转移到涧头集一带的杜庄。16日，400余日伪军从贾汪出发，企图在小山子围歼运河支队第二大队未成，便于次日晨乘大雾扑向杜庄。在村外放哨的战士发现敌情时，日伪军已包围了村庄，部队无法突围，只有凭村落坚守。运河支队两个排40余人面对比自己多10倍的日伪军，毫不畏惧，英勇奋战，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日伪军见无法攻入村内，连续三次施放毒气，在毒气的掩护下发起攻击，运河支队指战员就用牲口棚前的臭水浸湿毛巾，捂住嘴继续战斗，一直坚持到太阳落山。这时第二大队闻讯赶来援助。日伪军见天色已晚，只得赶着10多辆抢来的牛车，载着伤兵和死尸，向贾汪龟缩而去。运河支队以牺牲7人的代价，取得了建队后的第一次战斗胜利，在运河地区声威大震。

1940年5月4日夜，运河支队第一大队在运河北岸的常埠桥设伏，击毙从韩庄出动“扫荡”的日军副联队长广田中佐以下100余人。侵华日军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从1940年开始开采徐州北的利国驿铁矿。为破坏日军开采铁矿，运河支队命令在这一带活动的第三、第五中队相机袭击该矿。5月中旬，在内线接应下，第三中队长丁瑞庭率第三、第五中队冲进矿部南大门，击毙6名日军、数名伪军，争取了20余

名伪矿警队员反正，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8 支、信号枪 1 支。6 月初，运河支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接受了攻克津浦路韩庄至沙沟间日军周庄据点的任务后，利用周围“爱护村”（日伪政权的“模范村”称号）群众给据点日军分队长西村送“万民伞”的机会，化装混进据点，里应外合，攻克据点，击毙日军分队长西村及手下 10 余人，缴获机枪 1 挺，步枪 10 支。7 月至 8 月，在苏鲁支队的配合下，运河支队进行了数次反击顽固派军队进攻的战斗。顽军梁继璐部、陈鉴海部在袭扰黄邱山套根据地被击溃后，投靠韩治隆，在韩的统一指挥下，兵分数路向运河支队进攻。运河支队与苏鲁支队并肩战斗，激战数日，分别将各路顽军击退，俘获韩部营长邢焕章及手下 40 余人，同时俘获的还有国民党峰县抗敌自卫总团团团长龙希贞及其警卫班。龙表示愿意献出 2 挺轻机枪、250 支步枪、4 匹战马，并自愿参加运河支队。龙希贞由此当上了运河支队的“副官”。对俘获韩治隆部人员的处理，支队领导认为，韩本人尚不属反共的顽固派，应团结争取他共同抗日。遂决定将所有俘获的俘虏和枪支，全部归还韩治隆。这一义举使韩治隆深受感动，在以后三年的时间内，与运河支队保持了较好的统战关系。此后，运河支队又先后进行了夜袭贾汪战斗和讨伐孙茂墀战斗。

1940年10月11日，徐州日军第二十一师团2000余人，分两路“扫荡”运河以南地区。一路由贾汪东行，经宗庄、上黄邱，于拂晓前到达库山南头，攻击运河支队第三中队；另一路经侯孟东进到郑庄、后楼，攻击运河支队第二大队。攻击库山的一路是主攻部队，因此第二大队除留少数人阻击外，大部转移到库山参加战斗。苏鲁支队也在库山一侧阻击敌人。天亮后攻击库山的日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一次次向库山南坡发起冲锋，均被第三中队击退。战斗至下午2时，运河支队阵地被日军炮火轰起一层厚厚的泥土，部队伤亡较大。激战至黄昏，苏鲁支队支队长张光中召集运河支队负责人协商，决定乘夜撤出库山，向北转移。张光中率苏鲁支队北渡运河后即赴邹滕东地区，与政治委员彭嘉庆率领的第二营汇合。运河支队分两路北渡运河，一路是支队领导机关、直属队，跟随第一大队进到朱阳沟一带宿营，另一路是第二大队，渡河后进到郝家湖一带待命。12日天还没亮，在朱阳沟宿营的支队部便遇到日伪军攻击。原来枣庄、峰县城、韩庄等地的日伪军2000多人，在黑木指挥下已预伏在曹庄、阴平、古邵一线。朱阳沟战斗打响后，附近的日伪军全都围拢过来，集中攻击朱阳沟的运河支队。村内到处墙倒屋塌，一片火海。支队长孙伯龙指挥打退了敌人

的 20 多次攻击。天黑后在第一大队的支援下，部队胜利突围。运河支队以伤亡 50 余人的代价换取毙伤日伪军 400 多人的胜利。运河支队第二大队在撤至郝家湖附近时突遭日伪军炮弹的袭击，部队顿时大乱。撤到巨梁桥闸口旁的部分队员被汉奸刘善云捕去 31 人。在日军指挥下，刘善云将陈诚一等 28 人杀害于巨梁桥下，造成“巨梁桥惨案”。运河支队在反“扫荡”中遭受日伪军数次截击，部队损失较大，由近千人锐减至 300 余人。1940 年 10 月底，第一一五师为保存这支部队的有生力量，命令运河支队除留一小部分兵力在原地坚持游击战外，其余进入抱犊崮山区休整。

五、组建峰县支队

第一一五师峰县支队是与运河支队同时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由活动在峰县地区的几支农民抗日队伍和统战队伍组成。

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峰县县委和县政府非常重视峰县的地方武装工作。经过积极努力和争取，峰县地方武装孙云亭部、田瑶峰部、峰县直属大队，以及潘振武从第一一五师带来的一个红军连队，于 1939 年 12 月整编为第一一五师峰县支队。县长潘振武兼任支队长，县委书记纪华兼任政治委员，孙

云亭任副支队长，陆成道任参谋长，赖国清任政治处主任。峰县支队下辖直属大队和第一、第二大队。

直属大队大队长由朱玉相担任。朱玉相原为峰县邹坞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任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1938年秋，义勇总队东征到大炉之后，朱玉相奉命随朱道南到土匪武装王学礼部做争取改造工作，被张里元委任为副旅长。在他和朱道南以及派往该部的其他共产党员文立正、杜立、金宝蕴、曹杰的努力争取下，该旅许多官兵向往共产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抵达鲁南后，王学礼执意紧跟张里元反共，朱道南和朱玉相在文立正等共产党员的协助下，争取了该旅第十团所属的200余人脱离张里元部，并将他们带回峰县北部山区，于1939年11月编为八路军峰县直属大队，朱玉相任大队长，曹杰任教导员。在该部整编时，潘振武又将从第一一五师带来近一个连的兵力充实到直属大队中，并加强了党的领导和纪律作风整顿工作，部队士气比较高涨。直属大队成立后，随峰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一起活动。同年12月初，潘振武和胡大荣率第一一五师一个主力营和峰县直属大队，到峰县第四、五、六区活动，扩大八路军影响。年底峰县直属大队编为峰县支队直属大队。

第一大队由田瑶峰部编成，该部原系峰县抗敌自卫团副总团长田瑶峰的常备大队。1939年3月，枣庄失陷后，田瑶峰就在枣庄矿区拉起了150余人的队伍。队伍成分有工人、农民和学生，也有市民和流氓无产者。为改造和掌握这支队伍，中共鲁南中心县委对这支队伍做了大量的工作，曾以四县边区联庄会的名义对其进行充实和加强，并派去部分共产党员。1939年9月，共产党员刘向一奉鲁南第三地委的指示前去做田瑶峰的统战工作，并任峰县抗敌总团政治处主任兼常备大队政治委员。此时，还从第一一五师主力调去红军干部邓辉煌和一位姓陈的同志分别任中队长和指导员。不久，刘向一发展了田瑶峰的儿子田培荃和十几名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入党，并在田部建立秘密党支部，刘向一和邓辉煌先后任书记。他们号召部队向老八路学习，整顿了纪律，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在整顿军纪中，还枪毙了一名强奸妇女、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的坏分子。从此，军纪大有好转。

1939年12月，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枣庄日伪军十分惊慌，便调集了600余人向峰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王家湾进犯。县长潘振武调县直属大队和县抗敌自卫总团常备大队阻击敌人。经过数小时激战，大量杀伤了敌人，该部却无一伤

亡。这一仗，保卫了抗日根据地和新建立的峰县抗日民主政府，参战部队士气高涨，对当地人民鼓舞很大。

王家湾阻击战结束之后，田瑶峰被第一一五师请到大炉，受到了盛情款待，潘振武、胡大荣和刘向一都奉命作陪，使田深受感动，提出了将亲手组织起来的峰县抗敌自卫总团常备大队交给第一一五师指挥的请求。还说：“我已经 50 多岁了，不能随军征战，请允许我儿子田培荃代替我指挥。”罗荣桓代表师首长接受了田瑶峰的请求。时隔不久，峰县支队成立时，田培荃被任命为第一大队大队长，刘向一任政治委员。1940 年 4 月，刘向一奉命专做峰县群众工作，邓辉煌任政治委员。

第二大队由孙云亭部整编而成。大队长由孙云亭的儿子、中共党员孙怡然担任，孙伯英任指导员兼参谋长。该部创建并活动于峰县阴平一带。

孙云亭部始建于 1938 年初，当时只有几十个人的武装，孙亦被黄僖堂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〇支队第三梯队司令。同年秋，该部发展到 300 多人，设三个大队、一个直属中队，其领导层多是旧乡长和地方护家队骨干，还有兵痞、流氓和土匪，其战士多数是青年学生和农民。为改造这支部队，中共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派遣孙云亭的儿子、原

中兴中学学生、共产党员孙怡然返回家乡，争取和改造其父的武装。不久，县委又派共产党员孙伯英到这支部队做争取工作。孙伯英是孙云亭的族侄，干过旧部队，善于谈吐，孙云亭很器重他，委任其为参谋长。时隔不久，在孙怡然和孙伯英的争取下，县委又派共产党员张振环和柴庆荣前来，协助孙云亭部搞军政训练，部队素质得以提高。因部队成分复杂，孙怡然和孙伯英还说服孙云亭，把几个屡教不改的兵痞、流氓清理出队伍，并大量吸收青年农民参加部队。在此期间，县委还相继派遣纪华、朱道南、邱焕文和张福林以抗日义勇总队联络员的名义，多次对孙云亭做团结争取工作，使孙云亭同土顽黄僖堂关系逐渐疏远。1939年4月，孙怡然在其父面前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孙云亭不但没有反感，反而更加器重儿子，让他出面训练部队，率队与日伪顽作战，并出面团结峰县第五区孙茂墀部，一起铲除了活动在当地的两股土匪武装，使阴平一带社会秩序好转。这时，孙怡然和孙伯英还顶住了黄僖堂妄图将孙云亭部编入东北军和国民党峰县县长李同伟武装的挑拨、拉拢。9月，县委派朱奇民到峰县第四区任区委书记。他受县委委托公布孙怡然和孙伯英为区委委员和军事委员，孙怡然任区长。此后，朱奇民对孙云亭部也做了一些颇有成效的争取和教

育工作。为了更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经上级批准，县委书记纪华、组织部长孙振华和区委书记朱奇民都在孙云亭面前公开了党员的身份。

1939年12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峰县支队成立时，孙云亭比较愉快地把部队交给主力部队进行整编，并接受了副支队长的委任。

1940年5月4日，驻峰县、枣庄、临城、韩庄等据点的日伪军千余人，分数路包围峰县支队第二大队驻地邵楼村。第二大队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100余人，突出重围，转移到抱犊崮山区休整。战斗中，峰县支队第二大队参谋长孙伯英等50余人牺牲，峰县第四区区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孙怡然负伤。

6月，第一一五师又派刘炳才、陆成道、王六生率第六八六团两个连充实峰县支队。峰县县长潘振武、县委书记纪华不再兼任峰县支队领导职务，由刘炳才任支队长，王六生任政治委员，孙云亭仍任副支队长，陆成道任副支队长兼参谋长，赖国清任政治处主任。支队下辖三个大队，直属大队改为第一大队，大队长仍由朱玉相担任；第二大队长为孙怡然，教导员为曾宪纯。原打算争取孙茂墀部整编为第三大队，后该部投敌，

第三大队未建成。7月，刘炳才支队长率部在穆庄战斗中牺牲，陆成道接任支队长，董明春任参谋长。为扩展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地区的局面，峰县支队于1941年1月中旬奉命进入边联县活动，并攻克大忠村、雪南等伪据点。二三月间，与活动在这一带的边联支队合编，统一称为边联支队。

六、组建临郯费峰四县边联支队

临郯费峰四县边联支队，是以万春圃为首的四县边联办事处的武装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它的组建是第一一五师抵达鲁南后，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发展进步势力的成功典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万春圃在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协助下，毁家纾难，倾家荡产，恢复建立了临郯费峰四县边区联庄会和办事处，并建立了联庄会抗日武装。为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战，他把亲手组建起来的四县边联办事处常备队编入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在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下，又拉起100余人的警卫连，积极配合地方抗日武装，参加抗日斗争。四县边联办事处各个股的负责人，多数是共产党员，其武装常备队也为共产党员万国华和刘清如等所掌握，并配合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参加了滕峰边山区反顽斗争。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东征抵达大炉后，万春

圃的家便成了鲁南地方党政军领导的活动基地。不仅人民抗日义勇总队领导人张光中、李乐平常住他家，鲁南特委进驻鲁南后，特委机关就设在万春圃家里。第一一五师主力抵达鲁南山区后，万春圃把自家的房子腾出来，让师司令部在此办公，陈光、罗荣桓当时就住在他家中。这样，鲁南特委和第一一五师司令部两个机关都安在万家。万春圃每天总要到罗荣桓屋里坐坐，罗荣桓常常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和红军的历史和传统，使他受益匪浅，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1940年3月22日，万春圃的四县边联武装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临郯费峰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任支队长，于化琪任政治委员，贾耀祥、宋鲁泉任副支队长，靳怀刚任政治处主任。边联支队下辖第一、二、三、四大队。

第一大队由边联办事处特务营、警卫连和边联县第三区自卫团基干队编成，全队500余人，王芑南任大队长，崔梦坡、孔觉民任副大队长，郭仲选和任玉奎分别任正副教导员。

第二大队由尚岩、鲁城、大炉、大山集和青山套一带的自卫团基干队整编而成，全队300余人。陈光晨任大队长，王占凤、程占奎任副大队长，丁文达任教导员。

第三大队由转移到大炉、车辋一带的费县第二大队和店

子、马庄、流井、新庄等自卫团基干队合编而成，全队 300 余人。徐子仁任大队长，杨明山任副大队长，孙士炎任教导员。

第四大队由马瑞图拉起的苍山大队及卞庄周围的部分自卫团基干队编成。郎义民任大队长兼教导员，马瑞图、马金兰任副大队长。

1940 年底，边联支队编入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第五团，对外仍使用边联支队的番号。这时支队长（团长）为万春圃，政治委员为曾明桃，副支队长（副团长）为贾耀祥。

第五节抱犊崮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

枣庄东北的抱犊崮抗日根据地是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它是联系鲁中、华中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纽带，也是山东敌后抗日战场的重要阵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进入鲁南，对推动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一五师到鲁南后，相继将鲁南地区的武装进行整编，同时，开展一系列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先是进军郯马平原，打通与华中区新四军的联系，建立党政群组织，支援当地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巩固了抱犊崮山区东南部外围阵地。接着又进行了扫清抱犊崮周围

反动势力的战斗。首先是攻打孔庄。孔庄位于大炉南面 10 余里，是大地主杜若堂武装控制的一个顽固封建堡垒。第一一五师进驻大炉后，曾争取杜若堂抗日，他不仅置若罔闻，还从枣庄引来 100 多名日军袭击八路军。孔庄成为抱犊崮山区的一个“钉子”。1939 年 12 月初，鲁南军区后方司令部司令员胡大荣率部多次进行强攻，最后突破围寨，将杜若堂等歼灭。接着，第六八六团又伏击了白山和上下十河的日伪军，扫除了枣庄日军安插在抱犊崮西部的据点。第一一五师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震动了大炉周围的反动地主，一些地方武装改变了过去闭门锁寨、敌视八路军的做法，纷纷向第一一五师靠拢。

12 月下旬，第六八六团主力又向盘踞在滕东冯卯、山亭、文王峪等地的顽军申宪武部发起攻击，攻克顽据点，歼其一部，申宪武率残部逃往铁路西。同时，苏鲁支队一部在董尧卿部和滕东县大队配合下，打进东江和驳山头等村，全歼申宪武部第七纵队第三团和国民党别动纵队第五梯队第四十三游击支队，生俘顽军头目朱十英、王玉森，收缴步枪 540 支。这次反顽作战，清除了滕东地区的反共顽固势力，解除了抱犊崮抗日根据地西北部的威胁，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2 月 26 日，梁兴初率由湖西调来的苏鲁豫支队第二大队，在滕费公路上的兑头沟

（现属枣庄市山亭区）伏击日军运输队，歼日军 90 余人，缴获迫击炮 4 门、电台 1 部及 60 辆满载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的牛车。至此，抱犊崮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已扩展到南至郯马、东至临沂、西至滕邹边、北至梁邱一带。第一一五师在此先后建立了峯县、邹县、郯城、费县、临沂、邳县等县抗日民主政府，使抱犊崮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接着陈光、罗荣桓又决定向北发展，进攻白彦。经反复争夺，最终摧毁了白彦及周围各据点，切断了日伪控制的费滕公路，解放了白彦地区，打通了八路军鲁南与鲁中区的联系。

到 1940 年底，抱犊崮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已达 110 48 平方公里，占鲁南全区总面积的 21.7%；人口有 75 万余人，占总人口的

21.18%。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也都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第六节 峰滕铜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峰滕铜邳抗日游击根据地亦称黄邱山套抗日游击根据地或峰（县）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地跨运河南北，四周有津浦铁路、陇海铁路、临（城）枣（庄）铁路支线、枣（庄）赵（墩）铁路支线环绕，北有枣庄煤矿，南有贾汪煤矿，西有

利国驿铁矿和微山湖。因其交通便利，矿产资源和水产资源丰富，加之战略地位重要，各方势力在此争夺十分激烈。

1939年12月，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听取了纪华、朱道南的工作汇报后，认真分析了敌、伪、顽、我等各方面势力，认为峰县县委、县政府在这一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想法是正确的。他指出：“抱犊崮山外的峰南运河地区，靠近徐州，西傍津浦铁路，南接陇海铁路，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地，日军和国民党军队都十分重视这个地区。在此地区一旦树起了八路军的旗帜，我们的队伍发展壮大起来，那里必然成为日伪顽激烈争夺的地区之一。只要我们在那里坚持斗争，敢于斗争，我们就一定会在那里站住脚跟。”当朱道南汇报那里有几支武装希望编入八路军、但他们又担心部队成分复杂不好驾驭领导时，罗荣桓说：“不要怕部队成分复杂，关键要看领导干部如何去带领。我们把地方武装编入八路军，这本身就是对蒋介石反共投降政策的一个有力反击，对抗日军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是扩大了抗日阵营。眼界要放宽一些。把部队发展起来，要经得起摔打。部队的活动范围不要局限于峰县，要拉开。即使出现大的困难，还有山区主力的支援。只要八路军的旗帜树立起来，我们就能在那里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根据罗

荣桓的指示，峰县县委、县政府率领部队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建立第四、五、六区政权，组织工、农、青、妇各种团体，开展统一战线和敌伪军工作。

国民党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根据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的要求，对鲁南各县大放县长，委任陈鉴海为国民党峰县县长。陈鉴海一到任，就带着几个亲信在运河南北进行反共宣传，寻求支持，却四处碰壁。后来，通过甜言蜜语把本来已经编入运河支队的龙希贞父子拉拢过去。他还鼓动活动在峰县北部峨山口的国民党第三游击司令梁继璐部南来，与运河支队争夺地盘。运河支队领导认为，要想在运河地区站住脚，必须首先将陈鉴海驱除出去。1940年4月上旬，运河支队突然袭击，智取了梁继璐部王云溪大队的泉源据点，将陈鉴海、梁继璐等部驱赶到了铜山县境内。五六月间，运河支队又先后袭击了铁路线上的利国驿铁矿和唐庄、周庄等日伪据点，均获胜利。

1940年7月，缪澂流在沂蒙山区组建鲁南、苏北17县游击区总指挥部，并亲自兼任总指挥。他伙同指挥部的参谋长蓝庚年等，召集苏鲁边区17县国民党县长开会，积极部署反共。同时秘密串通山东的沈鸿烈、秦启荣，江苏的韩德勤、李守维等坚决反共分子，准备在鲁南、苏北等地区发动一场全面清洗

共产党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斗争。

面对顽军的进攻，运河支队与苏鲁支队、峰县支队并肩战斗，于7月上旬击退梁继璐部王治尧大队的进攻，收复不老河北岸地区。8月上旬，又击退以国民党苏鲁边司令韩治隆为首的多路顽军的进攻，俘获韩治隆部营长邢焕章及以下40余人，将韩治隆部等顽军驱赶到不老河南岸，从而使峰滕铜邳地区的抗日局面大为好转。原来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几股顽军在抗日武装打击下，有的消失，有的退走。国民党的特种工作团只剩下一个大队，由郑继筠带领撤到津浦路西侧的丰（县）沛（县）地区；第五〇支队司令黄僖堂在其队伍被打散后，孤身一人逃到韩庄日伪据点；第三支队司令梁继璐带着400多人的残余部队退到枣庄以北的山区；与此同时，张里元部孙业洪游击队虽然坚决反共，但对根据地已不能构成重大威胁。峰滕铜邳地区已经形成以抱犊崮山区为依托、背靠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该根据地东西南北各长约40里，普遍建立了区、乡政权和武装，工、农、青、妇各种群众团体也都建立起来，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随处可见。为了便于抗日武装在运（河）北平原区的活动，区、乡政府动员群众，在周营、阴平之间挖了两道交通沟。根据地内抗日歌声不绝于耳，军民

联欢频频举行，甚至连靠近日伪据点的边沿村也不例外，欢乐的锣鼓声可传到日军据点。

1940年10月，日伪军对根据地进行多次“扫荡”，运河支队损失较大。为保存这支部队的有生力量，10月23日，朱道南从抱犊崮山区赶到运河支队所在地，传达罗荣桓的指示，让运河支队留少数武装在原地坚持，其余部队进山休整。孙伯龙率领运河支队主力进山，朱道南、邵剑秋率领一个中队在运河地区坚持游击战。11月8日，当朱道南、邵剑秋带着队伍和峰县支队部分武装进驻弯槐树村时，突然遭到千余名日伪军的包围。两支抗日武装与日伪军激战一天，击溃日伪军10余次的攻击，于当晚突围，以伤亡40余人的代价毙敌130余人。弯槐树村战斗的第二天，两支抗日武装跨过临枣铁路进入抱犊崮山区。

进入抱犊崮山区后，运河支队一大队和二大队八、九中队编入第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同时，峰县党政军机构进行了充实调整，孙振华任县委书记兼运河支队政治委员，张允峙任县委组织部部长，朱奇民任宣传部部长，刘向一任民运部部长，潘振武调出，朱道南接任峰县县长，运河支队支队长孙伯龙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邵剑秋接任支队长。

由于苏鲁支队第三营、峰县支队、运河支队、峰县县委、县政府和几个区的党政机构等先后撤到抱犊崮山区，坚守人员只好转入地下活动，运河南北全部伪化。运河地区的伪化使山东、华中与延安的交通线一度中断。为此，党中央电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一定要迅速恢复运河地区，打通各战略区与延安的交通线。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41年元旦前，罗荣桓在鲁南山区召见朱道南、邵剑秋等人，并听取了汇报，指出：运河地区地处徐州附近，地理位置重要，是华中和山东联系的纽带，坚持这个地区具有战略意义。运河支队一部分升入主力，留下一部分作基础再打回去，回到山外运河地区，要接受前阶段的教训，对敌斗争要机动灵活。为活动方便，部队要穿便衣，必要时可以以连队为单位分散活动。如果在这一狭长地区保留住500余人的精干部队，坚持到胜利，作为反攻徐州的前沿阵地，就算完成了任务。罗荣桓的指示成为峰县党政组织恢复、重建峰滕铜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导方针。

主力部队撤走后，留在运河以南地区的胡大毅、胡大勋等人，在不老河的朱家湾一带，利用国民党苏鲁边司令韩治隆的统战关系，收拢、整顿原来的运河大队。第十中队副指导员刘启家和胡大毅将在运河南收拢的部队重新组织起第八中队，在

贾汪东西两侧、贾柳铁路支线南北地区和黄邱山套一带隐蔽活动，并派杜玉环以第十中队长的名义重新发展部队。经过三个月的时间，第十中队又拉起 30 人的队伍，为恢复重建峰滕铜邳抗日游击根据地作出了积极努力。

1941 年 2 月上旬，为了重新打开运河地区的抗战局面，鲁南区党委根据第一一五师首长的指示，决定派教导第二旅第五团副团长王根培兼任运河支队副支队长，带领第五团第三营随运河支队和峰南县（1941 年 2 月初，峰县改称为峰南县）党政机关出山。随同出山的还有孙伯龙率领的峰山支队（支队长为孙伯龙、政治委员为彭畏三、副支队长为孙云亭），以及峰南县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为孙景山、副中队长为陈继全、指导员为王振南，后划归运河支队建制）70 余人。

运河支队出山后，为了重新打开局面，决定首先打下周营伪据点。周营为伪峰县第七区区长兼大队长孙景义所盘踞，共有三个中队约 200 余人的兵力，分驻 3 个小据点，据点围墙高约 3 米，外有宽 3 米、深 3 米的围壕，壕边设有铁丝网，围墙四角各有一座碉堡，可谓深沟高垒、易守难攻。夜间据点周围汽灯高照，明如白昼，伪军头目认为防范森严。1941 年 2 月 10 日夜，出山部队和峰南县党政机关到枣庄西南的放马场村

隐蔽，封锁消息，作好强攻周营的一切准备。2月11日上午，部队采取奇袭方式，由放马场出发，夜间1时许到达周营外围。担任防御韩庄、阴平方向日伪军增援的两个连队，分路开进防御阵地。3时整开始战斗，最终运河支队攻克周营据点，共俘获人员20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支，副连长张少从一人牺牲。攻克周营后，峰南县党政机关和运河支队又攻克日军六里石据点，渡过运河，进入黄邱山套地区。

1941年4月至6月，运河支队进入黄邱山套地区后，先后粉碎了日伪军两次总计5000余人的军事进攻，取得了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并缴获武器一宗和日伪军抢粮、运粮牛车数十辆。8月，日伪军2000余人向旺庄地区合击“扫荡”。运河支队避敌锋芒，在涧头集附近设伏，给扑空回撤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毙伤多人，其余日伪军窜回各自据点。尔后，黄邱山套地区有近三个月的稳定时期。中共峰南县委利用这个机会加强武装建设，将两个区中队和褚雅青发展的武装组建为峰南县大队，县长朱道南兼任大队长，褚雅青任副大队长。

1942年3月底，运河支队领导集中第八、第九两个主力连，北出黄邱山套，进驻侯孟据点西南四华里之杜安集至西伊家一线，伺机深入平原地区，帮助区中队打开局面。杜安集南

靠黄邱山套西北部，东西有高 200 多米的群山，有两个山口与套里相通，南北山口之间都是崎岖不平的小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一个攻守皆宜的地方。贾汪和涧头集的日伪军闻知运河支队主力公开进入套北平原地区活动，采取东西对进之策，力图把运河支队主力挤出去。4 月初，东路的涧头集日伪军 200 余人向驻杜安集、唐庄的运河支队第九连发起进攻，因未见贾汪日伪军东进，后撤回侯孟。同日，贾汪的日伪军 300 余人北出贾汪山口，沿着大小杏窝、黑古堆向东“扫荡”，临近午时才向驻西伊家村的第八连阵地进攻，被八连连长王默卿率部击溃。进攻西伊家的敌人刚刚撤退，侯孟的日伪军又向唐庄阵地发动攻击，被第九连击溃。运河支队一天打退了日伪军三次进攻，趁势北进到张山子。尔后，又越过津浦铁路，转移到黄龙山一带活动。从此，在黄邱山套以北的三角平原地区一带，抗日武装已能从分散隐蔽的活动改为半公开半隐蔽的活动。

为配合李仙洲部北进山东的行动，国民党苏鲁边司令韩治隆和湖西地方顽固派司令冯子固共同合谋，企图南北夹击运河支队。在此之前，国民党特种工作团的郑继筠部垮台后逃到湖西，郑继筠被冯子固委任为第十九挺进大队大队长。1942 年 3

月，他带着不足百人的队伍，东过津浦路，进到黄邱山套以北的新河地区活动。新河地区是北进鲁南、西通微山湖的咽喉地带。运河支队领导当即决定，为了不打草惊蛇，应先麻痹顽敌，遂通知区政权暂不拒绝郑继筠征粮派款的要求，并与之周旋；同时，利用双方士兵是本土同乡、同宗同姓的有利条件联络感情，从而使郑顽放松警惕，更为骄横。7月中旬，运河支队组织第八、第九两个连，突然发起讨伐郑继筠的战斗，生擒郑继筠并俘虏郑部全部，第八连、第九连无一伤亡。

郑继筠部被消灭后，冯子固又派地方顽固派丛维三纵队800余人，由丰县经铜山县西北部，过津浦路，先头部队占领了土盆村，并在南许阳村的西南山放岗、设哨，似有与韩治隆部联合进攻运河支队的可能。支队决定，调回正在运河北岸配合文峰游击大队的第一连，发动军民在南许阳村掘壕设堡，准备迎敌。支队主力第八、第九两连布置在督公唐山、杨围子一带；在黄邱山套的东西两侧和杜安山口，由第二连和两个游击大队负责监视贾汪、韩庄、涧头集等地日伪军。运河支队与顽军对峙了20余天，韩治隆见军事威胁不能达其目的，便以和事佬的面目出现，约运河支队在桥头村进行谈判。队长胡大勋带警卫分队应约而至，驳回了顽军的无理要求。桥头谈判后，

丛维三部就偷偷溜回了津浦路西。运河支队取得了新的反顽斗争的胜利。

1942年4月，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从鲁南第四地委调纪华、王磊和刘亦夫等8人到峰南县委工作，纪华任县委书记兼运河支队政治委员，孙振华改任副书记，以加强县委对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领导。同时，峰南县委派张允峙、朱奇民到运北及临城、沙沟、张阿一带恢复党组织。张、朱同时提出建立运北武装的建议，得到县委采纳后，将地方党支部拉起的武装游击队和运河支队、峰县支队以及赵仁义带回的古邵起义伪军武装组建成文峰游击大队，赵仁义任大队长、刘亦夫任政治委员。在抗日战争艰苦阶段，峰南县委及其领导的运河支队、文峰游击大队，以及之后相继建立的由邵子真任大队长的农民大队、谢绍唐任大队长的龙门大队等部，为坚持峰（县）南运河两岸的抗日斗争、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打通华中经鲁南至延安的战略交通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42年下半年，根据当时对敌斗争形势和统一战线要求，峰南县委决定，对运河支队领导人再次进行调整，原参谋长胡大勋任支队长，孙斌全任副支队长，邵剑秋任政治部主任，童邱龙任副政治委员。与此同时，对部队进行精简整编，取消营

建制，保留支队，直辖第一大队、第二大队、龙门大队、农民大队、文峰大队。部队精简后，实行一元化领导，与峰南县委、县政府合署办公，支队供应处和县抗日民主政府财政科合并为供应科，统一筹集党政军的给养。

第七节 微山湖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一、微山湖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初创

微山湖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指微山湖、昭阳湖以东，津浦铁路滕县至韩庄段以西，以夏镇为中心的南北狭长地带。因这一地区抗战前分属山东滕县和江苏沛县，故又称沛滕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该区地处鲁南和湖西两大抗日根据地的结合部，是山东通往湖西各战略区乃至延安的咽喉要道，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特殊的战略位置，日、伪、顽、匪对这一地区相互争夺，斗争激烈尖锐。抗日军民对这一地区得、失几次反复，直到1944年局部反攻，该地区才与其他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鲁南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8年3月，张新华、郑安良和王志成等分别在夏镇、南庄发动组织的抗日武装编入张光中领导的抗日义勇队之后，张新华又奉命回到夏镇，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搞募捐，并动员当地爱国青年参加义勇总队。这时，夏镇已成立维

持会，会长刘凤林死心塌地地为日军效劳，欺压百姓。张新华向总队汇报后，张光中派义勇总队第二大队突袭夏镇维持会，解除了维持会武装，处决了刘凤林，使夏镇的党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滕县失守后，滕县、邹县党组织转移到滕西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也曾经来到这一地区，协助打开了抗战局面。

9月，丰（县）沛（县）鱼（台）中心县委书记郝中士根据苏鲁豫特委的指示，派主传珍到沛滕边区开展工作，建立了夏镇区委，积极深入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抗日工作，并建立了自卫团、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为支援湖区的抗日斗争，张光中率义勇总队多次到夏镇一带活动并帮助其开展工作。年底，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抵达湖西地区，一举歼灭了伪军王献臣部 800 余人，迅速打开了湖西抗战的局面。12月底，沛滕边县委建立，主传珍为书记。县委辖沛第七区、滕第七区、滕第八区、水上区四个区委和夏镇特支等党组织。沛滕边县委积极发展党员，组建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团体，并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4月，沛滕边联合办事处建立，苗宗藩任办事处主任，张新华为副主任，冯子固（国民党沛县县长）任名誉主任。至此，微山湖区

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形成。

为适应迅速发展的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沛滕边县委从1939年3月到年底，先后举办了5期党员训练班和3期工农青妇积极分子训练班，培训430余名抗日骨干。同年秋，沛滕边青年抗日救国团县团部建立，青救团的主要任务是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武装和对民众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沛滕边的抗日群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1940年2月，沛滕边县委书记主传珍调走，黄天明继任县委书记。这时沛滕边地区的伪顽势力同人民抗日武装之间的斗争已日趋激烈。沛滕边县委在积极做好伪军工作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武装，扩充力量，孤立敌人。他们经过细致认真的工作，在夏镇伪军大队中秘密发展了10多名共产党员。同时，县委还建立了以张新华为营长的县警卫营、以王吉善为大队长的民运大队、以王志成为大队长的丰沛鱼三县边联大队。2月14日，张新华率警卫营第一连在夏镇以北伏击了日军和伪保安大队，击毙日军传达长李根，打伤日军5名，缴获战马9匹、步枪30余支、驳壳枪4支，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至1940年5月，沛滕边县委共发展党员1000余人，党组

织遍及沛滕边方圆 100 华里的各村庄。县委还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统战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沛滕边联合办事处，同时组建了抗日武装，创建了微山湖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可是，由于湖西“肃托”错误的影响，党和军队在群众中的威信遭到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党的统战关系被破坏，丰县、沛县、铜山县的国民党顽固派借“肃托”事件大肆中伤共产党和抗日部队，驱逐共产党派到其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日伪军则乘机对根据地进行“扫荡”，致使根据地的武装力量遭到重大损失，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

6 月初，苏鲁豫支队奉命南下，由黄河支队接替苏鲁豫支队坚持湖西地区的抗日游击斗争。在国民党特务头子汤铁飞的要挟下，冯子固走向反动，制造了屠杀微山湖地区抗日干部的“六一三”事件。国共统战工作在沛滕边区被冯顽破坏，共产党派往冯子固部胡子良团的军政骨干被迫撤出，抗日斗争形势日趋紧张。

8 月，为坚持湖区的斗争，上级党组织决定以黄河支队第二团第二营两个连为骨干，与沛滕边警卫营、沛滕边民运大队、丰沛鱼三县边联大队及沛县警卫营、沛铜独立营等武装共同整编为五县游击大队。五县游击大队以微山湖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为活动基地，坚持开展对敌斗争。

9月下旬，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和滕县党组织也从该地区撤走，留下的党组织和武装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微山湖区的斗争更加艰苦、残酷，日伪顽相互勾结，大肆搜捕隐蔽下来的干部，沛滕边县委民运部部长张运沛等十几名干部被捕，峯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李涛、沛滕边县委委员司那夫等几十名干部和民兵被杀害。峯县第四区留下来4名干部，由于叛徒出卖，代理书记孙耀南被捕，贺文藻牺牲。1940年冬，日军在对运河地区“扫荡”的同时，也对微山湖地区进行了“扫荡”和“清剿”。运河南北、微山湖内外，日伪顽军碉堡林立，交通封锁沟纵横交错，严重地阻碍了共产党和八路军交通线的畅通。与此同时，五县游击大队在沛滕边的活动引起敌人的恐惧。日伪军四面合围，夹击沛滕边区。经过几次战斗，形势对我依然不利。11月中旬，滕、沛、丰、铜、鱼五县顽军2000余人合围微山湖。潘复生率部撤离沛滕边区，转移到湖西根据地后，湖东和湖西交通联系受阻，延安至山东、华中的交通线随之中断，抗日斗争更加艰苦。

二、微山湖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微山湖内靠近东岸不远，有一座岛屿叫微山岛，岛内有吕

蒙村、杨村、大小官庄、墓前村等大小 18 个村子，2000 余口人。抗日战争前，这里是滕县的辖地，据传这里是殷代微子的隐居地，岛上有微子墓、张良墓，岛内居民大都姓殷。该岛向东十几里就是津浦铁路的塘湖车站。塘湖原来仅是一个村子，没有火车站，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八路军经常在这一带出没，袭击铁路列车，因此，日军在这里设立了火车站，并在岛上建立了伪乡公所，任命殷占鳌为伪乡长。日军占领微山岛后，严重地影响了交通线的开辟。峄县县委决定派邵子真到其家乡组建武装，开展抗日活动。

邵子真的家乡是沙沟车站东侧的李店村，离塘湖很近。抗战前，他在家乡教书。七七事变后，他和邵剑秋一起组建武装，后加入了八路军运河支队，邵子真任第一大队大队长。此次他带少数人员回到家乡，经过两三个月的组织发动，很快就建立起 100 余人的队伍，仍称运河支队第一大队。尔后，他们又连续端掉了几个伪乡公所，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王根培带领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第五团第三营从黄邱山套来到微山湖区，在运河支队、鲁南铁道大队等武装的配合下，一举袭击了夏镇以北 10 里的杏园顽据点，歼灭周侗部郝二毛子团 200 余人。接着又乘胜击溃了驻部城的胡子良部，重新开辟了微山湖区抗

日游击根据地，恢复了与湖西地区的联系。第五团离开这一地区时，王根培又送给邵子真部两挺轻机枪。运河支队第一大队成为这一地区人数较多、武器装备较好的抗日队伍。

1941年春，邵子真派褚衍启利用社会关系进入微山岛。不久，邵子真也率领队伍进岛。鲁南铁道大队、滕沛大队、峯县大队、微湖大队等几支武装也相继进入岛内活动，把微山岛当作后方基地。不久，在岛上建立了滕县第八区区委、区政府，微山岛成了共产党游击队开辟的抗日根据地。

1941年6月16日夜，临城日军一个分队和伪军一个大队300多人联合韩庄据点伪军，共同侵犯微山岛。当时各游击队都在岛外活动，岛上只有几十名后方留守人员，他们闻讯后分散乘船进入微山岛的芦苇荡，日伪军扑了个空。几天后，日军撤回临城，留下伪军副团长苏海如带队驻微山岛。

为了夺回微山岛，6月22日夜，运河支队的褚雅青、邵子真，鲁南铁道大队的杜季伟，微湖大队的张新华，滕沛大队的钟勇飞和水上区、滕八区等部的负责人在小袁庄南坝聚集开会，共同商定作战方案。大家认为岛上的伪军不多，战斗力不强，人地生疏，群众痛恨，又远离临城，夺回微山岛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公推运河支队作战参谋褚雅青为总指挥，统一指挥

攻岛战斗。6月23日夜，战斗首先在杨村、吕蒙村、小官庄打响，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队很快占领了吕蒙村。运河支队第一大队在小官庄村头毙伤伪军20余人，其余伪军逃回杨村，战斗仅用1个小时就将杨村外围的伪军全部解决。

经彻夜战斗，运河支队等武装以很小的伤亡消灭了伪军一个大队，活捉副团长苏海如，毙、伤、俘伪军官兵200多人，缴获长短枪200多支。以后，临城日军又从邹县调一个伪军团（团长尹洪星，人称尹团）来微山岛报复。尹团刚到湖滨闸口，即遭抗日武装部队的伏击，随后便狼狈地窜回了临城。

微山岛解放后，峰南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微山办事处，张捷三、刘向一先后任办事处主任。微山湖地区的抗日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运河支队第一大队除第五中队活动在运河以南外，又在此地重新组建了第三中队，队伍很快发展到200余人，经常进驻微山岛。微山岛于是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1942年4月，日军计划集中数千兵力对微山岛发起围攻，临城、沙沟、塘湖、韩庄、夏镇诸据点都增加了日军兵力，合围“扫荡”微山岛的迹象已很明显。

4月20日下午，活动在微山湖地区的8支游击部队在岛

上共同商讨反击日伪军进攻的措施。这时，邵剑秋带运河支队第九中队来到岛上。他认为湖中孤岛没有机动的余地，于是动员运河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邵子真随他一道出湖。邵子真主张与兄弟部队商量后再撤，邵剑秋带第九中队出湖返回运河南。20日晚，邵子真、刘向一、杜季伟、褚雅青、张新华、钟勇飞、黄克俭等人在吕蒙村召开紧急碰头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微山岛不能固守的正确意见，但多数领导认为部队在微山岛活动时间较长，与当地群众关系密切，为了群众利益不可轻易离开。加之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作出了“只阻击，不恋战，惩罚一下敌人再撤退”的决定。会议公推邵子真为总指挥，王志胜、褚雅青、张新华、钟勇飞等为副总指挥，统一指挥保卫微山岛战斗，并作了如下布置：邵子真和教导员唐绍钦率运河支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守吕蒙村，褚雅青带运河支队第二中队和县大队一部分守杨村，鲁南铁道大队、滕沛大队分守大小官庄，微湖大队守墓前村。

21日拂晓，微山湖东岸的郗山和张阿闸上发出“隆隆”的炮声，呼啸的炮弹落在微山岛上。随后，数千名日军乘汽艇、舢板、划子和舰船从东南、正东、东北三方湖面向微山岛进发。防守吕蒙村的第四中队待日军汽艇、舢板、划子进到500米内，

才用机枪、步枪开始射击。日军汽艇上的机枪、掷弹筒以更加猛烈的火力进行还击。日军的舢板、划子交替掩护，直插滩头阵地，前边的舢板、划子被打翻了，后面接着跟上来。接近湖岸浅滩时，日军和伪军跳入水中，推着划子做掩护物，拼命向岸上冲来。第四中队以密集火力射击，阻击敌人的强行登陆。第四中队伤亡较大，邵子真与其他指挥员商量后认为硬拼不行，于是决定全线撤退。他指挥第一大队的大部边打边撤，涉水过湖。留下小部队在后面掩护，分队长马道举在战斗中肩部负重伤，倒在湖水中，又被日军刺了一刀。部队突围到沙沟车站以北的姬庄后，在白天强行过津浦路时，又遭到日军铁甲车的截击，教导员唐绍钦负伤，黄昏后才转移到路东的界沟村。

峰南县大队担任阻击的杨村阵地在凌晨4时许，也遭到敌人炮弹的轰击。天亮以后，满载日伪军的渡船向阵地驶来，汽艇上的机枪向阵地疯狂射击。30多名日军跳下划子，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湖岸阵地冲来。褚雅青率领战士们一阵猛射，猝不及防的日军被打倒一片，剩下的狼狈地逃回船上。日军在机枪和炮火的掩护下，又组织进攻。战士们再一阵猛射，一排手榴弹扔过去，第二次进攻又被击溃。日军指挥官恼羞成怒，组织更多的兵力第三次冲了上来，又被英勇的战士们打垮。战斗

打到上午 9 点多，防守吕蒙村的第四中队已经转移；鲁南铁道大队换上了事先截获的伪军军服，由大小官庄突围；防守墓前村的微湖大队也撤离阵地，向山西边转移；杨村阵地完全陷于孤立。日军占领了杨村的西山头，居高临下，集中火力向杨村阵地射击。同时，湖上进攻的日军也已登岸，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褚雅青身负重伤，战士们要背他走，被他拒绝，他掩护着战士们突出重围后壮烈牺牲。

微山岛战斗共击毙日军 100 余人，运河支队和峰南县大队等抗日武装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褚雅青、王保楼、王波、王清明、刘长德、李义泉、孙茂全、褚敬恩、褚敬全、张振武和张善德等百余名指战员牺牲。

1942 年 5 月，沛滕边县委书记王洪垒在寨子村开会时被伪军包围，在突围中牺牲，湖西地委派张庆林接任县委书记。6 月，临沙工委成立，领导鲁南铁道大队等武装镇压叛徒、特务，开辟阵地，很快又恢复了微山湖、沙沟、张阿、茶棚等大片地区。8 月中旬，微湖大队在湖西高楼进行整编，由张新华任大队长，孙新民任政治委员，胡桂林任副大队长。整编后，仍然在沛滕边区开展活动。在沛滕边县委和鲁南铁道大队等部的配合下，稳定了根据地的形势。9 月，为了解决微山湖区的

统一归属问题，沛滕边县委划归鲁南区党委领导。同时建立以鹿广连、张庆林为正副书记的沛滕峰工委，辖沛滕边县委、滕（县）沙（沟）工委等。同年秋，鲁南军区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决定将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队、沛滕县大队和峰县大队（文峰大队）合编为鲁南独立支队，并派遣孟昭煜、王建安、赵若华（赵明伟）等人前来做合编前的筹备工作。12月，鲁南独立支队正式建立，孟昭煜任政治委员，张新华任支队长，赵若华和王建安分别任保卫股长和敌工股长。微湖、铁道、沛滕、峰县四个大队分别改编为第一、二、三、四大队。支队的中心任务是打击、瓦解和争取日伪军政人员，巩固和扩大人民抗日武装的活动区，确保山东、华中至延安的交通线畅通。从此，微山湖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斗争形势趋于好转。

第八节 滕峰边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发展

一、滕峰边地区党组织的恢复

在枣庄东北的滕峰边区大部分是山区，地理范围大致为西从滕县城以东，南到枣庄以北及峰县的第三区和第一、第二区的部分区域，东北与费县交界，东南与临沂、郯城县接壤。1937年底至1938年夏，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曾以南塘、善垆为中心开辟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峰滕边县委。后因顽固势力包围被

迫撤离，转移到抱犊崮山区，刚建立不久的峰滕边县委亦随之撤销。

1939年2月，滕县县委建立。8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以津浦铁路为界，将滕县一分为二，分别成立滕东、滕西两个县委。王丹墀、生碧泉分别任书记。1940年下半年，日伪军向滕东县等抗日根据地“蚕食”，形势逐渐恶化，致使滕东县委只能活动在徐庄、辛庄、辛召一带，峄县县委也撤到运河以南。由于峄县第三区与滕东县接壤，为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对敌斗争，1941年2月，鲁南区党委决定将滕东县委改为滕峰边县委，书记为王丹墀。3月，形势更加恶化，县委不少干部离开本地，县委机关工作无法开展。6月，费南一带伪化。鲁南区党委决定将费南县委转移到滕峰边区，与滕峰边县委合并为费滕工委，工委机关驻徐庄。7月，为加强对滕峰边区对敌斗争的领导，鲁南区党委派崔晓东等到滕峰边地区，又恢复了滕峰边县委，崔晓东任书记，李子成任组织部部长，刘耀华任宣传部部长，邱焕文任统战部部长，薛林和陈涛分别负责青年和妇女工作。县委下辖4个区，县委机关驻上辛庄、徐庄一带。

1942年3月，为加强滕峰边县委的工作，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派穆林到滕峰边县委任书记，崔晓东任副书记，刘剑任办

事处主任，机关驻徐庄。到了5月，该县又新建了2个区，共辖6个区。6月，为贯彻刘少奇来山东时提出的减租减息指示，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决定以白彦为中心建立费滕边实验县委，开展“双减”工作。机关驻白彦，辖五个区委，隶属鲁南区党委领导。因费滕边实验县与滕峰边县名称容易混淆，鲁南区党委决定，将滕峰边县改称双山县，县委书记仍由穆林担任。

1943年4月，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占领了滕峰边根据地，双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人员撤至四县边联西部。根据鲁南区党委指示，双山县委改称边西工委，书记为穆林，副书记为王化，所辖区委、区政府不变。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入鲁后，联合日、伪、顽势力共同进剿鲁南抗日根据地。摆在根据地党组织面前的首要任务是领导军民坚决开展反顽斗争。为集中力量同第九十二军和地方顽固派、惯匪作斗争，8月，鲁南区党委决定，费滕边实验县委（部分）与边西工委合并建立费滕峰中心县委，穆林任书记，机关驻徐庄，直属鲁南区党委领导。该县委设5个工作部门、10个区委、2个敌后工委（西集工委、枣庄工委）。

二、滕峰边办事处的成立和斗争

1941年11月，鲁南专署决定成立滕峰边办事处，孙怡然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下辖四个区，第一区在抱犊固一带，区长为李瑞；第二区在徐庄一带，区长为王鼎新，副区长为陈正寅；第三区以辛召为中心，区长为王传章；第四区在板上、辛庄一带，区长为张锡爵。1942年秋，鲁南区党委决定将第四区划归费滕边实验县，将第一、第二、第三区改为以山命名。第一区分成君山、高山两个区。君山区活动的范围大部分是敌占区和游击区，根据地只有十几个村庄，区长为刘德坤；高山区以东洋泉为中心，区长为李瑞。第二区改为长山区，第三区改为英山区，领导人不变。1942年秋，办事处铲除磨泉、柳泉伪据点后，在磨泉、田庄一带建立青山区，区长为张裕国。另外，在敌占区庙南峪、东西鳧山一带建立一个新区，区长为崔玉柳。

滕峰边办事处除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外，还开展了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展县区武装，发动群众，加强民兵建设；二是健全和巩固乡村政权，认真贯彻根据地内的各项法令，减轻群众负担，取消苛捐杂税；三是开办小学和成人识字班；四是恢复和扩大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生活等。

1942年是日军加紧对根据地“扫荡”、封锁、分割、“蚕

食”的一年，也是滕峰边军民反“扫荡”、反封锁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一年。日军在边沿地区崖头、周村、半湖、毛宅子、天喜庄、柳泉、磨泉、山亭、西集等处安设据点，构筑碉堡，碉堡之间挖有封锁沟、垒有封锁墙，以此包围根据地。滕峰边的东北费县驻有顽固派李以锦的第九支队，西面是滕县顽固派申宪武部的刘玉华团。面对日伪顽的四面包围，滕峰边县委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根据地军民团结起来，与日伪顽开展坚决的斗争。

滕峰边的抗日武装力量比较弱小，县大队只有 100 余人，各区的区中队，多的有二三十人，少的只有 10 余人。针对这一具体情况，县委提出明确的对敌斗争方针：一是县和各区人员思想、作风都要战斗化，一切为了战争，一切适应战争。二是加强武装建设，依靠群众，形成一个全民皆兵的局面。各县区党政机关既是工作机构，又是战斗武装，少而精，机动灵活地打游击战。

1942 年，日军曾三次对滕峰边区进行大“扫荡”。全县军民以“游击战”“麻雀战”袭扰敌人，开展反“扫荡”斗争。县委按照党中央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方针，领导县大队、区中队与敌人周旋。各区的民兵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掩护群众转移，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根据地军民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打得日军晕头转向、疲惫不堪，日军的三次“扫荡”均以失败而告终。

三、抗日模范村黄山涧

黄山涧村自 1939 年初便建立了党的基层支部和村自卫团武装。1940 年 2 月 22 日深夜，半湖伪据点日伪军纠集峨山口伪军总计四个连，配有机枪、手炮等武器，趁夜包围了黄山涧、南岭等五个村庄，于黎明前向村内发起攻击。黄山涧民兵在魏从堂、孙茂银、王维昌等人的率领下，英勇反击敌人。他们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反击日伪军的攻击。北庄区中队和苗庄、周村民兵闻讯后在田原杰队长率领下迅速前来增援。他们冲上龟山，控制了制高点。激战数小时，击毙日军队长和机枪射手，余敌调头逃窜，黄山涧民兵一直追到马山后的西山坡。

1942 年 5 月，铁山沟伪据点之敌联合枣庄、峰县城等处日伪军进山“扫荡”。黄山涧民兵积极配合滕峰边县大队在巨山前设伏，当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后，一举将其击溃，毙伤日伪军 10 人，缴获马大盖步枪 12 支。

1943 年 5 月，黄山涧民兵与县大队、区中队配合主力一部，端掉了枣庄至费县公路上的铁山沟伪乡公所，活捉伪乡长

吕守忠以下数十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使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向南又扩大了五公里。

1945年2月，敌人为了报复黄山涧民兵，纠集了枣庄、税郭、郭里集等据点日伪军500余人，在伪军司令王继美的带领下，夜袭黄山涧、南岭和龟山西村。民兵队长孙茂银和魏从堂等人率队奋勇反击。双山县大队派李连长率队前来增援。终因寡不敌众，李连长等3人牺牲，敌人冲进大小土门，肆意烧杀抢掠，一时火光四起，硝烟滚滚。稍后，敌人又向黄山涧推进。黄山涧民兵利用村子的围墙作掩护，对日伪军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敌人损失惨重。后来，敌人调来山炮，连发数炮，轰倒围墙，冲入村里。黄山涧民兵同敌人展开了巷战，他们运用熟悉的地形地物，给敌人以大量的杀伤。黄山涧民兵和全村抗日群众与日伪军激战16小时，最后在县大队、区中队和周村、南岭、苗庄、哨里等处民兵的增援下，终于将日伪军赶走，毙伤敌数十人，并收复了龟山西村。民兵队长孙茂银及部分民兵在战斗中牺牲。事后，黄山涧村被县委、县政府授予“抗日模范村”光荣称号，并被延安新华社誉为“民兵抗战的楷模”。

第十章

战胜严重困难 扭转抗战局面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枣庄人民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枣庄地区党组织领导广大军民,密切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日伪“扫荡”,继续开展反对顽固派摩擦斗争,在敌伪顽夹击中艰难求生。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成功渡过了抗战艰难阶段。

第一节 枣庄地区出现严重困难局面

日本侵略者从1941年起改变侵华计划,集中侵华日军总兵力的半数、伪军的大部,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和“蚕食”。日军特别把华北作为“强化治安”的重点。2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上任伊始,就发布命令,要求“必须在四个月内彻底消灭华北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并重新制订了进攻八路军的办法,彻底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密切结合的“总力

战”，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特别重视对共产党、八路军实行政治进攻。日本侵略者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沦陷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对沦陷区，普遍加强汉奸伪组织的力量，强化基层的保甲制度，扩大警察特务组织，对一切抗日活动严加镇压；大肆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加紧对人民的征敛搜刮；广泛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骗，等等。对游击区，主要采取“蚕食”手段，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隔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随着军事推进，逐步扶持日伪组织，将在沦陷区的一套做法逐步在这些地区推行。对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极端野蛮残忍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进行普遍而严密的分割封锁。从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初，正当日伪军集中兵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之时，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在皖南大举进攻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在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曲线救国”的反动谬论，指使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队纷纷投降日军，配合日军向抗日根据地进

攻。国民党顽固派还大肆扶植反动地主武装和土匪武装，制造摩擦，“蚕食”抗日根据地，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伪顽合流夹击之中，处境十分艰难。

在山东，日军采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方式，进攻抗日根据地。1942年，日军在山东及其周围的兵力由1940年底的3.6万人增至4.7万人；伪军在山东的总人数由1940年底的8万人激增至16万人；日伪军在山东的据点由1940年底的1156个增至3700多个。此时，日伪军几乎控制了全部公路，他们通过占领公路、据点等，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随着抗日战争困难局面的出现，山东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同日军互相勾结，一部分公开投敌，变成伪军，与日军一起“扫荡”“蚕食”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所谓的“三月攻势”。1941年、1942年的两年间，山东连续遭受罕见的旱灾和蝗灾，加之敌人的破坏，人民群众的抗灾能力极弱，根据地出现严重灾荒。在日伪顽夹击和自然天灾之下，山东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到1942年底，面积较1940年缩小三分之一，人口由1940年的1200万减至750万，八路军人数较1940年减少四分之一。

在枣庄地区，除了面临全国和山东同样的困难局面外，第

一一五师主力奉命撤离鲁南，北移至鲁中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及山东纵队一起活动，导致枣庄抗战形势更加困难。

1940年5月，日军于大“扫荡”后，在滕县以东的山亭、文王峪等地安设据点，滕峰边一度被侵占。7月，费县固口山区、临费边落入顽固派手中。10月，日军“扫荡”峰南及沂河以西地区，运河南北两岸及郯马部分地区亦被侵占。至年底，鲁南根据地已经缩小了四分之一。1941年，除顽固派联合东北军连续进攻抱犊崮山区、天宝山区外，日军继续“蚕食”，于4月“蚕食”了临郯邳边区和微山湖东岸，7月又“蚕食”了苍马地区，年底打通了滋（阳）临（沂）、台（儿庄）潍（县）两公路后，鲁南根据地较1940年缩小了一半，形势更加紧张。1941年底，鲁南区日伪据点达441处，较1940年增加179处，全区平均每12个村庄即有一个日伪据点。抱犊崮东南的根据地中心区被压缩得只剩下十余个村庄，致使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落入“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的境地。1943年一二月份，日伪军继续深入抱犊崮山区安设据点，修筑公路，以梁邱为中心，先后打通了费县、城前（邹县以东）、埠阳（抱犊崮东南）等地的几条公路，还企图打通到枣庄的公路。这时鲁南根据地已被分割成费（县）南、邹东、滕峰边、边联县东部、

边联县西部等互不相连的五小块地区，根据地基本区人口降至12.5万，村庄不足500个。

因敌人频繁、残酷的“扫荡”和大规模的“蚕食”、封锁，加之国民党顽军夹击和连续三年旱灾、蝗灾，鲁南抗日军队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困难，财政经济、军需民生都极为艰难。在春荒时，上至鲁南区党委书记赵搏、鲁南军区司令张光中，下到普通战士，都是以少量的高粱、玉米、地瓜干混合米糠、地瓜秧、树叶、草根充饥。因缺少油、盐和基本食粮，干部战士体质普遍下降，许多人患夜盲症，战斗力大为减弱。冬季，军队不能及时穿上棉衣，天热了又没单衣替换。被服、军械、弹药、医药等都极端缺乏。因战斗频繁，环境险恶，干部战士经常裹衣而眠、住无定所，饥寒、疲劳、困乏、伤病交加，致使非战斗减员大量增加。据1943年春统计，鲁南八路军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不足4000人，而日伪顽军总数多达4.4万人，由此可见当时鲁南抗战艰苦的情景。

第二节 枣庄军民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

面对抗战困难的局面，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坚持敌后抗战，坚决保卫根据地。而保卫根据地，不能单纯防御，要深入边沿区、敌占区，开展

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对敌斗争。在斗争方式上，应当既有军事打击，又有政治攻势；既要政治攻势为主，又要以游击战为核心；既要公开斗争，又要隐蔽斗争；既要使敌人处处遭到打击，又要灵活机动，使敌人摸不到活动规律。要造成敌人后方极大的不稳，使敌人不得不回头巩固其后方，以至放弃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进攻，这样才能达到保卫根据地的目的。

一、反“扫荡”斗争

枣庄地区各县党组织亦根据鲁南区党委的指示，在敌占区，把身份公开的党员干部调回山里根据地，留下没有暴露身份的精干人员组成地下党支部，坚持长期斗争；在游击区，整顿武装，充实干部，开展游击战争，反击日伪顽的“扫荡”；在根据地，各县领导深入第一线开展工作，巩固发展抗日力量，县委各部门领导人下放到区任职，领导开展对敌斗争。枣庄地区各级党政还按照上级的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要求及“开展广泛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县、区武装和武工队组织广大民兵，灵活地运用麻雀战、地雷战等战术，开展反“扫荡”斗争，保卫根据地。鲁南军区独立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拔除敌伪据点6处，解放村

庄 50 余个，拆除山亭南北封锁墙 50 余里。其他各地民兵、游击小组也在临枣路、城（前）桑（村）路上展开大破袭，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1941 年 4 月中旬，徐州一带的日伪军 3000 余人“扫荡”临邳地区，返回途中，又纠集峰县、枣庄、韩庄、贾汪等处的日伪军，在台儿庄集结，而后兵分五路向八路军运河支队驻地北许阳一带进行“扫荡”。此时，不足 300 人的运河支队派出参谋长胡大勋到离北许阳仅数里之隔的苑河村韩治隆部驻地，联系协同反“扫荡”问题。韩治隆表示愿意同运河支队协同作战，愿担负主要方向的阻击任务。运河支队负责阻击东西两侧的敌人。

第二天拂晓，枣庄、峰县之日伪军迅速占领北许阳村北的山头。驻扎在这里的韩治隆部一个营由于麻痹大意，未料到敌人这么早就进攻，故未及抵抗就让日军从山头上压下来。涧头集日军在伪军龙希贞部配合下，早饭后从张塘向南运动时，突遭运河支队主力的截击。运河支队毙俘日伪军数十人，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20 余支。日伪军残部逃回涧头集据点。另一路由台儿庄进犯北许阳的日伪军在途经黑山口时，被运河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胡大毅率领的第八中队伏击。此时天还未亮，

敌人在黑暗中突遭打击，便失去了指挥，乱作一团，溃不成军，死伤一片。直到天明，日军指挥官才把残兵集合起来。这时，胡大毅早已率部安全转移。进犯杨家埠的韩庄日伪军因行动迟缓，早饭后才抵达目的地。峰南县第四区中队稍微阻击一下便迅速转移至安全地带。

日伪军五路合击北许阳根据地的“扫荡”计划被运河支队巧妙地粉碎了。在反“扫荡”中，计毙伤日伪军 100 余人，缴获步枪等武器一批，除韩治隆部伤亡数十人外，运河支队无一人伤亡。

1941 年 6 月，日伪军从台儿庄、韩庄和涧头集据点出动 2000 余人，再次向黄邱山套“扫荡”。峰南县委、县政府和运河支队为避敌锋芒，一边按预定计划及时撤离北许阳和旺庄一带，一边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埋藏刚收获的小麦。日伪军在北许阳扑了空后，便分兵四处抢掠粮食、家畜、家禽等，并抓捕群众，强迫他们为其伐木、筑寨、修工事。“扫荡”4 天后，日伪军决定把抢来的粮食、物资用十几辆牛车运往涧头集和古邵据点，然后待机外运。运河支队连夜在旺庄和涧头集之间的于沟设伏。第二天上午，伪军们押运着十几辆牛车，满载着抢来的猪羊及粮食，朝涧头集方向走去。待伪军进入运河支队伏

击圈后，战士们一齐开火，押送粮食的伪军被打得四散而逃，纷纷缴械投降。

8月初，日军纠集枣庄、峰县城、台儿庄等处日伪军2000余人，由伪峰县县长王徽文带路，向黄邱山套扑来，运河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褚思惠率第二中队在毛楼设伏，待日伪军走进伏击圈后，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日伪军突遭袭击，伤亡惨重，狼狈向涧头集据点逃窜。

9月初，峰南县委为了粉碎日军对黄邱山套根据地的围剿，同时为在运河北岸敌占区腹地建立游击区创造条件，决定开辟运北地区。运河支队决定采取南北对进的方式，让活动在微山湖地区的部队和运南部队同时隐蔽进入运北共同抗击敌人。日军发觉运河支队的部署后，急忙调集峰县城、台儿庄、古邵的日伪军1000余人，由东向西压过来，让韩庄、沙沟、临城的日军五六百人，由西向东行进，企图形成东西对进之势，把进入运北的部队吃掉。运河支队获悉日伪军行动情报后，通知南北两部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两路敌人扑空后，继续进行追击，在上郭家村与突围部队遭遇，双方展开战斗。战斗中，运河支队等部以很少伤亡的代价毙伤日伪军1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

二、反“蚕食”斗争

日伪军的“蚕食”侵犯，大多是先平原后山区，先边沿后腹地，以交通要道两侧、经济资源区和对其威胁较大的地区为重点，以伪军兵力为主，并大量使用特务分子。敌人“蚕食”的办法，一种是在边沿区逐步安设据点，由点到线，由线到面，进行伪化活动，变根据地为敌占区；另一种是“扫荡”之后，安设大量据点，企图使大片地区迅速伪化，实施所谓“跃进蚕食”。到1942年，敌伪已深入到抗日根据地腹地，并安设大量据点。

为更好地打击和牵制日军的“蚕食”推进，八路军鲁南主力部队派出小股主力，分散深入敌占区，和地方武装以及地方工作人员相互配合，抓住有利时机，不断发起反“蚕食”斗争，消灭日伪军，清除日伪据点，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

1942年3月，日军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向根据地进行“蚕食”，并在小山子、徐楼等地安设据点。当月中旬，韩庄、古邵、临城、涧头集等地日伪军1000余人倾巢而出，占领旺庄，强拉民夫1500余人抢修据点。为反击日伪军进攻，运河支队决定集中在微山湖地区和运南活动的主力部队对敌进行包围，在沂河支队第二大队的配合下发起对旺庄守敌的进

攻，迫使敌人突围逃窜。逃窜之敌途经库山时遭到运河支队伏击，伤亡惨重。沂河支队第二大队又配合运河支队攻打新庄，重创日军。

滕峰边的柳泉、磨泉位于根据地的腹部，日军在那里安设据点，与南部的天喜庄日伪据点、西部的国民党顽军刘玉华团相互勾结，形成犄角之势。滕峰边县委派田中香、田厚玉等到据点周围活动，发动群众，侦察敌情。经过一段时间，与一部分伪军建立了联系。4月下旬，张光中率军区特务团攻打柳泉、磨泉据点，区中队当向导，穆林带领县大队在磨泉西边山上打援，成功地歼俘日伪军数十人，并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柳泉、磨泉战斗后，残敌逃向南山和枣庄等地，刘玉华团也后退到30里外的岩底一带。部队乘胜向西推进，扩大战果，夺回花山头以西的村庄，使游击区向西南扩展到张庄、田庄、岩底、滴水一带。

1942年7月，日军开始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枣庄地区军民采取了罗荣桓提出的“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将主力配置在边沿区，掌握有利时机，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以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强大的政治攻势反击敌人。

为反击日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942年秋，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指挥第三团、第五团、费滕独立营、双山县大队、鲁南铁道大队各一部，在枣庄北部发起围攻抱犊崮山区中心日伪据点天喜庄战斗。经一天激战，攻克天喜庄伪据点。同时，拔除崖头伪据点。并于中秋节之夜武装袭击了半湖伪区公所，打掉了毛宅子伪军据点。这一连串的战斗，对伪顽势力震动很大。不久，庙南峪、文王峪伪乡长主动与双山县委建立了联系，表示愿为抗日出力。同时，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刘玉华部也通过有关人士疏通关系，表示愿与县委合作抗日。

除了采取军事斗争给予敌人坚决打击之外，被“蚕食”地区的地方武装和地方工作人员坚持原阵地，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持下，发动与组织群众，从政治上着手，对敌进行隐蔽斗争。在峰南县西南地区，首先选择几个党支部作为立足点，然后秘密发动群众，打入日伪军据点，开展工作，发展革命的两面人员和秘密联络员，从而有力地嵌入了这一重要地区。对日特和死心塌地的汉奸进行镇压，并以人民政府的名义公开其罪状，以达杀一儆百、清除敌爪牙之效。对一般的乡、村伪政权人员，用武力警告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办法，迫使他们为人民办事，并争取使之成为革命派。派遣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打入

敌伪政权、伪组织和伪军内部及日军的特务机关，获取情报，分化瓦解敌军，控制了许多伪政权、伪据点，并与之建立关系，使之明着应付敌人，暗中为八路军办事。还争取利用会道门，组织了一些灰色武装，以保护群众利益，免受日军的破坏。同时开展政治宣传攻势，通过散发宣传品、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和开展“唤子索夫”运动等，向伪军政人员进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教育，争取伪军反正，弃暗投明。据统计，1942年枣庄地区有许多伪军反正、伪联庄会解体。如日军在滕县一区建立了所谓“模范区”，宪兵特务来往频繁，宣抚班四处活动，他们除对群众进行奴化教育外，还通过伪区、乡政权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连保法”，并且不断向外“蚕食”。为彻底摧毁日伪军的“模范区”，鲁南铁道大队按照鲁南军区的指示，制定了具体行动方案，主要做法是：将武工队化整为零，分成短枪队、长枪队、宣传队和铁道队，深入到第一区的关村、卜庙等佃户村，在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各项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地下党员，建立秘密交通站。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坚决镇压，向日伪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首先把各碉堡内伪军的姓名、家庭住址摸清，然后进行“喊话”教育。并向他们作出三条规定：不准杀害老百姓和抢劫群众财产；不准袭击八路军

和逮捕他们的家属；不准阻止抗日武装通过铁路，并要保证其安全。通过上述工作，彻底摧毁了敌人的“模范区”，挫败了他们的“以华制华”的阴谋。

三、反封锁斗争

日伪军在对枣庄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蚕食”的同时，又采取了更加严密的封锁。他们的办法主要是利用铁路、公路为封锁干线，沿线密布据点分兵守备，然后扩大支线，向根据地穿插延伸，逐步构成封锁体系。在山区，敌利用山口要隘、制高点，修筑环山碉堡、环山公路，在有些地区还构筑封锁沟墙，以阻断根据地山区与平原的联系。在平原地区，敌以据点、碉堡为支点，构成纵横交织的公路网，并沿点线修筑封锁沟墙，将平原抗日根据地分割成“格子网”。敌人还利用河流等天然障碍对根据地进行封锁。日伪军除进行封锁外，还在封锁线附近地区组织“爱护村”，强化伪政权和伪组织，强迫群众组织“护路队”，以加强封锁和保护其交通线。敌人在实行军事封锁的同时，还实行经济封锁。敌人一面在其占领区实行配给制，推行计口售粮、售物，强征工商税、地捐等各种苛捐杂税，加紧对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和其他物资的掠夺，禁止这些物资进入根据地，实行垄断贸易，控制市场，禁

止边币（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通行的货币是北海币）流通；一面对根据地大肆进行烧杀抢掠和破坏，抓捕壮丁，抛投大量伪币、法币及伪造的北海币，妄图从经济上钳制根据地，摧毁抗日军民的抗战意志。

为打破日伪军的军事、经济封锁，枣庄地区党组织在鲁南区党委领导下，带领人民群众采取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各种灵活有效的斗争方式，与日伪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日伪军建立据点、碉堡时，白天日伪军抓夫，强迫民工挖沟筑墙，枣庄党组织则动员群众疏散转移，避免被抓，或消极怠工，应付日伪军，或枪击袭扰监工的伪军，惊散民工。夜晚，军队和民兵则包围据点的敌人，组织群众填沟破坏建筑。如 1942 年冬，日军集中一部分兵力在大北庄村的东山、双山涧村的南山、十里河村的东山修建碉堡。碉堡之间挖沟筑墙，企图封锁围困根据地军民的活动。为了粉碎敌人阴谋，县委动员群众展开斗争。敌人白天修碉堡、筑封锁墙，县委夜间派部队包围敌据点，进行破坏。经过 20 多天的斗争，打死打伤日军和伪军数名，俘虏伪军 2 名，使日伪在此修碉堡的企图完全落空。

为打破日伪军的经济封锁，枣庄地方党组织还派武装宣传队到敌占区和游击区展开政治宣传，揭露日伪利用实行配给制进行经济掠夺和经济封锁的阴谋，开展对敌斗争。敌占区群众以掩藏粮食、少报地亩和产量等办法使日伪军抢粮计划无法进行。有的村庄在送粮前，密告八路军前去截粮，或者把粮食藏起来，然后向日伪军报告说“粮食叫八路截去了”，使日伪得不到粮食供给、抢不到物资、抓不到壮丁。中共党组织还派遣地下工作人员，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区秘密购进军火、医药和通信器材等物资。在与敌占区的人民建立一定的贸易关系后，组织商人小贩向抗日根据地大量输入军需物资。在根据地内，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金融和市场，稳定物价，打击伪钞，限制法币，提高北海币信誉，加强内外贸易，执行正确的商业政策，严禁粮、棉、油等民用军需物资流入敌占区。在夏、秋收获季节，组织部队武装保护群众麦收、秋收，号召并组织群众快收、快打、快藏，迅速完成公粮的征收和分散掩藏，打击日伪武装掠夺和利用奸商套购根据地物资的活动。在春荒时节，组织生产自救，开展向富户借粮运动，对遭受日伪军“扫荡”摧残严重的地区，抗日民主政府发放救济粮款，并组织边区的人民相互捐助，而且千方百计地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创办

小型工厂、商店、供销社，促进生产的发展。

第三节 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

1941年2月，临郯费峰四县边联抗日民主政府经选举产生，狄井芑当选为县长，盛清沂当选为参议长。边联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却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和嫉恨。他们暗中勾结日军，伺机消灭新生的抗日政权。这时，鲁南山区正遇特大春荒，军民生活都十分困难。为渡过春荒，二三月间，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先后由四县边区转移到苍马地区，鲁南专区由四县边区转移到邹东地区。留在四县边区坚持斗争的仅剩边联县县、区工作人员和县大队、民兵自卫团。国民党东北军中的顽固派及当地的顽军见有机可乘，于是先后制造了三次流血事件，被人们称为鲁南“三大事变”。

“四二五事变”

1941年3月，日军第一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新的剿灭措施：（一）烧毁根据地设施；（二）采取蘑菇战、咬住不放，或者夜间和拂晓前突然袭击等战术；（三）组成特种突击队，以对付八路军指挥机关；（四）利用在“扫荡”中

新挖的封锁壕沟，划定势力范围，继续向外扩展；（五）加强经济封锁。4月，国民党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第三四二旅第六八三团团团长张本枝部，为配合日军推行的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纠集地方顽军王洪九、李以锦部共2000余人，大举进攻四县边联地区。25日拂晓，边联县委正准备转移，顽军第六八三团突然从北、东两面逼进县政府驻地，哨兵发觉，鸣枪报警，县委书记邸励、县长狄井芑指挥警卫排和机关干部，边打边撤向南突出重围，撤到青山套。与此同时，全县六个区公所和驻边联县的鲁南所有后方机关全部遭到顽军袭击。突围中，县委宣传部部长马驰等十几人牺牲。顽军侵占边联县全境后，大肆烧杀破坏，在九女山一带活埋地方干部群众70多人，八路军边联支队司令员万春圃的一子一女也被张本枝抓去，第一一五师后勤部的皮革厂、被服厂、修械厂的机器全部被抢走，顽军还劫走民兵枪支200余支。这就是“四二五事变”。此间，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惯匪刘桂堂也率部乘机侵入天宝山区，切断了费西北与邹滕边的联系，并积极配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截击八路军过往部队和人员。“四二五事变”后，日伪顽继续勾结起来向抗日武装进攻。5月8日，顽军张本枝部及李以锦部共6000人将驻南马口的费南第六区公所及

区中队包围，杀害干部、战士 40 余人，俘 30 余人，制造了“费南流血事件”。

“七二五事变”

1941 年 7 月初，日军第二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他们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进行长期“围剿”；修筑碉堡、公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随着日军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推行，同月 24 日，国民党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及刘桂堂、李以锦等部，又配合临沂、枣庄日军共计 3000 余人，分多路合击天宝山区的鲁南抗日武装。25 日拂晓，王洪九部化装成日军，乘八路军主力在天宝山区反击日军“扫荡”之机，再次侵入边联县，向鲁南军区驻地埭阳、鲁南专署驻地西白山发起进攻。虽经鲁南军区第五团奋力反击，但边联县一部驻地还是被顽军占领，军区、专署及边联县机关分别向抱犊崮山区转移。当边联县机关和警卫人员行至边联县西北的上村时，突然遭到埋伏在那里的第六八三团张本枝部的袭击。边联县机关人员和警卫人员与顽军短兵相接，因敌强我弱，部队边打边撤，直到云涧峪才摆脱了顽军的追击。战斗中有十几人伤亡、数十人被俘，这就是“七二五事变”。不久，边联县县委书记邸励到后方养病，后在反“扫荡”中牺牲。同年夏，国民党军第六

八三团张本枝部伙同刘桂堂、王洪九、李以锦、巩震寰部不断侵袭费南，并曾一度占领费南全县。

“银厂惨案”

“银厂惨案”发生在1941年10月27日。当时，国民党军第六八三团张本枝部驻九女山一带。八路军收复四县边联后，张本枝为了破坏鲁南区党政机关，经常组织小股部队到根据地武装侦察，抢掠财物，收买叛徒，布置坐探，刺探情报。靳家沙沟村的叛徒侯德俊就是被他们收买的其中之一。他曾参加过中共党组织在九女山举办的抗日训练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二五事变”后投靠张本枝。他经常化装成小贩混入根据地进行侦探。一次，他发现银厂村外松林内有不少学员正在上课，村内又有不少马匹和警卫人员，断定是鲁南区党政领导机关，便报告了张本枝。张本枝随即决定突袭银厂村，并通知王洪九部配合。

10月26日晚，鲁南区党委曾接到顽军可能“扫荡”的情报，也作了转移的准备，但未立即转移。27日凌晨3时，顽军千余人从北、西两面发起攻击，鲁南区党委仅有的警卫连三个班分路阻击，掩护区党委机关人员向东突围。村东面的三个门，有两个大门锁着，许多人从围墙上翻越而出。因情况紧急，

后面的人员便集体推倒围墙冲了出去。突围中，区党委组织科科长何玉田等7人牺牲，区党委宣传科科长蔡明等10余人被俘。

顽军火力很猛，军区警卫连三个班抵抗一阵便撤了下来。顽军冲开西门，用机枪封锁了赵搏的住宅。此前赵搏已带领两个警卫员、一个译电员，出南门向东突围。忽然，他想起机要秘书外出未归，装着机要文件的皮包没有带出，便毅然返回住处，将机密文件全部销毁。当烧完最后一页文件再突围时，顽军已冲入室内，赵搏等10余人被俘，随即被押解到九女山张本枝的团部。

顽军对赵搏先引诱劝降，后施以酷刑，逼其屈服。赵搏大义凛然，至死不屈，怒斥顽军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勾结日军进攻八路军的罪行，把法庭变成了宣传抗日、宣传革命的讲坛。

11月13日夜，顽军在阴谋屡遭挫败后决定将赵搏活埋。临刑前，赵搏从容不迫地对行刑的国民党士兵说：“现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已感到人力、财力和物力不足，不得不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渡过暂时的困难，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人民的……日军还占领着我们的国土，蹂躏着我们的同胞，我没有

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死在反共卖国的中国人手里，这使我终身遗恨，死不瞑目。请记住：中国人民是杀不绝的，死了我一个，会有千千万万人站起来。抗战一定能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英勇就义。同时遇难的还有当地群众领袖、边联县农救会长杨青法、民主人士许善修等 20 余人。赵搏的讲话打动了国民党士兵的心，随之一个连队溃逃。

二、配合反击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入鲁反共

1942 年底，蒋介石为扩大在山东的势力，达到在敌后建立反共基地的目的，命令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组成二十八集团军由皖北入鲁，接替反共不力的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的职务。由于徐州以南、以东地区日伪军封锁严密，不易通过，而湖西、鲁西南地区有大批地方顽军盘踞，可作跳板，故李仙洲部假道湖西、鲁西南东去鲁南，并妄图乘势驱逐两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使该地成为其永久的交通要道。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于 1943 年 1 月 27 日发出《关于李仙洲部来鲁后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对李仙洲的对策是强调疏通，团结为主，鼓励与推动他们抗日。对其非友好的行为，多用政治斗争。非到不得已，勿轻易反击。鲁南

区党委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地作好准备，欢迎李仙洲部入鲁抗日。

但李仙洲部秉承蒋介石“先歼匪而后敌伪”的反动方针，将抗日军民的友好欢迎视为软弱可欺，每到一地即驱逐杀害抗日军民。1943年3月初，李仙洲部第一四二师副师长牛乐亭率该师第四二六团进入滕峰边区的良子口村，不但不接受鲁南抗日军民的欢迎，反而袭击区中队和民兵，继而攻占驻辛召一带的鲁南军区后勤机关，抢掠物资，捕杀村干部、民兵和抗日群众。3月11日，鲁南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少庸到达滕峰边，派民主人士陈正寅以双山县政府、县大队名义到第一四二师师部慰问，再次遭到拒绝。为此，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和区党委代理书记张雨帆率领第三团主力和费滕边独立营，在三山顶一带被迫反击顽军。双山县委也选派主要负责干部进入顽占区，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地方武装和民兵全部占据山头，随时准备反击顽军。

顽军侵占滕峰边后，不断向北推进，和白彦日伪军遥相呼应，对抗日军民形成夹击之势。为摆脱困境，鲁南军区派第三团第一连夜袭米山顶顽军，给其较大杀伤。15日，顽军进攻阳泉，双山县大队及辛召、徐庄、北庄、岩底四个区中队奋勇

反击，又消灭顽军一部。

4月上旬，鲁南军区第五团在上村阻击顽军进攻，毙顽军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多支、小炮1门，顽军败退徐庄。数日后，李仙洲部第一四二师进攻吴家沟，军区第五团与双山县大队联合进行阻击。顽军损失惨重，狼狈逃窜到徐庄、辛召一带。

为了统一指挥赵钭、双山两县委军事力量共同反击顽军的进攻，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魏思文于4月15日到达赵钭县，召开了军区第五团、赵钭县、双山县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边联中心县委，第五团政治委员王六生兼任边联中心县县委书记，吕志先任赵钭县县委书记，穆林任边联中心县县委副书记兼边西工委书记。同时，传达了区党委指示，明确了指导思想，对第二十八集团军入鲁反共要以武装反击为主，阻止其北犯。

4月中旬，李仙洲部第一四二师师长刘春霖率该师第四二五团由湖西东进鲁南。不久，刘春霖师另一个团进入鲁南，与牛乐亭所率的第四二六团汇合。第一四二师勾结惯匪刘桂堂部、地方顽军申宪武部等，再次向鲁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先后占领白彦、山亭、大炉等地，杀害抗日干部、群众，叫嚣“先打八路，后打鬼子”“共产党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企图

先控制鲁南，再北上鲁中。

面对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八路军站在自卫立场上进行坚决反击。5月4日，山东军区命令鲁南部队：对天宝山地区不能再退，要在自卫的原则下集中相当力量歼灭来犯顽军，不打则已，打必打疼。同时，山东军区决定从鲁中军区抽调一个团南下，归鲁南军区指挥。八路军部队为阻止顽军北上，在天宝山和蒙山设下两道防线。

6月初，顽军第一四二师到赵钭县抢粮，在荆山口受到军区第五团的顽强阻击，顽军虽多次冲锋，均被打退。在战斗中，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治委员王麓水亲自指挥第五团、军区特务连和3个县大队，给敌以重大杀伤，狠狠地打击了顽军的嚣张气焰。战斗从清晨持续到黄昏，第五团乘胜出击，顽军全线溃退。战斗期间，土顽梁钟亭曾派一个营携带大批物资慰劳第一四二师，鲁南军区第三团在簸箕掌一带进行截击，大获全胜，俘顽军200余人，缴获大批物资，第三团无一伤亡。

从6月21日开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司令员杨得志率领下，在湖西发起了大规模反击李仙洲部战役。经50天激战，歼灭第二十八集团军大部和湖西国民党顽军一部。8月10日，李仙洲率残部从湖西逃往皖北。鲁南部队也在张光中、王麓水

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向进犯费南根据地的顽军第一四二师进行猛烈反击。8月13日，鲁南军区第三团以精干部队设伏于松林，待顽军北犯通过时，突然发起攻击，将行进中的第一四二师指挥部打乱，击伤师长刘春霖，余敌慌乱逃窜至四开山区。鲁南军区乘敌溃乱之机，先后组织第三团5个连、第五团2个连、尼山独立营2个连和军区特务连共10个连队，于8月17日采取奇袭战术，分三路向四开山顽军发起进攻。顽军当晚占据桃花山，第三团迂回攻占黄山后，又向滴水涯发起猛攻。桃花山顽军遂向滋临公路以北撤退，第三团乘胜追击，于四平庄截击第一四二师第四二五团，俘团长以下300余人。顽军余部窜至滋临路北，又遭鲁中部队打击。29日，尼山独立营又在立山庄冒雨设伏，毙伤顽军153人，俘237人。9月，顽军残部800余人在刘桂堂部接应下逃往津浦路西。至此，反击李仙洲部入鲁战役取得彻底胜利。

第四节 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斗争

为了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教育团结敌占区人民，争取和瓦解日伪军、伪组织，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从1941年10月开始，就从党政军各部门抽调了一批政治坚定、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人员，组成有较强战斗力的

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采用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开展对敌斗争。武工队在行动上采取高度分散的战术，昼伏夜出，行踪不定，力求隐蔽。战斗时机动灵活，打完即走，使敌人找不到行踪。当武工队在某一地区站住脚跟后，八路军小部队随即进入，支援武工队活动，扩大对敌斗争规模。1942年，除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组织的武工队外，枣庄地区党组织也相应组织了武工队，武工队的活动空前活跃。

1943年6月，中共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针对当时的对敌斗争情况，在总结了以往各地武工队对敌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经验的的基础上，决定在军区建立武工队领导机构，加强对武工队的领导。抽调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明桃任军区武工队总队长，区党委城工部部长王少庸兼任军区武工队总队政治委员。城工部和武工总队机关合署工作。在总队部工作的除原城市工作科科长丁平和干事聂桂田外，又调来冯克玉、刘金鼎、高原等人。总队下辖微滕、临枣、兗济和兰西武工队，队长、副队长分别由宋献璋、鲁周、王俊清、高照民、王玉林、王芎南、郑惕、亓安昌等担任。

鲁南地区的武工队主要在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开展对敌斗

争。他们身穿便衣，腰藏短枪，以合法职业作掩护建立立足点，利用社会关系在敌占区进行隐蔽活动，积极了解社会情况和敌伪情况，组织和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打击和钳制敌人的“蚕食”，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分化、瓦解敌伪顽反动势力，争取抗日力量，以突袭的方式打击敌伪顽军据点。通过一系列的对敌斗争，在敌占区群众不断觉悟的基础上，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然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向外发展。

临枣武工队在军区武工总队的领导下，自1943年夏出山之后，活跃在临城至枣庄铁路支线两旁，同鲁南铁道大队、峰县大队密切配合，战绩突出。在一个隆冬的黄昏，武工队队长王俊清率队员褚思珍、黄敬让等在县大队刘钢连的配合下，巧妙地进入伪邹坞乡公所，轻松地迫使20余名伪军缴枪，击毙伪乡长王子绍，临走时放火烧了伪乡公所。待日军前去增援时，武工队及峰县大队早已不见踪影。

临枣武工队第二次战斗是打掉了齐村的“钻眼”。武工队住在临枣铁路南侧的永安夏庄村联络员王玉成家时，据其介绍，日军为掠夺枣庄煤炭资源，在枣庄周围设了很多钻井队，每个钻井队都有日军和伪军警卫。齐村钻井队驻有5名日军、30名伪军和2名日本工程师。伪军中有一名叫吴宝富的永安

人，家境贫寒，而且干伪军时间不到一个月。武工队按照王玉成的介绍，很快将吴宝富捉来，经教育后放回。半个月后，吴宝富主动向武工队报告齐村钻井队日伪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并提出愿意协助打掉齐村钻井队。一天晚上，临枣武工队和峰县大队一个班从天生桥村出发，由吴宝富担当向导，抵达齐村钻井队附近，首先由队员刘炳南、褚思珍生擒了2名伪军岗哨，接着发出信号，部队冲上来，迅速进入日伪军居住的屋内，击毙了5名日军，活捉了2名日本工程师和30余名伪军，缴获步枪35支、机枪1挺、掷弹筒1个和子弹数千发以及自行车1辆。

1943年隆冬的一天，永安地下交通员马文法获悉枣庄日伪军第二天要到临枣铁路南侧几个村庄抢粮，马上报告给武工队。第二天拂晓，武工队和峰县大队一部在香城村北设伏，击毙了作恶多端的伪军头子郭万有，俘伪军20余名，使日伪军的抢粮计划彻底破灭。时隔不久，武工队经过多方侦察，没费一枪一弹，全歼了十里泉日军据点山阴保安队队长李培勤以下32人。从此，临枣武工队在枣庄地区声威大振。

兰西武工队是由鲁南军区第五团一部和兰陵县第三区中队合编而成的。他们在正副队长王芑南、郑惕和正副政治委员

郝维实、郭仲选率领下，活动于枣庄东部的新兴、黄山屯和郭里集一带，负责做伪军和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例如，石城固伪据点的伪军副大队长王怀芝被武工队争取之后，为武工队提供了许多敌伪情报，敌人多次“扫荡”都惨遭失败。王怀芝因病去逝后，伪军内部分裂，兰西武工队在军区第五团第四大队配合下，立即拔除了这个据点，俘全部伪军。不久，峰县城日军又派了一个分队和 200 名伪军再次占领石城固并安插了据点，兰西武工队不断袭扰，不到两个月，日伪军怕再遭全歼，便连夜撤走，石城固被收复。

微滕武工队由正副队长宋献璋、鲁周率领范有功和岳岱衡等 10 余名队员，活动于滕县津浦铁路以西至微山湖一带。他们在搞好上层统战关系和维护好地方治安的同时，镇压了残害抗日干部、欺压百姓的叛徒、汉奸、特务、伪乡长等，还配合滕沛县大队先后拔除了多处日伪据点。

另外，鲁南军区还于 1943 年夏组建了一支由军区营、连、排干部和第一一五师民运部工作人员组成的武工队，队长亓安昌、政治委员靳怀刚，在邹滕东部边沿区开展活动。该武工队分为四个小组，主要活动地区为：毕秀山小组在冯卯、城头一带，韩成钧小组在桑村一带，朱英小组在仓沟、王井一带，张

西池小组在津浦路西部的鲍沟一带。后来这些小组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战斗力不断提高，在以上地区相继拔除了许多日伪顽据点。

保卫麦收，挫败日伪顽军的抢粮计划是武工队和游击队又一重大功绩。1943年5月，微山湖区的小麦呈现一派丰收景象。这是湖区抗日军民战胜种种困难、辛勤劳作的成果。驻沛、滕两县的日伪军却强令区、乡、保长进行征粮，以达到“以战养战”和经济封锁抗日军民的双重目的。驻湖区的国民党顽军申宪武部、冯子固部先后下令征收麦子，并准备抢粮。为了粉碎日伪顽的抢粮计划，保卫湖区群众的利益和解决抗日根据地粮食供给困难问题，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决定在麦收之前搞一次“武装大请客”，即把运北、临城、夏镇等沿湖一带的伪区、乡、保长武装“请”到鲁南山区，使敌人失去耳目，结合武装斗争，粉碎其征粮计划。根据区党委的决定，以武工队、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队为主，湖区党政军民统一联合行动，文“请”为主，武“请”辅之。运北由文峰大队负责，临城、沙沟铁路沿线由鲁南铁道大队负责，张汪、欢城由鲁南军区武工队负责，夏镇、傅村一带由微湖大队负责。几支武装同时行动，一夜之间，将伪警备大队长、伪警察局长、伪区、乡、保

长、叛徒、汉奸等 110 多人全部“请”到鲁南抱犊崮山区根据地。这批“客人”经一个多月的教育后，除罪大恶极的夏镇伪警备大队大队长张德普、伪乡长朱恒森、伪区长朱继广 3 人被镇压外，其余全部放回。这些人回来后，有的洗手不干了，有的是“明保曹操，暗通汉室”了。沿湖地区的伪政权经过这次打击，基本上被摧垮了，为湖区抗日斗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节 开展敌占区城市地下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枣庄城市地下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 1938 年 3 月至 1942 年 3 月为第一阶段。台儿庄大战后，枣庄地区沦为敌后，鲁南中心县委由枣庄市区撤往山区，除积极配合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组建抗日武装、举行鲁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外，相继派人到枣庄、峰县城、齐村、韩庄等城镇建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以宣传抗日救国、搜集情报、里应外合打击日伪势力、支援根据地建设等任务为主的地下斗争。

1938 年 6 月，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领导派孙继德打入峰县城伪警察局任二等巡官。他不断将日伪军在峰县城的兵力布防等情报送往山区，并于 1939 年 7 月 25 日，配合义勇总队成功袭击了峰县城日伪军，尔后随部队安全撤出。

1938年冬，峰县县委派张捷三进入峰县城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4月建立了峰县城市工作支部，张捷三任书记，张逸轩任副书记。11月，张捷三调峰县县政府任职，张逸轩接任书记。为适应工作需要，不久，该支部划归第一一五师情报科领导，情报科将其改建为峰县城区工作委员会，张逸轩任书记。1940年10月，城区工委在县城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时，被敌人发觉。为保存革命力量，工委书记张逸轩和部分成员先后转移到外地，工委遂停止活动。1942年初，张逸轩返回根据地。正当党组织准备派他恢复枣庄地下工作网时，适逢日军大“扫荡”，张逸轩在反“扫荡”中负伤后不幸牺牲。

1938年10月，义勇总队派洪振海、王志胜到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两次血洗“洋行”，打击了日伪特务机关。1938年夏，枣庄矿区党委书记王明增率领一部分工人潜回矿区，不久建立了枣庄地下矿区工委，王明增任书记。工委利用矿工在井下作业需要雷管炸药的条件，将火药秘密带出煤矿，送往山区，装备军队。1939年12月，王明增在去山区汇报工作途中与日军遭遇，不幸被捕，后被敌人杀害于济南，地下工委遭到破坏。1939年8月，鲁南特委社会部派鹿广连、马平、李康、史天放等进入枣庄市区，建立了两个地下党支部，鹿广连、史

天放分别任书记，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搜集情报工作。1940年初，鹿广连支部遭到破坏，鹿广连、马平等转移到山区。支部成员李康、郑毓林、赵德全以及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徐德兰（鹿广连的爱人）相继被捕惨遭杀害。上述地下工作者牺牲后，史天放支部也被迫停止了工作，支部成员转移到山区。

从1942年3月至1944年7月为第二阶段。1942年3月，鲁南区党委为贯彻中央及山东分局关于开展敌占区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决定在组织部内设点线工作科（1942年秋改为城工科）。至此，鲁南区城市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区党委总结了抗战以来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那种不讲究策略、过分暴露自己的错误做法，结合实际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在恢复和整顿原有地下党组织的基础上，充实完善了组织机构，使这一工作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1942年6月，鹿广连、刘金鼎、聂桂田、张福林、栗志成、张协、王翰秋等十余人由山东分局城工训练班学习结业被派到鲁南，从而充实加强了鲁南城市工作的干部力量。城工科初建时，除副科长丁平随区党委机关开展此项工作之外，还有峰南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允峙在运河地区的敌占区开展点线工作。1942年秋，又增加了聂桂田。城工科离开区党委机关，

转移到滕东上辛庄（今山亭区水泉乡）的小学校内。丁平以校长身份、聂桂田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在这个阶段，枣庄城市地下工作主要是建立两网（临城、运河工作网）两点（枣庄、峰县城工作点）一线（地下交通线）。

临城地下工作网

临城是苏北、鲁南的重要门户，也是联系枣庄、徐州的交通枢纽。鲁南区党委认为，为有效地开展枣庄、徐州的城市工作，应在临城及周围地区建立一个地下工作网。为此，区党委城工科除让鲁南铁道大队派到临城的地下党员程秉文继续以经商作掩护在原地坚持斗争外，1943年初又派张子善、宋安、徐广友等潜入临城开展工作。对其周围地区，城工科还先后派丁一到官桥，赵玉胜、王懋昌到沙沟，牛志远到利国驿，曹伯越到吕沟，王锡鸿到徐州，分别以不同职业作掩护住下来，形成了一个组织较为严密的地下工作网。这个工作网的负责人是鹿广连，联络员是刘金鼎。工作网的任务除搜集情报、购买物资、支援根据地建设外，还负责向枣庄、峰县城和徐州派遣地下工作人员，并注意侦察津浦铁路日军的兵力运输情况。

运河地下工作网

1943年初，根据鲁南区党委和罗荣桓要在运河区建立一

个地下县委、把地下党的工作交给秘密县委来管的指示，成立了峰南秘密县委，刘向一任书记，王磊任组织部部长，李益民任宣传部部长。刘向一潜伏在大庙一带以卖书、卖文具为掩护；王磊隐蔽在阴平瓦房村以卖油为掩护；李益民在铜东北李屋子村以小学教师身份作掩护。县委的主要任务是在运河南北建立、恢复地下党组织，全力支援根据地建设，领导敌占区人民开展抗日斗争。秘密县委成立后，在运南先后与刘岱、董曰耀、李凯、权兴周、权兴汉、杨春、杨华取得联系，建立了大庙、权台子、胡山子等基层地下党组织；在运北，王磊接替张允峙的工作，与张东明、孙景德、潘济民、金继本、潘存中等党员接上关系，并与阴平、二郎庙、石头楼、老汪崖等地下党支部取得联系，使党的地下工作网很快在运北铺开。4月，组织决定把王磊的爱人李芳也安排到前瓦房做地下工作。他们夫妻二人广泛接触群众，秘密发展党员，配合游击武装惩处特务、叛徒，做了大量工作。6月，丁平代表区党委来检查工作，听取了刘向一的汇报，传达了区党委要他们作长期打算的指示。9月，刘向一在巡视工作时与一名熟人相遇，为防止意外，上级立即调他返回根据地。王磊、李益民一直坚持到抗战形势好转才公开了身份。

枣庄矿区的地下斗争

城工科派张福林、栗志成夫妇参加兰西工委，隐蔽在秦泽甫的亲戚家中。张福林化装成小贩经常到枣庄与煤矿工人接头，布置任务。1943年夏，张福林被汉奸王继美逮捕后逃出，无法在该地继续活动，被调回。1942年秋，城工科对原齐村地下党支部进行了充实调整，派韩瑞廷到寨子小窑下井，并参加该支部。1943年5月，韩瑞廷因叛徒出卖被捕，支部书记党延生和王洪、张文廷转移到山区，该支部停止活动。1942年9月，城工科派张协进入枣庄市区，以拉黄包车作掩护开展工作。此时，双山县委敌工部部长邱焕文和张承等也派员打入枣庄矿区开展工作。1943年夏，张协通过关系到枣庄井下当矿工，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矿工，破坏采煤工作面，阻止敌人的生产计划。后张协因被叛徒发觉，在群众的掩护下，躲开敌人的搜捕，撤回山区。

峰县城的地下工作

1943年2月，刘金鼎利用关系将聂桂田派进峰县城伪县大队庞明学大队当文书，开展联络伪军、搜集情报、破坏敌人武器等工作，并搞出一些盖有伪县大队关防大印的空白信笺，供地下工作人员出入峰枣使用。9月，鹿广连在聂庄工作时被

日军包围，在突围战斗中牺牲。由于日军在鹿广连身上搜出了峰县地下党员名单和峰县伪县大队的空白信笺，为防不测，区党委立即派丁平到夏镇调整组织机构，改变工作程序，调马仲川接替刘金鼎。由于措施得当，除徐州地下党受到一定损失外，其他机构均未受到影响。峰县敌人追查空白信笺时，将一名伪县大队副官屈打成招，使聂桂田脱险。1944年聂因开展工作暴露身份，随即撤出。

从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为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鲁南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把敌占区城市工作提到与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地位的指示，以及山东分局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于1944年7月成立了城市工作部，王少庸任部长。原区党委组织部城工科划归城工部领导，丁平仍任城工科科长。城工部成立后，配合鲁南军区敌工科加强了对敌伪军的争取、瓦解工作。早在1942年冬，鲁南军区就成立了敌工科，曾文彬任科长。1944年，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相继建立了敌工股，各区县也建立了敌工站。敌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军事斗争，采取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孤立打击顽固反动分子，争取一些有民族气节的伪军和伪乡、保长，让其“身在曹营心在汉”，变一面政权为两面政权，变敌占区为游击区。采取的

工作方法是：（一）选派立场坚定、政治可靠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二）动员敌伪军家属做工作；（三）采取“武装大请客”的方式，根据敌工干部提供的敌伪人员名单，请部队配合，将敌伪人员“请”到山区，经过短期学习教育，除罪大恶极者处决外，其余人员放回。这不仅对麦收、秋收时防止敌人抢粮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争取了不少伪乡、保长，从而瓦解和动摇了日伪的基层政权。

10月，鲁南区党委在大邵庄召开城市工作会议，成立了第二铁路工委、第三铁路工委和徐州工委。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布置了今后任务，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的意见和措施。为贯彻中央里应外合的战略思想，也为收复枣庄、峄县、滕县、临城与交通要道作准备，区党委派出大批武装工作队，开展城市近郊的游击战，扩大解放区，缩紧根据地对敌占城市的包围，在城市近郊和交通要道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为配合武装斗争，城工部除了从根据地选派干部打入城市开展工作外，还从沦陷区秘密动员和选拔城市工人、学生和市民中的积极分子到根据地学习一段时间，再派回原地。这些人熟悉周围环境，有职业掩护，对敌占区的人际关系熟悉，有利于工作开展。但在选拔敌占区的人员到根据地学习时，有少量奸细和特务分子混

进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和捣乱。1944年10月，鲁南区党委成功破获了一起枣庄的日本特务案，此案是枣庄日军乘中共选派敌占区青年进根据地学习之机，派遣特务混入其中，企图破坏抗日党政军机关的案件。

1944年底，枣庄工委改称枣庄市委，1945年5月，枣庄办事处改称枣庄市政府。杜季伟任市委书记，张福林任副书记兼市长。委员有丛林、牛子春、庄玉铭、马平、邱焕文、张协、赵孝庭等。同时，区党委选拔枣庄籍的干部战士，组织了一支精干的武工队，活动在枣庄北郊，打击日伪顽匪反动势力，并负责枣庄城市地下党员的接送和联络工作。

1945年，为了接管城市和交通要道，鲁南区党委城工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对敌占城市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写出专门材料，为解放这些城市备用。枣庄市委、市政府与枣庄地下工作人员认真执行了城工部的这一指示，对枣庄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日伪军的驻防情况逐一进行侦察了解，很快写出约5万字的《枣庄情况类集》，为八路军、新四军攻克枣庄、消灭汉奸王继美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8月，日本宣布投降，峄县伪军一部逃往枣庄。聂桂田利用原来曾打进峄县认识伪军中队长孙敬臣的关系，奉命只身闯入孙敬臣家中，劝其弃暗投明，终于使

其率部战场起义，为部队攻打枣庄提供了方便。

8月22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日军投降，日伪军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日伪军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为贯彻这一指示，城市地下工作人员积极配合主力部队，相继解放了峯县、滕县、台儿庄、官桥等城镇，扫除了枣庄外围障碍，扩大了鲁南解放区。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党的城市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六节 建立苏鲁边区秘密交通线

全国抗战爆发后，枣庄既是日伪军华北、华中的结合部，又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鲁南、冀鲁豫、苏皖三大根据地的连接区，这里有一条由华中、华东跨越津浦铁路和微山湖通往延安的战略交通线。尽管这条交通线由于日伪顽的“蚕食”、封锁几度中断，但是在枣庄军民特别是运河支队、铁道大队、微湖大队以及临城、沙沟、茶棚一带党组织的努力下，刘少奇、陈毅、罗荣桓、朱瑞等许多党政干部都在这条交通线上安全通过。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枣庄抗日军民为保卫这条交通线、护送过往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抗战前，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就十分重视交通工作，曾派陶洪瀛、秦明道分别负责津浦铁路鲁南段东西两侧的交通和联络工作。抗战爆发后，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党中央与各战略区之间的联系日趋频繁，交通线愈显重要。抗战初期，山东党组织首先开辟了东从滨海到沂水，穿越鲁南，西越微山湖，经冀鲁豫、太行山到延安的交通线。另外，陇海路以南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也开辟了一条由徐州以南过津浦铁路，穿越皖苏，经冀鲁豫到延安的交通线。1941年5月，由于敌伪顽进攻，豫皖苏地区丧失，华中经过豫皖苏地区的交通线中断，只好改道徐州东由苏北过陇海铁路经过山东滨海、鲁南西去。此路曲折，敌伪封锁线较多。另一条则是由盐阜区乘船绕过连云港从海路到滨海登陆。这两条线路均风险较大。新四军三师参谋长彭雄等人就是乘船去滨海途中与日军遭遇牺牲的。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和抗日形势的变化，大批干部需要到延安学习，开辟一条方便安全的交通线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鲁南、湖西区党委的领导人一再指示枣庄城市地下党和在鲁南津浦铁路沿线及微山湖地区活动的游击

部队，要开辟一条通往延安的战略交通线。

为了开辟这条交通线，活动在津浦铁路沿线的鲁南铁道大队、微湖大队和运河支队等抗日武装对盘踞在交通线附近的敌伪顽反动势力展开了机智英勇的斗争。1942年6月，鲁南铁道大队进山整顿结束时，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亲切接见了他们，并鼓励他们返回后继续发动群众，瓦解敌伪军，尽快打通通往延安的战略交通线，一定要保护好过往干部的安全。鲁南铁道大队出山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工作，恢复了情报站、情报网，并通过详细侦察，集中兵力，在微湖大队的配合下，拔除了敌人安插在潘庄、郟山的伪据点，击毙了滕县第八区伪区长、叛徒殷华平，全歼两据点的伪军。鲁南铁道大队对敌人重新安插在津浦铁路两旁的伪据点及其下属的伪乡、保长，采取了“武装大请客”和记黑红点等措施，使他们明里是敌伪人员、暗里为铁道大队服务。鲁南铁道大队护送过往干部时，只要与沿途伪军据点打个招呼，伪军便不声不响地让其安全通过。

1942年7月，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受党中央的委托，在山东检查工作结束后去延安，途经鲁南时，教导第二旅旅长曾国华率领一个连队和鲁南铁道大队负责护送。到达微山湖边

后，负责接应的微湖大队用船只将刘少奇一行护送到大捐岛。在大捐岛休息期间，刘少奇先后接见了鲁南铁道大队政治委员杜季伟、大队长刘金山、副大队长王志胜，沛滕边县委书记张庆林，微湖大队大队长张新华等人。在听取了汇报后，刘少奇对微山湖区的工作作了五条指示：（一）湖上交通线是中央联系山东、华中的交通命脉，要千方百计保护好，使其畅通无阻；（二）当前敌强我弱，我军行动要慎重，不要过于刺激敌人；（三）要注意做好伪军工作，对那些尚有爱国之心的人要努力争取，在敌占区工作要讲究策略，该团结的一定要团结，该镇压的一定要镇压；（四）积极搞好根据地建设，有了根据地，就有了人有了粮，就站得住脚；（五）在敌占区，可以建些基点村，基点村要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坚强的党员骨干。尔后，曾国华和微湖大队护送刘少奇一行抵达湖西抗日根据地。刘少奇对中共湖西地委再次明确指示，要加强湖上交通线的建设，确保交通线的安全畅通。8月，为加强对微湖大队的领导，湖西地委遵照刘少奇的指示，派孙新民任微湖大队政治委员。孙新民和大队长张新华密切配合，为使湖上交通线畅通做了细致的工作。他们首先开展对驻守在战略交通要道夏镇一带的伪淮海省警备队尹洪兴团的工作，通过打入尹团的地下党员、军医

刘家廉和尹洪兴的师父张修业做说服工作，尹洪兴与微湖大队政治委员孙新民达成“互不干扰”的协议。尹洪兴撤掉了南庄附近的几个伪据点，使沛滕边根据地连成一片，开通了湖上交通线。

1942年8月初，文峰大队为打开津浦铁路以东的峰县运河北部地区的抗日局面，经过周密调查，先后镇压了日特孙景民、邵泽武等人，全歼土匪孙晋绪部，争取了流寇行为非常严重的地主武装薛永贵部。1943年春，他们按照鲁南区党委和峰南县委的指示，配合鲁南铁道大队将运北铁路沿线的一些伪乡、保长“请”到抱犊崮山区集训，收效很好。这些伪乡、保长被放回后，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如石庙伪乡长马景章被教育放回后，为八路军提供了大量的可靠情报。从此，以褚楼为中心的十多个村庄成为游击抗日根据地。这一地区的开辟为战略交通线在该地区畅通无阻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2年底，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调研员奚原奉命搜集整理徐州周围的日伪顽资料之后，在运河支队、文峰大队、鲁南铁道大队和微湖大队的积极配合下，又对华东、华中至延安战略交通线鲁南路段进行了实地考察。此后，新四军第四师侦察科科长罗惠廉又奉命率两名侦察兵，再次对这条战略交通线进

行了考察。他们一致认为，由华中经枣庄地区到华北至延安的这条交通线与西线（经西安）陆上路线和东线海上路线相比，不仅路途近，而且比较安全可靠。从此，这条秘密交通线就确定下来。

奚原在考察交通线的同时，感觉到峰南县党政机关和运河支队活动的黄邱套山区远离抱犊崮，中间被重重封锁线所阻，而距离新四军淮北区仅有几十华里，联系方便，便与峰南县和运河支队负责人纪华、朱道南、邵剑秋、刘向一等人商议，是否将峰南县和运河支队建制划归新四军淮北区。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峰南县党政军负责人的赞同。于是，他们便各自向上级领导汇报，申请峰南县委、县政府和运河支队改变归属问题。峰南县党政领导及运河支队负责人和奚原的报告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新四军方面的重视。1943年9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返回延安途经微山湖时，专门召集运河支队副政治委员童邱龙和有关党政军领导，听取了他们的详细汇报，并要求他们千方百计保护好这条重要战略交通线。同时，对峰南县和运河支队改变归属的利弊进行了深入探讨，朱瑞采纳了童邱龙等人的意见，当即给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写了一封信，并交童邱龙转交，表示同意

峰南县委、县政府和运河支队负责人的申请报告。1943年10月中旬，经山东分局和新四军淮北区批准，峰南县委、县政府和运河支队正式划归淮北区邳睢铜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建制，改称峰滕铜邳县委、县政府和峰滕铜邳总队。淮北区派郑平任县委书记兼总队政治委员，刘向一任副书记，纪华任县长，孙斌全任副县长，胡大勋任总队长。

1943年12月25日凌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一行3人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邳睢铜军分区赵汇川司令员带一个连护送下，来到峰滕铜邳总队驻地北许阳村。在此，陈毅先后接见了峰滕铜邳县委和总队负责人，勉励县委和总队负责人一定要坚持住这块战略要地，保护好这条交通线。后由总队护送到离津浦铁路日军沙沟据点7华里的西界沟村。中共运河地委书记于化琪和鲁南铁道大队负责人杨广立、刘金山等早已在西界沟村等候。陈毅立即召集于化琪、童邱龙、杨广立、刘金山和王志胜等人，听取了他们对这一带情况的汇报。尔后，陈毅再三地对鲁南党政军的领导强调了保护这条战略交通线的重要性。当晚，鲁南铁道大队在夜幕掩护下，护送陈毅安全地跨过了铁路来到微山湖边，微湖大队大队长张新华等已在那里等候。陈毅在波光粼粼的微山湖上，听取了活动在微山湖及

周边一带的几支鲁南抗日武装及微湖抗日武装的对敌斗争工作汇报后，站在船上眺望着山峦起伏的鲁南山区和一望无际的微山湖水，赞叹说：“你们这地方太好了，有抱犊崮山区根据地作依托，又有微山湖这样有利的地理条件，一定要保证这条通往延安的重要交通线的畅通，直到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过湖时，陈毅豪情满怀，吟诗一首：

横越江淮七百里，
微山湖色慰征途；
鲁南峰影嵯峨甚，
残月扁舟入画图。

为了保护这条交通线，枣庄地区各级党组织除了沿途派武装部队保护过往干部外，还在敌战区村庄设置了很多秘密交通站，配备了许多交通员。这些交通员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负责来往干部的食宿和掩护工作，有些人还为此献出了自己以至家人的宝贵生命。如吕巷交通站的陶洪瀛、彭楼交通站站长秦明道及其长子交通员秦玉升等，为保护交通线、掩护过往干部而壮烈牺牲。有的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被敌抓住，任凭酷刑拷打仍保守机密，以致落下终身残疾。

抗日军民参与护送过路干部途经枣庄往返百余次，从未出过任何差错，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嘉奖和中央领导人的多次表扬。萧华在1942年秋天被护送前往太行山途经鲁南时，怀着激动的心情为鲁南铁道大队的战士们写下了一首诗：“神出鬼没铁道旁，袭敌破路毁沟墙。深入兽穴斩虎豹，飞越日车夺械粮。汪洋大海游击队，怒火熊熊敌后方。条条铁轨成绞索，寇灰满载运东洋。”陈光、罗荣桓、萧华、黎玉当时还联名写信给交通线上参加护送干部的抗日武装，信中说：“……你们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心脏，用你们的勇敢和智慧，在星罗棋布的据点中，趟出一条通往延安的坦途，保证了南北交通的畅通！”

第七节 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经济建设

一、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开展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作出了《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鲁南区党委按照山东分局的指示，于5月10日召开各县党政军领导人会议，进行传达部署，决定先在费南县进行“双减”（即减租减息）试点然后在全区普遍展开。会议之后，区党委书记张雨帆带领工作队进驻费南县、区党委组织部部长魏思文率

30余人的工作队到临邾费峰四县边联县的漫子与段庄一带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鲁南区“双减”工作。

5月12日，第一一五师师部指示各部队，要动员全军配合地方进行工作，普遍组织农会，搞好减租减息，扩大民兵队伍，提高群众参加武装和保卫夏收的战斗热忱。6月初，第一一五师政治部民运部组织了30多人的民运工作队，由王韬、马东昌任正副队长，在第一一五师民运部部长李青带领下，到达费南县皇崮、老山区，协助地方开展“双减”运动。鲁南区党委决定以该区为实验区，并成立了工委，李青任书记。由于李青等人的积极努力，有力地推动了实验区“双减”运动的开展。不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决定，李青及工作队留在鲁南工作。李青参加区党委，并任群委会副书记。不久，实验区增加滕县四区和岳朋区，实验区工委改称费滕边实验县委，并建立了县办事处，李青任书记，王韬任副书记，刘剑任办事处主任。费滕边实验县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双减”运动，推行合理负担。李青带领县委成员认真学习中央、山东分局“双减”工作指示精神，尤其是刘少奇对山东的指示，在费滕边实验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双减”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通过“双减”运动，

全县 80%以上的农民和 90%的贫雇农提高了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增加了个人收入，基本上达到了山东分局和鲁南区党委提出的“双减”标准。

与此同时，双山县在县委书记穆林带领下，在群众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 70 个行政村展开了“双减”工作。县委领导按照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精神，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政策，即地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 25%”，利息“以一分半计息标准”计算（即年利息不得超过本金的 15%）。雇工工资以除雇工本人外还能养活一口半人为标准，按当时生活标准计算为 450 斤到 500 斤粮食。因当地的雇工生活很苦，除管吃外，一年的工资只折合二三百斤粮食，因此增加雇工工资工作较容易发动。在上述政策实施中，开明士绅和大部分中小地主都非常拥护，并按要求减了地租和利息。县委对按要求减租减息的地主采取保护措施，而对于个别对“双减”运动阳奉阴违并与汉奸有勾结、在抗日斗争中有罪恶的恶霸地主，则发动群众声讨，经群众控诉斗争后予以处决。还有的村庄通过反贪污撤掉了旧村长，进行了民主改选；有的村庄将大地主代理人掌握的土地重新分租给贫农（即所谓拨地）等。通过“双减”，双山县 40%的贫雇农

增加了粮食和钱的收入，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

峰南县也开展了“双减”运动。县政府发布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法令，主要内容是实行二五减租（原交租一担，减为七斗五）、三五和六五分租（每收一担粮，地主分三斗五、佃户分六斗五）；实行减息，借麦还麦，借高粱还高粱，借钱还钱，月息5厘；雇工工资增加一倍。峰南县“双减”运动从访贫问苦开始，调查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事实，再在群众中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在全县开展“双减”运动之前，先在阡山区进行试点，在新集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斗争地主阡仲科的群众大会，会后由农救会带领群众到阡家退钱退粮。对曾经积极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地主则采取了温和的办法，以缓和矛盾。经过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根据地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并出现了参军热潮。

二、进行货币斗争 加强财政经济管理

抗日战争时期，在枣庄地区流行着三种货币，即北海币、法币和伪币（亦称伪钞）。北海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1941年4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决定：为了统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币制，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巩固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的经

济基础，北海银行总行于4月1日发行新钞。要求山东各界所有持法币者悉数兑换新钞，一切公粮、纳税、交易、存款等一律使用新钞。1942年秋，法币贬值，敌人向抗日根据地大量投放法币用以掠夺物资，加剧了根据地的困难。为此，山东抗日军民展开了对敌货币斗争，其方针是：排挤法币、伪币，建立北海币市场。北海银行鲁南支行建立之后，停止了四县边联流通券的使用，全区通用山东抗日根据地印制的北海币，禁止伪钞在市场上流通，使法币继续贬值。北海银行鲁南支行于1942年秋在滕县、峄南县和边联县等县设立办事处，统一领导该县的排挤法币、禁用伪钞和发行北海币的工作，建立人民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金融市场。

1943年，枣庄地区抗日根据地和部分游击区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获得大丰收，有些地区自给有余，除从经济上继续支援兄弟地区的抗日战争外，还可以向外地区输出。这使北海币有了物资保证，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北海币的信誉和地位，为排挤法币和禁用伪钞奠定了物资基础。1943年夏，北海币同法币的比值是1：1，到年底已达到1：6。1943年以后，敌占区大量发行的伪钞一天天贬值。由于在经济战线上对敌斗争不断胜利，至抗日战

争末期，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和日伪发行的伪钞在解放区几乎绝迹。

1944年春，北海银行鲁南支行在滕县、峄县等大部分县（市）工商局设立了金融股，主要管理银行货币的发行和回收，进行农业贷款和合作社贷款工作，大力进行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扶植工作，并取得可喜成绩。

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稳定金融、厉行节约、建设自给自足经济。同时，鲁南区加强了财政管理，实行财政预决算，规定了开支标准，尽力减少支出，厉行节约。

从1942年开始，枣庄地区改进公粮征收办法，由原来按地亩平均征收改为累进合理负担，按户按地亩的实际收入规定了起征点和最高限额。起征点以下者免征，起征点以上者实行累进。这样既减轻了贫下中农的负担，又增加了公粮的收入，很受解放区农民的欢迎。1943年9月30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决定改征款为征粮，要求每标准亩田赋负担，包括正税与田赋附加，全年不超过5斤粮食，从而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1942年以前，鲁南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多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规定，根据地内的粮食、棉

花、食盐和花生油、羊毛等物资要限制出境；并限制法币和伪钞流入根据地，防止日伪利用非法印制的大量伪钞到根据地掠夺物资。194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下发了关于设立工商管理局，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工作的指示。11月，鲁南行署建立了税务局和工商管理局，统一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和大力发展鲁南经济工作。税务局除按田地征收田赋外，还增加了集市贸易、牲畜屠宰和盐业运销等税种。1943年鲁南区共收入北海币3572万元，其中田赋占44.1%，公粮贷金占37.05%，出入口税占15.14%，行政司法税占2.33%，其他占1.22%。鲁南工商管理局由专员李乐平兼任局长，耿荆山、宋鲁泉任副局长，李作森任监察委员。同年冬，枣庄地区各县设立了工商管理分局，具体负责工业生产、贸易管理、货币管理、税收、缉私、合作事业等工作。

1944年以来，鲁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加强了财政经济工作。首先进一步完善了田赋公粮的征收工作。3月，决定将此前农民所欠的公粮田赋一律免掉，进一步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其次，加强了工商管理。此时的工商管理机构还担负着保障供给、发展公营企业的责任。在贸易管理方面，这一时期的基本方针是，一方面管理输出输入，展开对敌经济斗争；一方面调

剂物资，稳定物价，扶助生产，保证供给。具体的政策措施是，对外贸易取消以货易货的政策，代之以掌握重要输出物资，组织有力输出，以吸收外汇或换取抗日根据地必需物资；在根据地内部实行贸易自由的原则。由于政策措施得当，大大促进了工商贸易、国营企业的发展，因而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其中工商贸易税收收入上升，而田赋收入则下降，从而极大减轻了农民负担。第三，在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努力节约开支。据当年的统计，1944年鲁南机关部队全年节约伙食费780万元（北海币，下同）和日用品一部分，约占全年经费的55%。1945年节约伙食费约2800万元，节约杂支费占全部办公费的一半，节约日用品一部分，总计约占全部经费的70%。1945年所节约的经费除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之外，70%是通过机关部队自力更生开展农业生产和手工业、运输业等生产所取得的。

抗日根据地自实行新的贸易政策之后，经济形势大有好转，调节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扶植了生产，保证了人民生活用品的供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因统一领导对敌经济斗争，不仅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还利用输出的物资换回了根据地必需的武器弹药、医药器械和人民的生

必需品。枣庄地区各级党政机构还鼓励城镇居民和农民发展手工业合作社，组织群众纺纱织布、榨油、酿酒等。这些土特产品除满足根据地人民需要外，还设法输入大城市，换回大批的军需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以改善鲁南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装备和人民生活。枣庄地区抗日军民在抗日战争中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取得了军事斗争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对敌经济斗争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经验，培养造就了一批懂经济会管理的经济干部，为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国营企业的发展，根据地经济收入亦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到抗日战争末期，国营企业的利润已成为根据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第八节 加强根据地党政军民组织建设

一、党组织建设

1941至1943年，日伪军在枣庄地区多次实施大规模的“扫荡”和“蚕食”，枣庄地区党组织则积极领导抗日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努力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由于斗争残酷复杂，枣庄地区的归属问题反复变动，甚至这一地区曾一度大部伪化，沦为敌占区，到1943年抗战形势好转后，被日伪顽占领伪化的许多村镇才逐渐解放。所以这一时期枣庄地方党组织变动比较频繁，同一党组织也可能多次更迭、易名。

1941年1月初，湖东中心县委在盖村成立，刘昭畴任书记，滕西、邹西县委随之撤销。1月中旬，刘昭畴离开湖东，去了湖西，湖东中心县委随之撤销。此时，为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在滕西后盖村成立湖东县委，管辖滕西、邹西地区。9月，因日伪顽夹击，湖东形势恶化，鲁南区党委为坚持游击战争，决定撤销湖东县委，成立邹西、滕西两个工委，在南阳湖和独山湖东秘密开展对敌斗争。1942年2月，由于日伪军的“扫荡”，湖东党组织遭到破坏，滕西、邹西工委机关转移到邹东抗日根据地。8月，为恢复滕西、邹西的工作，鲁南区党委指示一地委派崔北海、谢子刚、马仲川等建立了湖东工委，隐蔽在滕西、邹西地区坚持开展秘密活动。1943年9月，为加强湖东地区党的工作，撤销湖东工委，重建湖东县委。

1941年2月，由于日伪顽的“扫荡”“蚕食”，根据地大大缩小，滕东县委仅在徐庄、辛召、山亭一带活动，为更有利于开展工作，鲁南区党委将峯县北部山区划归滕东县委领导，滕东县委改称为滕峯边县委。1942年6月，滕峯边县委改称双山县委。1943年4月，双山县委改称边西工委。5月，滕东县委再次建立，之后相继建立了四个区委。

1941年2月，峯县县委改称为峯南县委，主要负责开展

峰南、铜北、黄邱山套的抗日工作。5月，鲁南区党委决定将峰南县委、县政府、运河支队由直属领导转属鲁南三地委、三行署及三军分区领导。1943年10月，峰南县委、县政府和运河支队正式划归淮北区邳睢铜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建制，改称峰滕铜邳县委、县政府和峰滕铜邳总队。

1942年6月，鲁南区党委根据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决定成立费滕边实验县委，李青任书记。同月，沛滕边县由湖西区划归鲁南区；临沙工委建立，刘向一任书记，朱奇民、杜季伟为委员。

9月，为开辟峰南县运河以北地区的工作，鲁南区党委决定撤销临沙工委，成立滕沙工委、运北工委，滕沙工委由鹿广连任书记，运北工委先后由刘向一、刘亦夫任书记；成立沛滕峰工委，辖沛滕边县委、滕沙工委和运北工委。1943年7月，沛滕峰工委撤销，成立了鲁南第二地委（亦称运河地委），辖峰南县委、运北工委、沛滕边县委、滕沙工委。

1943年4月，临郯费峰四县边联中心县委成立。7月，为积极开展敌占区和边缘区党的工作，成立了枣庄工委和西集工委；8月，边西工委、费滕边实验县委合并建立费滕峰中心县委。

二、政权建设

随着抗战形势的转变，在条件允许时，选择恢复了原来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一些新政权。1941年2月，在主力部队的帮助下，湖东县委在滕西朱村组建了湖东办事处，步云亭任办事处主任，郑汇东任副主任。同时建立了滕五区、鱼六区、邹七区等3个区政权。11月，滕峰边办事处成立，孙怡然任主任。1942年10月，峰南县委、县政府决定建立运北办事处，孙斌全任主任。1943年2月，邹滕边办事处成立，聂秀轩任主任。5月，滕东县政府成立，王右池任县长。7月，枣庄办事处成立，邱焕文任主任。9月，费滕峰中心县政府成立，刘剑任县长；鲁南一地委重建湖东县委后，恢复了湖东办事处，生碧泉任主任。

枣庄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在这一时期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实行民主，保障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武装之自由。在县、区政权的发展与改造村政权方面，县级政权基本上是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部分是民选产生的，多数设有参议会。（二）强化机构，提高效能。为了便于人民的监督，划小区，取消乡，推行村制，并逐步健全了财粮、民政、教育、公安等部门。（三）颁布了二五减租、四六分粮、分半

减息、优待抗属和合理负担等法令。（四）发展自卫团（民兵）。在反顽斗争（如反击李长胜、东北军进攻及反“扫荡”等）中，自卫团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初步进行整理财政、开源节流工作，使捐、罚现象在财政收入的比例上开始改变，并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在部队的开支上，由部队自筹改变为由政府供给。（六）由忽视经济到注重生产建设，加强生产合作工作。部分地区组织了合作社、生产小组，开展了春耕、秋收、代抗属耕种等工作。（七）恢复与开展国民教育工作，培养干部。

1943年7月，鲁南区党委和鲁南专署决定，在建立运河地委的同时，设立运河地区行政委员会，行使行署职权。行政委员会主任由地委书记于化琪兼任，委员由地委组织、宣传和保卫部部长张庆林、张鸿仪、庄玉铭及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县办事处主任）担任。地委和行政委员会两个机构一套领导班子。行政委员会辖峰南、运北、枣庄、沛滕边等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办事处。运河地委和运河地区行政委员会建立之后，率领鲁南独立支队和运河支队，对盘踞在峰南运河地区的日伪顽展开斗争，保卫了微山湖畔和运河南北抗日游击根据地，打通并保护了华中、华东经鲁南至延安的战略交通线，进一步加强了鲁南八路军和苏北新四军的联系，为巩固和扩大以黄邱山套为中心

的峰滕铜邳抗日根据地发挥了作用。

1943年下半年，鲁南抗日根据地亦不断巩固、扩大。同时，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建设也有较快的发展。至年底，鲁南专署下辖第一、第三行署和运河地区行政委员会，全区建有13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同时，县以下的区、乡、村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也得以巩固发展。此时，枣庄地区政权机构有滕东县政府和运河地区行政委员会及下属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

三、实行精兵简政

1942年春，中共鲁南区党委、专署、军区进行第一次精兵简政，但由于没有充分了解精简的意义，决心不大，精简不够彻底。12月，鲁南区党政军民各机关进行第二次精简。鲁南军区机关精简三分之二，主力部队三团和五团均取消营的建制，同时地方武装也进行了精简整编：尼山支队缩编为营的建制；运河支队撤销一、二大队，由支队直接领导连队，干部下放使用，大队长任连长，大队教导员任连指导员；铁道大队连以下撤排设班。

1943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军事指挥，实行主

力部队地方化，撤销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所属各旅、各支队的番号，部队整编为13个主力团，其余部队编为地方武装。据此，鲁南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主力部队地方化，并同时进行第三次精兵简政。三团、五团划归鲁南军区建制，实行地方化。三团由王吉文任团长，刘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邢天仁任参谋长；直辖5个连，活动于费南、邹东地区，并统一指挥尼山独立营、费滕独立营、费南县大队及该地区县、区地方武装。五团由贾耀祥任团长，王六生任政治委员，宋鲁泉任副团长，李萍任政治部主任；直辖4个大队和1个特务连，大队以下不设连，活动于边联、沂河地区，并统一指挥边联县大队、沂河支队、双山县大队及该地区的县、区地方武装。鲁南军区所属的支队和军分区也进行精兵简政。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和尼山支队建制撤销，将军分区机关和尼山支队合并缩编成尼山独立营。运河支队按甲种独立营编制，取消支队机关直属队，下辖4个连。为便于活动，整编成独立营后对外仍保留支队的番号。临郯费峰边联支队番号撤销，其部队大部编入五团，其余编为边联县大队。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番号撤销，所辖的边联县大队、双山县大队、沂河支队及该地区所有武装统归五团指挥，但各部仍属鲁南军区建制，以便统一领导。部队

整编之后，各县区地方武装普遍得到加强，民兵和自卫团也迅速发展壮大，鲁南地区形成了主力、地方武装、人民武装（民兵和自卫团）三位一体的武装体制，为广泛深入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群众团体建设

1939年7月至9月，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和所领导的第三地委、第四地委建立之时，区党委和各地委的职工部、青年部和妇女部都改称相应的工作委员会，并成立了职工、青年和妇女等抗日救国联合会。上述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党内称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抗日救国会。

1940年6月11日，在选举产生鲁南专署和参议会的同时，选举产生了鲁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总会以及各分会。7月，鲁南第一地委和鲁南第三地委分别召开本地区的各界群众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抗日救国群众团体领导机构。峯县、临郯费峯四县边联县和滕县等地，因县级党组织建立较早，群众团体的活动比较广泛，影响较大，对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八路军主力和地方武装进行对敌斗争、反击顽固派以及参与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都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为了更广泛地组织和动员鲁南各界群众参加抗

日斗争，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建立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鲁南区党委于3月在边联县西涧村召开鲁南各界代表大会，与会代表300余人。会议选举产生了鲁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同时，还分别选举产生了鲁南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联合会、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和文化界救亡协会。

枣庄地区各县随着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也都建立了县级群众团体组织。如：1941年属鲁南区所辖的峯县等9个县政府皆相继建有县各界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并配有专职或兼职会长和副会长。后来，因日伪顽“扫荡”“围剿”和“蚕食”，根据地缩小甚至伪化，县群团组织尤其是地处游击区的县群团组织多数停止活动，有的县群团组织负责人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1941年10月至1942年10月的一年中，仅边联县各界抗日救国会就有杨清法、杨彬、邱玉瑞等20名骨干在对敌斗争中牺牲。1943年底，鲁南区多数县（办事处）又恢复建立了县级群团组织。到1944年8月，各级群众团体领导机构也逐步完善。各级群众团体组织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和发动各界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斗争，参军、参战、拥军支前、开展“双

减”和大生产运动等，为枣庄地区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九节 加强根据地宣传文化教育工作

抗战初期，枣庄地区乃至整个苏鲁豫皖边区的抗日宣传文化工作十分活跃，它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及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宣传文化工作是紧密结合党的各阶段中心任务展开的。在徐州失守之前，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及其领导的党组织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起来抗战。其宣传形式主要是组织宣传队、战地慰问团和以动员委员会的名义编印散发传单。如台儿庄战役期间，特委还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徐州宣传周”活动。

徐州失守之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独立自主地组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上来。这时枣庄地区党和部队主要是宣传动员群众参加和支援抗日部队；宣传党的持久抗战思想，坚定抗日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反复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

的政治诱降阴谋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政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解释党在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当时活跃在枣庄地区的宣传队主要有两支，组建于1938年8月，一支是山东农民抗日自卫团宣传队，王峰任队长；另一支是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初由梁度世、渠维璞负责，有队员10余名，后由杜继贤、渠维璞和刘宪相先后任队长。主要是通过讲演、贴标语、编演文艺节目、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起到了宣传群众、活跃军民文化生活、鼓舞士气的作用。

第一一五师主力到达鲁南后，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文化工作也随之迅猛发展，无论是党的各级组织，还是八路军各部队都建立了宣传机构；在抗日民主政府则设立主管教育的机构。鲁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之后，宣传文化教育逐步走上经常化并具有一定的规模。

1940年7月1日，中共鲁南区党委机关报《鲁南时报》创刊发行，对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9月，中共鲁南区党委第三地委机关报《新群众报》在原四地委机关报的基础上创刊。11月，由鲁南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抱犊崮报》在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县创刊，第二年

改称《战号报》，后又改称《鲁南报》。这些党报、军报，对指导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方针政策，宣扬部队英模事迹，鼓舞干部战士的斗志，教育抗日军民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艺术团体是活跃在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生力军。根据地的文化艺术团体主要是由抗日战争初期的抗日宣传队发展起来的。他们遵照党的“文艺为革命战争服务，文艺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方针，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鼓舞军民斗志，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1940年，活跃在枣庄地区的文化团体主要有：隶属于鲁南军区的鲁南剧社（社长为王化南，副社长为龚振华，指导员为李成宗），隶属于鲁南第三军分区的沂河剧社（社长为刘子恒，副社长为黄梦秋），隶属于中共鲁南第一地委的尼山剧社（社长为越光），隶属于第三地委的黎明剧社（社长为任一诚），隶属于运河支队的运河剧社（社长为李恒宗）等。另外，曾在枣庄地区活动的文艺宣传团体还有隶属于第一一五师的战士剧社、隶属于抗大第一分校的大炉剧社、隶属于东进支队的迈进剧社和隶属于教导第二旅的火光剧社等。1940年9月，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县文联成立，赵进先任会长，马云汉任

秘书长。在县文联成立的同时还创办了《边联抗战文艺》会刊。

这些文化艺术团体，随时创作并演出通俗易懂、短小精彩的文艺节目，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颂扬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到城乡各地和部队巡回演出，并向群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笑声，活跃、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了抗日斗志，与恐怖、压抑、沉寂的敌占区形成鲜明对照。

这些剧社、宣传队以鲁南剧社规模最大，有 50 多名队员，分为三个演出分队。他们先后排练了《马百计》《打城隍》《夜摸营》《顺民》等戏剧，同时还排练有《陆军舞》《空军舞》《钉玲舞》《儿童快乐舞》《黑人舞》等舞蹈。在抱犊崮山区东部的大炉、杨庄、漫溪和车辋一带演出，深受抗日军民的欢迎。1942 年以后，鲁南环境恶化，鲁南剧社、黎明剧社、沂水剧社等合并为鲁南军区文工团。

1945 年 2 月，鲁南军区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遵照上级指示，均建立了抗日宣传队，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路线、政策及鼓舞军民斗志、活跃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鲁南区党委党校于 1940 年 6 月由原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

党校（创办于1940年1月）改建而成。区党委书记赵铸兼任校长，穆林任教务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1942年6月，王少庸兼任校长，教务主任由穆林、燕遇明和蔡得琪相继担任。党校有一个大队部，领导两个中队和工农中队，大队和中队都配备具有军事经验的干部任大队长、中队长和政治委员、指导员。因当时的党校地处环境复杂，又是抗日斗争比较艰苦的时期，日伪顽军经常来袭击。为防日伪顽军袭扰，学校按军事化编制，以班为单位集体食宿。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每人配备一件武器，组织若干个战斗队，以应付各种情况，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党校校址不固定，经常随区党委机关迁移而转换地点。党校培训期为三个月，每期学员200余人。但由于随时要对付敌人的频繁“扫荡”，学业常常不能如期完成。当时学习内容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马列主义常识和游击战争四门课程，侧重于讲解党建理论课，同时还请党政军负责人作报告，对学员进行时事政策教育。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讲课为辅，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在学员中开展互帮互学。当时环境恶劣，教学条件非常艰苦，上课没有桌椅板凳，讲课听报告在露天地里。党校对每期结业的学员除了作鉴定以外，还进行必要的审干工作。经过党校培训的数千名党员干部，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指挥

能力，走向各自的战斗岗位后，发挥了领导骨干作用，为鲁南地区抗日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0年11月，鲁南区抗日干部学校（简称鲁南干校）在临邾费峯四县边联县埠阳村附近成立，鲁南专员公署专员于化琪兼任校长，鲁南区各界救国会会长魏思文兼任副校长，靳耀南任干校主任。鲁南干校培养对象是县区级政府行政和同级群众工作干部。刚开办时有学员近百人，以后增加到200多人。学员大部分是由各县区推荐、选调的，行政与群运干部各占一半，分为行政、群运两个班。学员大多是青壮年，文化程度高低不一，干校以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教学一般是按照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岸堤干校）的课程进行，有《社会科学概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政治形势、根据地的各项政策等课程。课程除由学校负责人分担讲授外，还请鲁南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来作报告。因当时鲁南抗日根据地正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干校教学和学员的生活都遇到了很大困难。为渡过1941年的春荒，干校曾转移到邹东田黄一带，同年夏又转移到沂河地区，冬季又返回鲁南山区。不久，因形势恶化，干校停办，学员全部分配工作。鲁南干校历时一年，共培养干部200余人，为鲁南的抗

日斗争造就了急需的人才。

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同心同德进行抗战为宗旨，致力于普及与提高人民大众抗日文化知识、军事技能和民族自尊心。

1938年夏，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在鲁南抱犊崮山区活动时，创办了抗日小学，由义勇总队宣传队员、枣庄中兴中学毕业生白秀蓉（又名白超）任教师。招收特委和义勇总队干部子弟20余人入学读书，后因义勇总队东征而撤销，学员被分配到抗日宣传队任小队员。第一一五师抵达抱犊崮山区后，罗荣桓与彭畏三商议拟在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办学校。1940年初，鲁南抗日小学（又称抗属子弟小学）在大炉村开办，彭畏三任名誉校长，其夫人、老教员淑影任教员并兼管学校其他事务。初办时只有年龄和文化素质参差不等的十几名学生，不久发展到数十人，学生多系鲁南党政军干部的子女。因当时山区贫穷，对敌斗争频繁，办学条件非常差。课本是教员自己编的，没有石板就在地上写，没有教室便在山沟里教。教员和学生都实行供给制，1942年山区遭灾荒，有时大家连野菜、树叶都吃不饱。有敌情时，学生们还配合当地儿童团站岗、放哨。敌人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时，学校便随部队转移。该

校坚持办学五年，培养了一批批有知识、有文化、政治思想好、抗日热情高的小知识分子。抗日战争胜利后，鲁南抗日小学迁移到滕县城内，同麓水中学合并，仍称麓水中学，分中学部和小学部。校长由张天爵担任，副校长为蔡德琦。到1945年6月，鲁南全区共有小学1300处，在校学生6.57万人。其中运河县有学校196处，在校学生8900余人。以冬学为主的成人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至1945年6月，全区共有冬学3757处，学员达到21.26万人。此外，在各县区教育部门的具体领导下，普遍建立了村学，对开展“扫盲”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鲁南地区从1944年冬季开始，逐步进行教育改革。其中心内容是：扩大教育对象，使儿童、青年、成年直至老年人，都能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教育内容与中心工作相结合，体现了教育为政治服务和学用一致的原则。教育方式不拘一格，不固定地点，从室内到室外，从课堂到山坡，到处都可以读书、上课，同时，还实行小先生制，体现了“能者为师”的优良传统。通过上述各种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第十节 整风运动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6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全党开始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5月8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整顿三风指示的决定》，要求整风运动分两步走，第一步，学习文件，领会文件精神实质；第二步，在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开始检查工作，考察鉴定党员。7月1日，山东分局发出《整顿三风学习的补充规定》，号召山东全党以高度的热情和严肃的态度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县以上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立即改组原有的学习委员会，使之完全适应领导整风学习的需要。通过学习，立即掀起“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枣庄地区的整风学习是在对敌斗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对敌斗争任务非常艰巨，战斗亦非常频繁，但为了长远利益，为了抗日斗争胜利的大局，还是按照山东分局的指示抽出大批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在整风学习中，枣庄地区各级党委都非常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抓，理论联系实际，从思想上、作风上解决问题。通过学习，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对党内的三风危害有了新的认识，并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对照检查了本身存在的问题，写出了总结，制定了整改措施，对今后各项工作的

顺利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整风学习之后，鲁南区党委又抽调县团（独立营、大队）以上领导干部分批进山东分局党校和鲁南区党委党校学习，同时按上级的部署进行整风和审干工作。参加各级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从精读整风文件入手，把重点放在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对个人历史问题进行反省上。个人进行思想反省后，开展坦白运动。根据坦白出来的问题，对当事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反对“逼供信”，做到“坦白从宽，隐瞒从严”，提高认识，防止重犯扩大化的错误。

1943年12月至1944年3月，鲁南区党委先后在朱家村、大邵庄召开整风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先用20天的时间召开鲁南区党委会，进一步学习了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有关文件，统一了思想，回顾和检查了前段整风情况，提出了进一步整风的意见，然后用两个月的时间召开县委书记、县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传达了《鲁南区1943年工作总结》，同时按照中央整顿三风的要求和“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批判了忽视党的建设等右倾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加强党政军建设、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积极反

攻的指导思想。会议结束前，区党委副书记张雨帆代表鲁南区党委作了总结报告，提出了建设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鲁南区党委召开的这次整风会，是鲁南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一次关键性会议，有力地动员了鲁南广大军民，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主力和人民抗日武装展开对敌大反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整风和审干期间，枣庄地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鲁南区党委这次整风会议精神，派干部深入基层党支部，协助其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通过整顿，进一步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力和战斗力。

通过整风和审干运动，枣庄地方党组织的作风取得了可喜的变化：一是增强了党的各级领导人和广大党员的党性，加强了党的团结；二是坚定了党员的革命斗争意志，提高了对敌斗争的艺术；三是树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加强了调查研究之风气；四是纠正了党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改进了党的民主作风；五是提高了各级人民抗日武装的士气，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夺取大反攻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